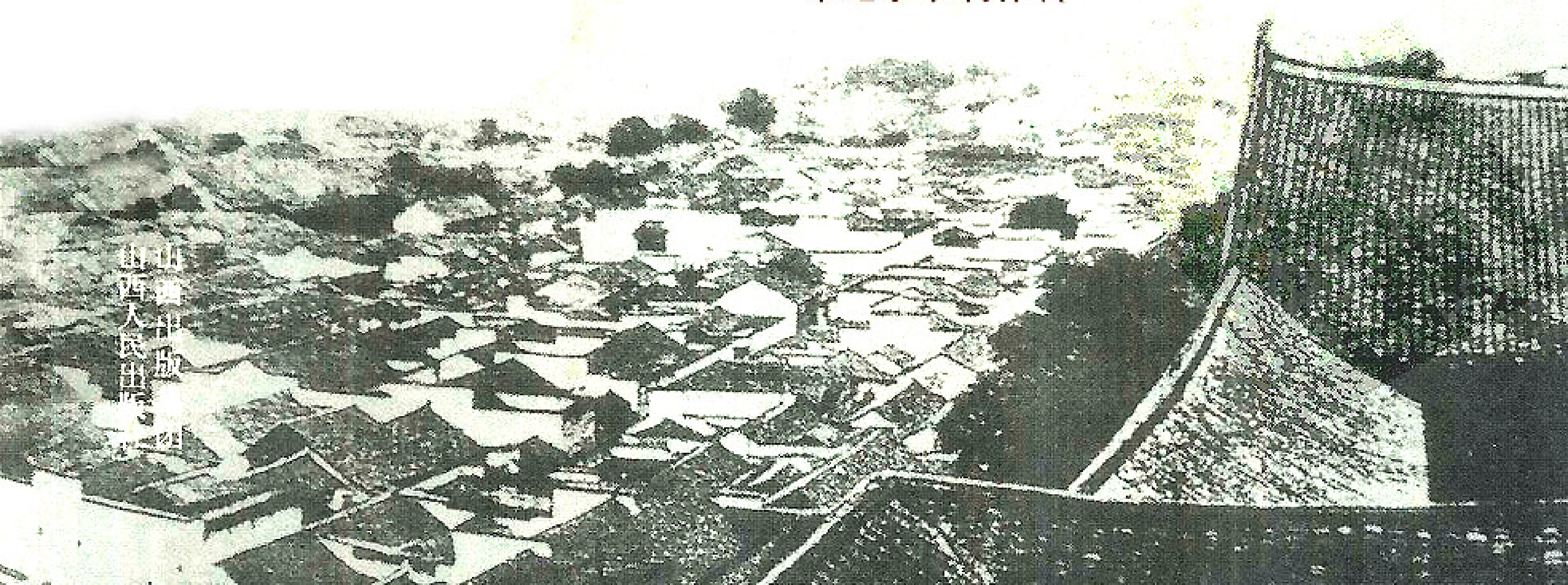
歷史：何以至此

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雷颐 著



歷史：何以至此

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雷颐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雷颐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203-06880-8

Ⅰ.①历… Ⅱ.①雷… Ⅲ.①中国—近代史—文集②中国—现代史—文集 Ⅳ.①K250.7-53②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409 号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著　　者：雷　颐
责任编辑：张建英
特约编辑：邓　晨　余燕龙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5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10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880-8
定　　价：28.00 元

自　　序

本书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

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

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妓女赤身裸体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下体面对敌阵。

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间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

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

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

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

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

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

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

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

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雷　颐

2010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辑　末路的罪与罚

第二辑　民国的新意义

第三辑　新鲜的记忆

第四辑　历史：何以至此

第一辑　末路的罪与罚

“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枏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

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

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

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在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 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 11 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Gordon Charles George）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地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 11 月 28 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其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的降将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 月 4 日，郜永宽等八人趁在慕王府议事的机

会刺杀了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部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名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Brown Major－General）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

李鸿章确实没想到洋人对“杀降”会如此大动肝火，在他看来，这只是“稍可自娱”的小事。中国虽有“杀降不祥”之说，但现实政治、

战争传统更加讲求的是“势”与“术”。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杀降”之事：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国以极大的震慑。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入咸阳之前害怕秦将章邯部下投降过来的20万秦军谋反，在新安把这20万降卒全部活埋。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镇压以赖文政为首的反政府茶商军。辛诱降成功，赖文政接受招安，但辛反将包括赖文政在内上门投降的全部茶商军头领押往江州（今九江）处死，其余800多人也全部在一天内被杀掉。有此传统，所以清廷和理学家曾国藩都不认为李鸿章的杀降有何不妥，反而赞赏有加。

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要改变，此次李、戈严重冲突，即是传统即将改变的先兆。戈登坚决反对杀降说明这种价值观念在西方此时已较为普遍，因此，这种价值观念制度化的红十字会组织才可能成立。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李、戈为杀降激烈冲突的1863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这一年召开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十二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以及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虐俘”。1904年3月，中国先后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40年后的1904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在这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抛弃、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曾国藩是中国“理学”大家，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而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

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行为万难接受，故李、戈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二人冲突固然也可视为中西观念冲突，但“地域性”的中、西冲突背后，其实是“时间性”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冲突。

今日世界，无论情势所迫有再多“杀俘”、“杀降”的理由，任何政权都已不敢公开“杀俘”、“杀降”，不敢公开为这种行为辩护。无论何国，只要“虐俘”消息传出，更不必说“杀俘”、“杀降”，便会遭到举世谴责。这说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念，已成“公例”，成为人所公认的普适价值。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因此也不便继续禁止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在危机面前，清政府不得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1895 年 8 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措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之前相比，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此时虽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了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在这一阶段发展相对较快，但其内部实际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对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对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 1872 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天生的一个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

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清廷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轮电之争"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有些官办企业后来也改为官督商办。但清政府内反对官督商办的顽固派依然十分强大，一直想将这些企业完全收归国有。

"轮电之争"中的"轮"，是指"轮船招商局"。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儁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了招商局对于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所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了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的是“中华”得利而不是“华商”得利，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使人联想到私人的词语。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的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方面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决策的一个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而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

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运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轮电之争”中的“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来说本是重中之重，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淫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借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的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稍后成立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把“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的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使其成为“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异常复杂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开始担

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的“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的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今日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方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于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袁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杀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却毫无办法。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甚至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

均准照旧合股”，对于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既有体制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电报局被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电报总局后，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的方法，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做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而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备，窥测时机，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于在 1908 年 3 月得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 180 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 11 月，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只，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由，于 1909 年 8 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复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的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的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

铁路国有引爆革命

铁路在最开始引入时受到的阻力最大，但当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后，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铁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不得不招商股，更多的是靠举借外债。1905 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 1904 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 1907 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 1908 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的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于 1909 年末和 1910 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后，“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清政府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于 1911 年 5 月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铁路“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的（或者说让股民满意的）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再次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归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实施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

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政策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在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时，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社会不会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官不过问”的失败

刘铭传是晚清名臣，淮军悍将，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升至总兵；1865年被提拔为直隶提督。在中法战争中，已解甲归田多年的刘铭传又被起用，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率军英勇作战，抵抗法国侵略。1885年10月台湾设省，抗法护台的有功之臣刘铭传自然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然而，如此劳苦功高的重臣，最终却因力主企业应当商办、“官不过问”，而被清廷责问丢官。

刘铭传二十出头就投靠李鸿章，自然深受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成为主政台湾的封疆大吏后，他在台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成就斐然。他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民间传统文化及保守力量较弱，且清政府对此到处都是“化外土番”的荒岛，远不如对内陆省份那样重视，这些正是学习西方以求自强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一岛而“为全国之范”，进而成为“国之富强”的基础，所以在他任职台湾巡抚的五年（1885—1890）中，台湾兴建了许多新式企业。

早在1880年，刘铭传就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向朝廷上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由于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修建铁路的计划未能实现。担任台湾巡抚后，刘就将几年前未能实现的愿望付诸实施，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建设台湾、加强台湾与内地联系的方针。先后在台北设立了电报总局、“全台铁路商务总局”、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大大改善了岛内外的电讯交通；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发行了邮票，有船只定期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邮路远至厦门、

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这是我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中央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了近十年。因此，刘铭传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台湾现代化之父”的名声。

1887 年，刘铭传准备将亏损不止的官办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导致自己丢官。1874 年，李鸿章和湘系官僚、船政大臣沈葆桢几乎同时向朝廷奏请开办新式煤矿。李鸿章奏请开办直隶磁州煤矿，沈葆桢奏请开办台湾基隆煤矿，均获朝廷允准。两矿都从 1875 开始筹建，由于基隆煤矿在 1878 年首先建成投产，所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因此，它的创办自然深具意义。

沈葆桢创办基隆煤矿的目的是为了向福州船政局供煤，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采取官办形式。煤矿建成后，日产能力约 300 吨，比旧式煤窑高出几十倍。从 1878 年到 1884 年，基隆煤矿生产初具规模，产量逐年上升，但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在中法战争中，基隆被法军占领，中国军队撤退前，不得不拆毁机器，并将矿井炸毁，基隆煤矿被彻底破坏。中法战争结束后，已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认为煤炭是船厂、机器局、兵轮的必需之物，是“富强”的基础，不能废弃不办，开始着手煤矿恢复工作。刘铭传的过人之处在于看到官办的严重弊端，决定完全商办，以招商方式恢复办矿。

商人张学熙开始承办，张接手后才发现，由于煤矿破坏严重，恢复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而他的资金非常有限，在经营几个月后不得不因严重亏本，赔进本银数千两而禀请退办。完全靠商力不够，刘铭传便想以官督商办的形式来恢复生产。他商同两江总督曾国荃、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裴荫森，由这两方与他主管的台湾当局合作，三方各出本银 2 万两作为官股，同时委派补用知府张某另招商股 6 万两，合成本银共 12 万两，添购机器，雇用外国技师，于 1887 年初开局试办。当时即规定，等到办出成效后，再广招商股，收回官本。

采取官督商办后，基隆煤矿恢复顺利。1887 年，当年的生产能力就达到日产 100 吨，年产 17000 余吨。此时，煤矿的运力明显不足，制约了煤产量的进一步提高。于是，开始修建从矿井到基隆码头的铁路，以使运力大大提高，促进生产进一步发展。此时，官商矛盾已经出现，

商人对进一步投资修铁路态度消极，而刘铭传这时看到生产顺利，因此乐观地认为铁路工程已办有“十分之九”，以后不需要再增加资本，便将商股退还，重新将煤矿收归官办。

以刘铭传的思想之开明，曾长期力主商办企业，但在“官督商办”企业营利后还想将其收归官办，遑论他人。可见，要官员、政府真正将“官企”尤其是营利的“官企”“民营化”，确实难而又难。

不过，收归官办后，官办企业的各种弊端立刻表现出来，又是月月亏损，与几年前官办时的情形完全一样。无情的事实很快使刘铭传清醒过来，他转而再次寻求商办，一是福州船政局仍大量需要基隆的煤炭，二是刘铭传急于将官本收回。不过，有实力的华商毕竟不多，一些商人很可能对他之前轻易将颇有成效的商办企业收回变成官办的做法，还心有余悸，所以募集商股的工作并不顺利。此时，一位英国商人向刘铭传提出，愿以分期偿还官本银为条件，换取 20 年内台湾全部煤矿和石油的开采权。刘铭传认为引进英资对中国有利，既可收回官本，还可得各种利税。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若由该英商承办，不特官本可以收回，即以二十年计之，可免漏卮百万。关税并车路运资，转可得数十万……”不过，此事被清廷否决。

官办严重亏损，引进外资又被朝廷否决，煤矿还不能关闭，刘铭传只得在勉强维持中继续作商办打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一些商人愿意以官商合办的形式承办基隆煤矿，为期 20 年，商人出资 20 万元，并缴还原矿本银 12 万两；官府出资 10 万元，而且是以“矿存房屋机器以十万元作官本，其余按月缴煤扣除”。但这些商人很清楚“官”的危害，所以在合同中提出，在用人、财务方面官方免予过问。其实，对于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官员最感兴趣的就是用人大权与财务大权，有此二权，便可任意安插亲信，贪污中饱。规定官方无此两种权力，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按照此办法，政府既不必另拨款项，又能得到煤矿生产之利，完全符合刘的意图，所以他认为此约对官方大大有利；同时，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官”对“商”的干涉有害无益，因此完全同意此约。所以，在 1890 年 8 月中旬将基隆煤矿移交商人办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明了合约的具体内容，彼此入股、分利的情况，还如实写

道："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

但是，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的庆郡王奕劻带头反对，总理衙门和户部联衔上奏反对此举，他们列出了种种反对理由，特别针对刘铭传奏折中的"官不过问"一句声色俱厉地质问："此事既经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人，官竟不能过问?"在官本位、官权大于一切的近代中国，提出"官不过问"确实敏感，使反对者引申发出了"官竟不能过问"这种很能打动人的严厉责问。群情汹汹之下，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降旨对刘严斥："刘铭传着交部议处。该抚接奉此旨，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止，不准迁延回护。"吏部"议处"的结果是刘铭传"照违制律私罪革职"。或许是考虑到刘的功劳与影响，1890 年 10 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但刘知道自己在官场已无前途无意义，再三以病请辞，终于在 1891 年 6 月获准。

官办企业民营化是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中最重要的方面，战功赫赫、为大清王朝效尽犬马之劳的刘铭传却因此丢官，付出了惨重代价，由此可见转型之艰难。这固然是刘铭传的不幸，其实更是清王朝的不幸。依然官办的基隆煤矿的衰败更加迅速，就在刘铭传辞官后的第二年，1892 年 11 月底，基隆煤矿便不得不完全停产。宁愿维持企业官办以致衰败破产，也不愿把企业交给民营使其兴旺发达，在这种基本思路的指导下，清政府如何能引导社会成功转型呢?

失败的乌托邦："天国"悲剧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地震撼了大清王朝，并几乎将其推翻。太平军的"兴"，无疑是清政府的腐败专制逼迫农民"不得不反"的结果。如此浩大、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终却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　讧

从 1851 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 1853 年 3 月攻克一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胜仗连连，尤其是 1856 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清军"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 1843 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

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 1848 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人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凡人之王，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天父）次子，而杨是皇上帝的代言人，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上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关系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在永安建制封王时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杨在神权上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 1853 年 12 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借“天父下凡”当众怒斥洪秀全：

“尔有过错，尔知吗?”洪秀全立即下跪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时深夜杨秀清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及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而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

1856年8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万岁。”

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燕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人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杀戒一开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9月4日就屠杀了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不能幸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翼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后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人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

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腐　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1851年3月，金田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了“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

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自比“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后来，最高权势者为了敛财，干脆大规模甩卖王爵封号。结果，到最后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位“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的威胁还未解除，洪秀全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由于建材不够，还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地将各种奇珍

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未完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也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而驻在外地的诸王在天京又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在天京亦建有豪华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三十六个“王娘”，到天京后有八十八个“王娘”，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九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四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也都要选送美女。因妻妾太多，洪秀全无法记住全部姓名，于是一概编号。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各项人数加起来，天王府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女性陪侍洪秀全。洪秀全作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写给嫔妃、女官的告诫条文，如不能高声说话：“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端茶捧痰盂要注意：“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对不会刷牙、化妆者，他讽刺挖苦说：“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只能看他的肩以下，这点实在难以做到，但仅凭这点，就可任意处罚嫔妃、女官了。他还规定了十个“该打”：“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受罚者胆敢辩护则加重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太平天国的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 25 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 13156 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自留口粮外，一律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 10 人为一馆，后来以 25 人为一馆，由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也是把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60 岁以上老人和 16 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要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

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都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绣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刑罚从杖责、鞭笞到熨斗烙背、跪火链、缠火链、斩足、挖眼等等，死刑有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凌迟等等。如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因见到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身施礼，被这位同庚叔怒打二百鞭后又被杨秀清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秦日纲被杖一百，翼王岳丈、掌管刑部的黄玉昆被杖二百。又如参护李凤先路遇兵部尚书侯谦芳时，因没有让路也被处死。盛夏时天京酷热难当，男营女营中都有人因头上生疮或生虱而剪发，结果被指为“通妖”，被施以腰缠烧红铁链或用烧红铁钎刺入股内的酷刑。百工衙内的工匠如果争吵斗殴、逃走被捉甚至寄宿他馆，都要被斩首处死。有的妇女被怀疑出外与丈夫“野合”受孕，结果竟遭剖腹查孕。百姓若藏有金一两、银五两者斩，藏有儒、释、道著作者斩……滥施酷刑，必然怨声载道。

太平天国提出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上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起码在前期，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与自己的理想恰恰相反。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太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历史的见证者：容闳的独特意义

一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幕幕你死我活的民族、阶级间的生死大搏斗，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这充满血与火的历史舞台上，无论“进步”还是“反动”、肯定还是否定、赞扬还是批判，人们的目光自然容易长期“聚焦”于林则徐、洪秀全、杨秀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慈禧、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他们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主角”，而未能参与近代史的“全程”。而远非风云人物的容闳，却是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和“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其实，他的贡献远不仅限于教育领域。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启蒙先驱

清道光八年（1828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朝廷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

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后期，西方的自然科学水平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而后因与教会发生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幼小的容闳白天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游戏，捞鱼捉蟹，晚上在油灯下听在私塾读书的哥哥诵读《论语》、《孟子》、《中庸》和唐诗宋词。容闳七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小小年纪就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普通农民最简单、最朴素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的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不仅免除学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因有人懂得一些“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这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最早破除了“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在教会学校，容闳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不久，这所学校停办，容闳回家务农。1840年，容闳的父亲病逝，家中更加贫困，容闳有时做农活，有时挑担沿街叫卖。这年秋天，经人介绍，容闳再到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1月进入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这所学校开设中西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主。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使容闳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

《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 年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去，随后又有两人表示愿意去。由于容闳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设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学费等留学的所有费用，而且还给他们每人的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这些都使容闳十分感动。在容闳的青年时代，勃朗对容闳最为关心，处处提携，对他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勃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改革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为己任。他提倡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的观点，成为容闳教育观的基础。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关于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书》中的有关论述。容闳长期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关于各科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

1847 年 1 月 4 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经过埋葬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时，船只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容闳一行也上岸一游。他们来到拿破仑的墓地，见墓前有株大柳树在风中摇曳，于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带到美国。4 月 12 日，他们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意想”，而几年前的“游纽约”的幻想今天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这使他今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哈蒙德校长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在 18 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

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历史学家伯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苏格兰，所以也常被归入这个学派。18 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做“大不列颠的雅典”。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在后来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学派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冲激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折，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

崇洋不媚外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 1848 年考入耶鲁大学，但他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已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只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正在困难之际，勃朗先生帮他找到了一个妇女会提供的资助，使他最终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拖着长辫子顺利地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他学习刻苦，文科成绩优秀，不过数学不

好。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半工半读，管理图书，担任二、三年级同学司膳，供应饭菜。他还参加了足球队和划船队，是划船队的主力之一。这些使他赢得了同学的尊敬，也使他对美国社会了解得更深。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最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然无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事实证明，从他 1854 年回国到 1872 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十八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1854 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用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八年的祖国。

他为报国而回，但尴尬地发现自己对汉语已十分陌生，所以于 1855 年夏天在广州补习了半年汉语。就在这其间，他看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屠杀上万人，尸横遍野。他对此愤怒异常，因而认为农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对太平天国也有一定好感。

当时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进入体制内，他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海龟"，却"无人识"，于是只能通过关系给在广州的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当秘书，薪水不高，且为国人看不起。他想通过伯驾结识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派中国学生出国留洋的建议。然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官员，于是在三个月后辞职，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他勤奋钻研法律，没想到却遭到了香港英国律师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容闳是中国人，又精通英文，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容闳于是愤而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英国人掌管的上海海关处任翻译。海关工作轻松，薪水极高。他曾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自己今后有升为总税

务司的机会没有。李泰国明确告诉他，中国人绝无此希望。容闳感到这是对华人的侮辱和歧视，于是决定辞职。李泰国认为容闳的真实意图是嫌薪水太低，只是想借此提高薪水而已，于是把容的薪水突然提高到白银 200 两，以挽留容闳。但容闳志不在此，坚决辞职，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海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他为何放弃报酬如此优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工作，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写道："我们来到人世间，不能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存而单调乏味地劳碌着。我为了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为我应当尽力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知识，与其我个人受益，不如成为我民族所共有的福祉。我不断更换和改变职业，只是为了弄清楚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中国的人。"

从海关辞职后，容闳又到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工作，当起了"买办"。买办收入颇丰，但非他所愿，他一心想的仍是如何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进而改造中国。不过，容闳虽然推崇近代西方的各种制度，却毫无"媚外"之态，他曾两次与欺辱他的洋人较量，在上海滩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晚上，容闳与仆人从基督堂祈祷归来，碰到一群醉酒的洋人东倒西歪、手舞足蹈、狂呼乱叫地迎面而来，路人避之唯恐不及。为容打灯笼的仆人也畏缩不前，不知如何是好。容闳要他不用害怕，一直向前。没想到，其中一个洋人想夺走容闳仆人的灯笼，还有一个洋人甚至想踢容闳，只是由于酒醉，站立不稳，并没有踢到。容闳认为他们酒醉，便不与他们计较，仍旧往前走。但是，他突然发现其中有几个人并没有喝醉，反而在后面笑看那两人胡闹，欺负中国人。容闳顿时大怒，他走上前去，要他们告诉自己那两个想抢仆人灯笼和想踢自己的洋人的姓名。凑巧的是，其中一个人正是容闳 1855 年回国时所乘"尤里克"号的大副。容闳与"尤里克"号的船长认识，而且此船现在正由他所在的商行管理。第二天早晨，他就给"尤里克"号的船长写信抗议，并要船长将此信转交给那位大副。船长收到信后，对大副的行为非常气愤，怒气冲冲地把信交给大副。大副立即上岸，来到容闳的住处，向容闳道歉。

另一次是容闳参加一个拍卖会，他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苏格兰人。没想到此人把棉花搓成一串小球，系在容闳的辫子上，以此取乐。容闳发现后，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和颜悦色地要他把棉花球解下来，但这个苏格兰壮汉流露出蔑视和嘲笑的神情。面对侮辱，容闳正颜厉色地再次要他摘下棉花球。没想到这个苏格兰壮汉反而趁容闳不备，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容闳怒不可遏，虽然比壮汉矮小许多，却用最大力气给对方脸上回敬了一拳，这一拳端的是厉害，打得这个壮汉鼻口流血不止，两人厮打起来。被人拉开后，这个苏格兰壮汉感到大失颜面，立即挤进人群溜走了。后来，一个朋友告诉容闳，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恰在现场，他说："这个中国少年血气太盛了点。如果他不报复的话，可以到领事法庭对这个苏格兰人进行控告。现在既然他已报复，痛打了别人一番，并且当众让这个苏格兰人大丢其脸，就无控告此人的优势了。"那个苏格兰壮汉事发后一个星期都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露脸，说是为了养伤，实际上是因为在众人面前被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国人打败而感到羞愧。此事在租界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一时间成为租界内外国人的谈资。而在中国人中间也一时传为佳话，容闳因此备受敬重。事后，容闳说道："自从外国人在上海建立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以来，经常有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的事情发生，但还没有听说过有中国人敢在外国人管辖的区域内毫无畏惧地赤手空拳进行反抗，捍卫自己的权利。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中国人的温良和逆来顺受的性情，能容忍种种人身侮辱和冒犯，既不怨恨也不抗争。这种情况，恰恰养成了一些无知的外国人的骄横心态，助长了他们不能平等对待中国人的横蛮嚣张气焰。然而，我认为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中国人懂得维护和捍卫自己权利的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中国人不再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权利的行径，也更加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和扩张。中国国民的无知、自负和保守，顽固成性，是今日受人侮辱之结果"。

从"太平"到"洋务"

在上海，容闳的社交面逐渐扩大，与《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

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曾国藩兴办洋务，他们都入了曾国藩幕。

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投向了太平天国，他把近代化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兄洪仁玕于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后，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容闳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国之策：1. 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2. 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有学识、有才干的军官；3. 创办海军学校，建设海军；4. 组织良善文官政府，聘用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行政部门的顾问；5. 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6. 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列为主课之一；7. 建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点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使中国实行社会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蓝图。虽然当时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的价值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他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不过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而且，其他诸王或将领都在外打仗，如此重大的事情要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后才能决定。这番话其实是婉转地告诉容闳，现在根本无法实行这些设想。容闳大失所望，当天就“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没想到几天后，洪仁玕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非常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方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义”字头衔。还有黄缎一幅，上面写明“义”的官爵，并盖有

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国“王”以下设六等爵位，即义、安、福、燕、豫、侯，“义”是仅次于“王”的爵位。按照太平天国的官秩爵序，属于第四等高阶。由此可见洪仁玕对他的重视。但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容闳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写道：“根据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断，对于他们最后的成功，我是极抱怀疑的。”“我确信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复兴。”第二天，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却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谢绝了洪仁玕的好意。同时，他告诉干王，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领袖们决定实施他所提的建议，或仅实施其中一项，只要需要，自己将尽力而为。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太平天国：“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政府和政治严重的腐败黑暗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这确是真知灼见。

容闳的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国来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结果完全落空。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的容闳在无人敢去的太平军与清军“拉锯区”低价收茶，贩到上海、九江等地高价卖出，虽然几历险境，却都是有惊无险，且获利颇丰。不过，他马上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想靠自己经商致富来改造中国完全是幻想。希望幻灭之后，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正在苦闷之时，1863 年春，他在九江收到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此信从安徽安庆寄来，写信者是容闳 1857 年在上海结识的张斯桂，此时张已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信上说，自己承总督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到安庆，因为曾听说了容闳的情况后，甚想和他一见。读完信后，容

闳顿时疑窦丛生，自己与张在上海只是点头之交，以后各居一地，不通音信，几年来毫无往来，此时突然来信要自己到安庆去见曾国藩，其真实目的究竟为何？自己根本不认识曾国藩，曾国藩也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邀请自己到安庆去见他？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几年前曾到过太平天国的天京，见过干王，献过七策，他要抓捕自己？会不会因为是自己来往于太平天国占领地区贩运茶叶，曾怀疑自己是太平军的奸细？总之，很可能是曾为了抓捕自己而设计的，故意用甜言蜜语诱使自己上钩，人心叵测，不能不防。思来想去，容闳决定还是小心谨慎为妙，于是给张回信，表示自己此时忙于生意，没有时间去安庆，婉转地谢绝了曾国藩的邀请。不久，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内附他在上海认识的好朋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精通数学和天文学，学问人品素为容闳所佩服。他在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介绍说他的两个好朋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下，曾国藩想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容闳仔细琢磨来信，感到他们说的是实情，便复信表示同意，等自己茶叶生意忙过之后立即赶赴安庆。一个月后，容闳又分别收到张斯桂和李善兰的信，说曾国藩急欲尽早见到容闳，盼他能尽快弃商从政，来到自己幕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曾国藩令张、李二人分别发了五封信邀容来安庆，次次紧催，足见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任。

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在 1863 年 9 月的一天，他从九江乘船顺流而下，直达安庆。到达安庆来到曾国藩幕后，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热情欢迎他。第二天，容闳即应召前往总督府拜谒曾国藩。曾国藩以会“相面”著称，见面后仔细打量容闳，先紧盯容的脸盘，后紧盯容的双眼。曾国藩详细问了容闳的基本情况后，问道：“你乐意就任军官职务吗?”容闳回答说：“我很愿意就任这个职务，但我没有研究过兵书，胸无韬略，不熟悉军旅之事。”而曾国藩肯定地说：“予观汝貌，决为良好将才。以汝目光威肤，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容闳谦逊地说：“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

期许耳。”容闳的诚实，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曾国藩说：“这是一个诚实人。如果我能召见一百个人，问他这个问题，将有九十九个人马上回答说‘能’，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官位，不管能不能胜任，能不能打胜仗。但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并且在会谈时颇为谦逊。”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听闻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性了，但他对此计划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机器生产的情况，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容闳向曾国藩等人解说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有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子厂。既有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一个星期后，曾国藩给容闳下了委任状，授予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通过皇帝赐给他特殊的官阶和待遇。受曾氏之托，容闳于 12 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

其他各种民用机械。他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或者说主要并不在于武器，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认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从仅想创设制造来复枪的工厂改为建造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一个半世纪后，历史终于应验了容闳的预言，中国确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贱”，成为“世界工厂”。

艰难开辟留学之路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为此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自己与曾毕竟不熟，而且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没有概念，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于 1865 年 8 月顺利运到上海，完好无缺。容闳也于 9 月回到上海。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被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其间，容闳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洋务官员丁日昌，丁当时为苏淞太道。两年后，丁日昌升为江苏巡抚，这时他对容闳的思想、见识非常了解、佩服。由于他与在中央掌大权的满族大臣文祥相熟，所以鼓励容闳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写个条陈，由他转给文祥。听到这个消息，容闳兴奋得犹如电击，跳了起来。他立即提了四点建议：第一，组织轮船股份公司，不准外国人入股；第二，政府派优异青年到外国留学；第三，政府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第四，严厉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国干涉中国主权。这四条建议中，容闳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二条，即派青年学生到外国留学。但他知道，实行这一条困难最大，一年前“同文馆”要学数理化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反对余波未息，派学生出洋更加难以想象，所以将其列为“第二”；并且，此条对留学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详加论述，切实可行。然而，条陈交上

后并无下文，容闳深感失望。

失望但不灰心，容闳只要见到丁日昌，就叮嘱他不要忘记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恳请他向曾国藩提及此事，甚至请他直接向皇上奏请。丁日昌毕竟更了解官场成规，劝容闳不要操之过急，耐心等待。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丁日昌受命处理此事，急调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可乘机向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处理基本结束时，容闳再次向丁日昌详述了自己的计划，要他向曾国藩进言。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国藩大力推荐容闳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曾的首肯，表示愿向朝廷奏请。容闳得此喜讯时已是深夜，已经上床，睡意蒙眬，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历尽艰辛，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他的确不能不如此兴奋；而且他坚信，如果他的教育计划能够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曾国藩知道此事重大，自己一人的威望仍嫌不足，于是立即联合李鸿章等人联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李又联名上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后，留学又面临着“民间”的阻力。按照规划，朝廷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四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入仕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会被所有人耻笑，因此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30名留学生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为宣传留学，容闳深入江苏乡间，又回到家乡，招收部分家乡子弟。他还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国人开的学校中招收留学生。为了招满名额，清政府认为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出洋传统，所以把留学名额作为“任务”摊派给一些地方。地方官

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到一些穷苦人家动员他们把小孩送出国留学。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为打消此种顾虑，容闳便以自己的留学经历现身说法，证明留学并不会被剥皮展览。

从詹天佑的出国留学经历中，便可见开创留学事业的艰难。詹天佑也是广东香山人，与容闳同乡。官派幼童留美，詹天佑一家原来并不知道，一位在香港做事的姓谭的邻居归来，才将这一消息告诉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并力劝他送詹天佑出洋。詹兴洪虽不富裕，但属小康之家，所以犹豫不决，心中还是希望詹天佑走科举之路，升官发财。但谭姓邻居因在香港多年，知道外洋的富裕，认为科举之路最多能找到一个“铁饭碗”，而出洋留学则有可能得到一个“金饭碗”。当时给儿子找媳妇要花很多彩礼钱，詹兴洪很喜欢谭家的小女儿，早就想与谭家订“娃娃亲”。谭某也非常喜欢詹天佑，认为此儿聪明，人品好。此时，他对詹兴洪提出，如果送詹天佑出国，他就同意与詹家定亲。经过谭某反复劝说，加上可省一些彩礼钱，在这种情况下，詹兴洪才同意把儿子詹天佑送到美国。

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 30 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他们于 1872 年 8 月中旬从上海起航赴美，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各批幼童出国前都要到上海出洋预备学校进行初步培训，临行前先要到上海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称谢，因为从理论上说，道台就是他们的主试官。见过道台后的第二天，他们还要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没想到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时，不仅无须磕头，总领事还拿出茶点糖果招待他们，显得热情亲切。中、美两国官员的这种不同，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未出国，就开始感受到中、美的文化差异。

到美国后，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人的家中，他们的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变化。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篮

球、棒球、足球，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例如自行车刚在美国问世时，幼童们也感到好奇，试着骑，耶鲁大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中国留美幼童；其中一人还当过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许多人还学会了跳舞。由于他们彬彬有礼，许多美国女孩都喜欢和他们跳舞，不少美国男生都非常忌妒他们。在服装上，他们由于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而喜欢穿运动衣。最使幼童们感到头痛的是头上的辫子，一个美国人写道："这许多孩子的装饰，除了拖着一根辫子，与我们无异。当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将辫子塞进内衣里，有时缠在头上，辫子一散开，对对手的诱惑过大。"因此，有的幼童把辫子剪掉，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时再戴上假辫子，清政府官员发现后非常愤怒。幼童们在 1876 年参观了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在参观博览会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专门接见了留美幼童。他主动与幼童握手、照相、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用心学习。美国总统的平易近人，与见中国官员要下跪磕头形成鲜明对照。幼童在美国一点点地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产生了反感。

对学生们的变化，容闳认为很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陈兰彬、区谔良、吴子登等认为是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容闳以为双方的不同通过彼此的沟通、交流就可解决，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官场政治文化中有首先偷偷向上级打对方"小报告"的传统。陈、区、吴等不断向朝廷、李鸿章等暗中"汇报"容闳的"劣迹"。他们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被说成是鼓励学生"入各种秘密社会"，这些学生"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少而游戏时多"，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总之，留学外洋是"利少弊多，难得资力"，"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支持留学事业的曾国藩已于几年前去世，国内顽固派官员本来就坚决反对派留学生，此时更是借机全盘否定留学事业。有人

上奏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甚至原来支持派留学生的恭亲王奕䜣也态度生变。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于是，朝廷责令李鸿章等查明此事，对失职官员坚决调离，对留学生要严加管束，有不服从者“即行撤回”。李鸿章立即致信容闳，批评他严重失职，要他今后少管留学生事务，同时命令陈兰彬、吴子登等“设法整顿”留美幼童，但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勿因个人积怨将事态扩大。

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此时才知道陈、吴等人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说明真相。但为时已晚，朝廷已深受陈兰彬等人的影响，认为留美幼童问题严重，容闳难辞其咎。而且，陈兰彬等人继续连上奏章，罗织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将留美学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态度后，容闳又气又急，四处奔走，想方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挽回事态。由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学校长、老师、幼童监护人联名给清政府主管留学事务的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盛赞留美幼童近十年来的表现，说他们品学兼优，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殊为可惜，对中国来说损失巨大。大文豪马克·吐温亲自找到曾经访问过中国、与李鸿章相识的前总统格兰特，请他帮忙。格兰特立即给李鸿章写信，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这些学生在美完成学业后再回国，否则极为可惜。

但这些全无用处，当时国内朝野上下，无人知道、理解美国名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很可能以为只是一个“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鸿章得到格兰特的信后则举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协办法，显示出典型的“李氏处事风格”。但这时朝廷已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 年 6 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上《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援引陈兰彬的话指责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不辨是非，“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提出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从 1881 年 8 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与大清王朝撤回留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国

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1854 年，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了大门，一些藩国的首领认识到“开国进取”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顾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数学生到欧美学习。自明治维新以后，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成为日本国策。1869 年派了 50 个人，1870 年派了 150 人，到了 1873 年，就有上千人在欧美留学。派出的留学生中还有五名女生，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了九岁的津田梅子，慰勉她到国外好好学习；有一位还是詹天佑在美国的同班同学。很多留学生回国后，在日本的军事、教育、政治等各方面的体制现代化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中、日两国留学事业的不同命运，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不过，其意义不容低估。与日本明治时期留学生对本国的作用相比，留美幼童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出洋留学”所面临的反对、困难和障碍要比日本强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意义或许更大。从晚清直到民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艰难行进着，而人数不多的留美幼童在这困难重重的转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牺牲，国务总理一人，外交部长两人，海军元帅两人及海军军官多人，铁路专家和管理者十四人（五人是铁路局长），矿冶专家九人，军医四人，电信专家和管理人员多人（三人担任电信局长），航运造船多人。其中，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创办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而教师、律师、医生、新闻媒体人员、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则更多。

容闳的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但毕竟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是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声。而且，更是后来越来越强劲的“教育救国”思潮的先导，今日提出的“科教兴国”，亦可溯源至此。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首批派遣留学生毕竟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

直接沐浴“欧风美雨”，开创了“西学东渐”的新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参与维新

幼童留美计划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他的美国妻子又患重病，虽然容闳长期悉心照料，妻子还是在1886年初夏病逝，留下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容闳回忆这一段时间说，1880年到1886年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幼童留美的“平生志愿”横被摧残，妻子又病故，“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两儿失母时一才七龄，一才九龄。计嗣后十年，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

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常为自己报国无门而无限惆怅。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以前曾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兼翻译，容闳在美与他相识，爱国心切的容闳连发两信给他，提出两大抗敌对策，要他转交给张之洞。第一策是中国向英国商借一千五百万元，购军舰三四艘，雇用外国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日本“首尾不能相顾”，必然要调回部分在朝鲜的兵力，中国于是可乘机急练新军，海陆并进，抗击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给任何一个欧美强国，借款四亿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与日本长期战斗的军费。或许这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但他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对容闳的建议，张之洞倒是认为第一策可以一试，而第二策万不可行。于是发电报给容闳，要他立即前往伦敦办理此事。得张电报，容闳更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自己义不容辞，立即由美赴英，几经努力，与英国银行界人士达成借款协议，以中国海关税作为担保。由于清政府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权争激烈，李鸿章与张之洞二人矛盾重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互相拆台。张之洞提出的以海关税为担保向英国借巨款之举，被慈禧、李鸿章

否决。

长期居住美国、满怀爱国热情却颇为天真的容闳，对高层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了解不多。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有位高权重的张之洞支持，肯定没有问题，就抓紧时间与伦敦银行集团签订合约，没想到最终竟未获最高当局批准。伦敦银行集团却以毁约为名质问容闳，为何事先不与中国政府商定就匆忙签约。他们指责、控告容闳欺诈，并准备向法庭起诉。后经美国朋友调解，容闳才未被起诉，最后悻悻然回到美国。

容闳虽然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还因此被英国银行指控，但他仍不气馁，满腔爱国热情也并未因此减弱，反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而更加高涨。返回美国后，他立即致电张之洞，表示仍愿为国效劳，请张指示“此后进行方针”。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得张电后，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的朋友照料，起程回国，于1895年夏初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脱下西装，穿上刚刚买来的清朝官服，戴上假辫子，匆匆赶到南京，拜谒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每当容闳问起伦敦借款之事，老于宦道的张之洞总是回避岔开，也不告诉他朝廷未批准的原因。但提起李鸿章，张之洞则恶语不断，容闳对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政治的复杂腐败，这时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会见中，张之洞问他有何兴国之策，他向张之洞提出聘请洋人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使中国行政机关依西欧成规，重新组织建设。

这些建议说明，容闳认为中国已到需要进行制度改革、重建的时候了。对这些建议，张之洞并未理睬，只给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空衔。顶此空衔，容闳每月无事可做，却可领150元的高薪，让不少人羡慕。但一心想为国做事的容闳感到非常烦闷无聊，不到三个月就辞职回到了上海。

虽然建议未被采纳，但容闳爱国之心不死，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的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还没有国家银行，这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根本就不知近代银行

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后又将美国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了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条陈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都作了详细说明，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附有草图，并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创办方案，是国人闻所未闻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专门召见了他，翁在日记中写道："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就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被盛宣怀破坏了。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在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盛宣怀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龢，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䜣、奕劻、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他。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了其利益，因此也表示反对。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容闳

的筑路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容闳听说自己办银行、修铁路的计划最后被朝廷否决时非常惊讶，他确实想不到清政府已腐败到如此地步，一切要金钱开道。慈禧宠臣、最有实权、坚决反对“新式”事业的荣禄更是最为贪渎之人，凡事大多以向他行贿多少来决定行否。他认为，容闳从海外归来必定非常富有，必有厚金进献，所以最初对容闳态度颇好。但容闳对这种“潜规则”一窍不通，认为只要自己的计划对国家、对朝廷有利，就会得到朝廷首肯，根本没想到或不屑于行贿，结果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荣禄也表示反对。

无情的事实使容闳对清政府贪腐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也更加愤怒。他一针见血地写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

洋务派愿意创建现代银行、修造铁路，无疑较反对兴办这些近代新事业的顽固派更为开明进步。不过，由于这些新事业、新项目利益巨大，涉及各利益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往往不择手段地争项目、争投资，想方设法阻挠、破坏他人立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与分配，应有一套规范、透明的制度与程序制约，使之尽可能公平、公正。否则，必将导致贪渎泛滥、贿赂公行，政府与社会将会迅速腐化。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一直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建立最基本的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的巨额投资完全由官场的权力、权谋和金钱主导，这是清王朝最后覆亡的重要原因。

这时，已有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开始要求朝廷进行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奏请修筑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大抱不平。

容闳早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制度问题，只是没有一个政

治力量可以依靠，因此一心想借助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直到最后朝廷制度的改造，并对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借力洋务派的努力最后失败了，但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政治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精神焕发地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容闳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的成立大会，对康的主张大为赞同，以后维新派开会他都积极参加，一起商讨变法大计。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下，实行"三湘新政"，成为维新运动中最有生气的省份。湖南维新派积极与容联系，容也对"三湘新政"大表支持，举荐不少新式人才赴湘，双方互通声气，遥相呼应，相互支持。此时，康、梁刚登上政治舞台，容长康 30 岁，长梁 45 岁，已有相当的社会声望，而且与康、梁是同乡，因此康、梁对他十分尊重，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维新派人士尊称容为"纯老"、"纯公"、"纯斋"。而容在东华门附近的金顶庙（又称关帝庙）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商议变法大计的场所，几乎就是维新派的会议室。他们的许多重要建议、奏折和应对策略，都是在此讨论产生的。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统筹全局"的奏折中，估算概行新政大致需要"五六万万"之款，因此建议派容闳赴美筹款，并多次对其人品倍加称赞，推荐他担任外事联络（如向外国借款、办理外交等）职务。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容闳参与维新派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注意。1898 年 5 月中旬，坚决反对维新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弹劾维新派官员张荫桓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与洋人时相往还"，虽未明说，却明确含有与洋人勾结、卖国、汉奸之意。近代以来，这是中国政坛攻击政敌最厉害、最有效的武器。

6 月中旬，光绪皇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制度变革必然会严重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9 月中旬，双方已经水火不容，最后刀枪相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并无实权，而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维新的慈禧手中，尤其是军权完全被她掌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谭嗣同在 9 月 18 日深夜，只身前往手握一支新军的袁世凯寓所，劝说袁支持维新，武装保护光绪皇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维新派约定

在容闳寓所会面，等候谭的消息。当晚，梁启超先来容寓，稍后康有为也来此，他们与容一同紧张地等待谭嗣同的到来。谭嗣同带来的消息并不乐观，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随后两天，又传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但袁不表支持的消息。维新派一片愁云惨雾，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天真的容闳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出面一试，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朝廷进行外交干预，看能否挽救维新败局。但康有为等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没有军事压力，仅凭外交手段根本不能使慈禧就范，便谢绝了容的好意。9 月 21 日，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清政府下令通缉康、梁，杀害"六君子"，严厉处罚参与变法之官员。在清廷四处捕人、风声最紧之时，容闳首先想到的是康、梁等人的安危，设法帮他们出逃。他曾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写信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设法营救梁启超。

容闳是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自然也被清廷"撤差"和通缉。这时京城已是缇骑四出，官府疯狂抓捕维新党人，一片恐怖。容闳冒险潜逃出京，跑到上海，藏身租界以躲避清政府追捕。

概括地说，容闳从积极参加洋务运动到积极支持维新运动，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容闳最早从美国回国时，就想以引进大机器生产、派遣留学生和变革政治制度等三项措施使中国富强。只是由于当时连引进大机器生产、派遣留学生都阻力重重、十分困难，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无人敢行。所以，当时他能做的对中国最有益处的事情就是积极参加洋务运动，把各种新事物引入中国。

二、当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后，即容闳参与洋务运动三十年后，洋务运动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意识到，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出现，就是这种认识、力量的代表。当这种力量出现后，早就持此观点的容闳自然参与其中。

三、容闳早期的洋务活动使他与洋务派官员有相当程度的私人交往，但留学生被遣返，尤其是后来办银行、修筑铁路的计划被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官僚破坏，使他对洋务派更加失望。对洋务派的失望愈

深，对维新运动的态度自然愈积极、坚定。

走向革命

由于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了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于是她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1900 年 1 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黜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元善，容闳将他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的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留美的幼童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 1884 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 年 3 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结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能召集五百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 3、4 月间，经容星桥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于 19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 年 10 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 1900 年夏进入北

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其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而是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或剿或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黜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因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的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 年 6 月 19 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的提议启发而来。

这其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 年 7 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

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任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经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如上所述，容闳对张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张之洞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认为慈禧仍将执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2日凌晨，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三十余人，当晚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上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皇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然而，一旦确定慈禧仍掌大权，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为洗清自己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而因此“立场不坚定”之嫌，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中开列的“匪首”名单上，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

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而且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鼓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并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 8 月 29 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办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 月 1 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又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运动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红龙计划”

1901 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地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这年春天，容闳来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游览。此时，日本派驻台湾的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子爵，两人见面时，清政府已将抓捕容闳的通缉令传送给香港、澳门、台湾殖民当局，要他们协助配合清政府捉拿容闳。

与容闳见面时，儿玉将此通缉令拿出给容闳看。容闳不知儿玉意欲何为，冷静镇定地对儿玉说："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儿玉又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旧报纸，上面登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容闳给张之洞的条陈，其中有向欧洲某国抵押台湾借巨款反抗日本侵略等内容。儿玉问容闳，这个条陈是否确为他所写。容闳凛然回答说，确是出自自己的手笔，"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容闳的大无畏气概赢得了儿玉的尊重。儿玉告诉容闳，自己马上要升迁返国，邀容到日本一游，并说可以将他介绍给日本明治天皇和政界重要人物，容闳以年老体弱婉拒。

9 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联系密切。1902 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了，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并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于 1901 年拉开序幕，到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一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于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他们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于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

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 年 11 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发起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 15 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地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写道："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人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也会被人认为"无理"。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 1906 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的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 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确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

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的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间，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人认为变动的机会来到了。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第二天，容闳又致电荷马·李，抄录中国各秘密党派、会社名单，内有革命党领袖孙文。他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致力于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的介绍下，孙中山与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讨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他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实。

1910年2月，容闳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 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 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率军队；3. 组织、训练海军；4. 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3月初，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与布思、荷马·李再次认真商谈，逐条落实借款事项。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五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经多次协

商、反复研究，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达成了五条协议：1. 向美国财团借款350万美元，分四次付给，作为军事经费；2. 在借款手续上，由孙中山草签一个由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字的借款文件，作为正式借款的凭证，并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负责具体办理借款事宜；3. 认真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能人才进入内阁；4. 请美国军事家帮助，训练一批军官，增强起义指挥能力；5. 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组织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型起义，暂时停止华南和长江流域的小型而准备不充分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组织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他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病卧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1. 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2. 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3. 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

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表示病愈后想回国看看。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容闳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 月上旬，年老体衰、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舍不得放弃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 月 21 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经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的确有其独特的意义：

——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虑地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是一个时代、阶段被另一个时代、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由于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能够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毅然投身于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

的重要特点，这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其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政治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新出现的政治力量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最终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的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的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对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予以坚决反对，将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上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于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容闳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并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一定爱朝廷，更不一定要忠君。

“二张”的命运

张佩纶、张之洞这两位直隶同乡曾是清末政坛重要政治派别“清流党”的两员健将，以清流“二张”著称，名重一时。但后来一个发配流放，一个位极人臣，天壤之别，屡为人叹。二人宦海生涯的顺逆升沉，生动地反映出清末政坛的种种“世相”。

从清流到洋务

政坛总有不同派系，清末同治、光绪两朝，所谓“清流党”就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系。“清流党”是当时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松散团体，成员多为“言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不掌实权，不负责具体的实际事务；以维护纲常名教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正”为己任，并以此针砭朝政，推崇气节道义，抨击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反对学习西方，强调严守孔孟之道，大胆弹劾他们认为有悖于儒教纲常的大臣。他们以“敢言”著称，但背后亦不无个人动机，因为一旦通过“清议”获得名声，高官厚禄便随之而来。

“清流”之所以能声震一时，甚至影响朝政，根本原因还是慈禧的支持，因为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势力渐大，慈禧在不得不倚重他们的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地压制、控制其发展，所以借助于“清流党”打击湘、淮“疆臣”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而且，慈禧在与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后，二人的“联盟”迅速破裂，恭亲王与其争权，慈禧想利用“清流”打击对手。她以

操纵各派之间的“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威，因此，对言路一时颇为优容，使“清流党”得以存在，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对“清流”，时人又以谐音“青牛”戏称。在“清流”诸臣中，直隶“二张”被比为“青牛二角”，以喻其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之凌厉。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1848 年出生于官宦之家，1871 年年仅 23 岁即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作诗云：“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才华横溢，少年得志，自我感觉极佳，难免年轻气盛。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1837 年出生于官宦之家，1863 年 26 岁中进士。26 岁中进士虽不算晚，但他 15 岁即中举人，在京城以少年才子享名一时，本以为很快就能考中进士，没想到主客观原因使他十余年后才成为进士。但这十余年并未虚度，他曾回乡办“团练”，防备太平军北上，又曾入山东巡抚文煜幕。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对世事及官场的了解较其他“清流”为深，因此更少书生气。

虽然“二张”在光绪初年曾联手为“东乡惨案”受害农民上疏鸣冤，纠弹制造惨案的权臣，使沉冤最终昭雪，两人声名大震，但两人行事、为文的风格、策略大为不同。

当时的人形容张佩纶“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频频上书，被他弹劾者朝内上至尚书、枢臣，朝外则有总督、巡抚，如川督丁宝桢、吏部尚书万青黎、工部尚书贺寿慈、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董恂与王文韶、光绪的老师翁同龢、首任三口通商大臣并首位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崇厚，还有内务府大臣、贵州巡抚、船政大臣、浙江提督、吉林将军……据统计，被他弹劾的三品以上大员就有 21 人，三品以下者则不胜枚举。对被他弹劾的人，慈禧往往并不深查即“罪之”，这是以往少有的，所以张佩纶言论更加锋利，因此“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甚至连他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与张佩纶相比，其貌不扬、身材殊矮的张之洞则低调、老到得多。有人统计，他身居“清流”时所写的数十本奏折、附片，弹劾他人者绝少，几乎都是“言事”而非“对人”，即多为对内政外交的建言献策。他弹劾、谏议的案件虽然很少，但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与分寸，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桩，如“东乡案”、“崇厚案”、“庚辰午门案”等都获成功，

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说，与其他“清流党”人相比，张之洞“宦术甚工”，即精通当官之术。他为慈禧违反家法和祖制强立载湉（即后来的光绪）为帝辩护，深得慈禧好感。而他与陈宝琛不避慈禧太后威严抗疏力争，使慈禧改变原议的“庚辰午门案”，为他赢得了“铮言回天”的一片赞誉，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为官之道。

“清流”当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在关键时刻，一些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的“清流党”人不惜枉礼枉法，支持慈禧，助其渡过“合法性危机”。1875 年 1 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选新皇帝。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因为当时载湉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众人对她强立载湉为帝虽十分不满，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只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和御使潘敦俨上奏，非常婉转地表示不满，前者被慈禧传旨申饬，后者受到“夺职”的处分。慈禧这种“枉国法、干舆论”的做法只遭到了一两个并无实权的官员温和的反对，很快为其压下。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三月（1879 年 4 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在蓟州的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此次吴可读以死犯谏和其遗疏的激烈言辞，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上两次那样发一通上谕申斥不仅无用，而且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

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个人的态度。“清流”之辈张之洞、宝廷、黄体芳、李端棻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为慈禧辩解。张之洞重申慈禧说法，强调此举“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强调，儒家经典的一些“精言”已“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这些“精言”干扰当今国家大事，自然于国家、朝廷不利。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慈禧能渡过严重的政治危机，张之洞之疏影响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开始受到慈禧的“恩宠眷顾”。事实说明，所谓“纲常名教”，说到底只是这些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自命的“清流”手中的工具，既可以违背纲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纲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实际为某人辩护，是“打”是“辩”，端看自己需要。

“立嗣风波”使张之洞得到慈禧恩宠，而一年后的“庚辰午门案”，则使他赢得朝野一片叫好。1880 年是农历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的胞妹、醇亲王福晋送八盒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许走午门，何况也无人事先通知，所以把守午门的护军玉林等照例不许李三顺通过。李三顺倚仗太后之势，强行闯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李三顺丢弃食盒跑回宫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当即命令总管内务大臣会同刑部严惩玉林等一干护军，“首犯”要办成死罪，其他人也要监禁、流放。如此处理，朝野不服。经各方运作，几个月下来，慈禧才同意将玉林等人或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且“遇赦不赦”，或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则交刑部严加议处。护军忠于职守却遭此严惩，众人依然不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陈宝琛愤然于胸，准备上疏抗争。

在这几个月中，宫中发生的两件事更让张之洞觉得上疏时机已到。原来，午门护军与太监发生冲突后不久，内务府施工时，在慈禧常去的长春宫天棚内发现大包黑火药和大量火柴（当时名为“洋取灯”），很可能是要谋杀慈禧。此是重案，因门禁松弛，杂人渐多，根本无法查清是何人所为，但起码太监有失察之责。另一件则更为荒唐。一天中午，慈禧在体元宫西暖阁正准备吃饭时，听到外面有连续的咳声，忙问是谁，回答说是“内监”。但放眼一看，却是一平民老汉，一边持烟杆吸烟，

一边咳嗽吐痰不止。慈禧大怒，命人将其捉拿审讯后才知，此人名叫刘振生，是住在北京西城的百姓，因认识一位太监，就请他将自己带进皇宫开开眼界。这位太监将他经神武门带入宫内，守门护军不敢拦阻；进宫后太监有事离开，刘竟一人走进深宫。慈禧当然怒不可遏，刘振生被处死，而那位太监、神武门当值护军及其他有关者都受到诸如充军流放、革职等处罚。具有讽刺意味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上谕还痛斥守门护兵说："宫禁森严，竟任令该犯走入，门禁懈弛已极，实堪痛恨。是日值班之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加议处。其该班章京，着即革职。兵丁即行斥革。"

张之洞上疏的重点在强调太监恣横为祸最烈，并举这两个案件为例，说明门禁懈弛的可怕后果，要求严惩涉案太监，并请下旨要内务府大臣今后对太监应严加约束，申明有关禁令。但对数月前受冤屈的午门护军，全疏却无一句为之辩解，因为张之洞深知慈禧禀性，唯恐如此一来反会坏事。所以，他还一再叮嘱陈宝琛上疏时千万不要提从宽处罚护军之事，因为这含有责太后处分不当之嫌；全疏应着重于门禁和对太监的管理、处罚，希望"太后之自悟"；言辞不要过激，以免惹怒太后，"致无益有损"。恭亲王奕䜣读后，手拿张、陈两疏对其他御史说："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张、陈上疏及不久前的"两案"，的确使慈禧"自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她又不愿承认自己不对，所以只是减轻了对有关护军的处罚，而对太监李三顺等也略有薄惩。众人知道，能有此结果至为不易，朝野上下对张、陈称赞不已。

"清流党"气盛一时，不可一世，举凡军国大事、内政外交、财政收支、人事升降等等，无不"指点江山"；而且这些书生尤喜谈兵，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具体的用兵之道、战略战术都谈得头头是道。如此雄才大略，朝廷自然重用，其中一些人或被派到朝内实权部门，或被派到地方当一方大员，开始掌握实权。

张之洞与张佩纶便先后被外派，从"清流"而主持实际事务。主持实务后，才知许多事情并非本本那样简单，不变通不行，张之洞渐成"洋务派"。由此，二人的命运发生了判若云泥的变化。

官运云泥

1882年元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主政一方，终于跻身封疆大吏之列。

1882年元月到1884年5月，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两年零四个月。在这两年零四个月中，他席不暇暖，整顿吏治，清理地方财政，裁撤摊捐，清丈地亩，劝本务农，赈荒救灾，严禁烟毒。最重要的是，在主管实际事务的过程中，他渐渐感到中国的传统方法已不完全适用，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他接受了多次到山西赈灾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西实行“洋务”的建议，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他聘请李提摩太当顾问，由李在太原组织学会向官员和士大夫演讲，并伴以各种实验，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他认识到山西的洋务远远落后于沿海各省，于是专门设立了洋务局，要求下属学习、讲求洋务。他在《延访洋务人才启》中明确表示：“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西方“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

由于治晋有方，1884年5月末，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清廷任命张之洞为战争关键处两广的总督。他支持黑旗军，起用冯子材，协调战争中的各方各派关系，保障后勤，镇南关大捷，张之洞功莫大焉。正是中法战争，使他对洋务的认识更加深刻，并开始在两广大办洋务。

大办洋务需要大量资金，但地方财政困难异常，张之洞于是不得不做出开放“闱姓”赌捐的惊人之举。“闱姓”是晚清两广较为流行的一种以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方式，以猜中闱场中试考生的姓的多少为输赢，故称“闱姓”。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当局为筹军饷，曾一度弛禁，但为“清流”奏请禁止。这时，原来的“清流”张之洞奏请开“闱姓”之赌，自然引起轰动。“山西禁烟，广东开赌”，引人讪笑，种种严厉抨击、参奏接踵而来。无奈之中，张之洞给朝廷上了《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为自己辩解。他分析了不得不弛禁的客观原因后，对那些主

张严禁者，他写道："命意何尝不美，陈义何尝不高。然但论闱姓之当禁，而不考历年之未尝禁，且不思禁省不禁澳之不如不禁"，如果弛禁，则"军饷多一来源，民间少一搜刮"。命意美、陈义高却不切实际，正是那些熟知经典、崇奉本本、死守教条的"清流"的问题所在；"清流"只有面对实际，才会知道不能凡事都按本本、教条去做，才有可能摒弃嗜好空谈大话的陋习而逐渐"务实"。张之洞是"过来人"，对此体会一定格外深刻。

从 1884 年到 1889 年离任，他任两广总督四年，大力推行洋务事业，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由此，他成为洋务派后期的领袖人物，成为晚清一代名臣。离粤后，他先后担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晋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光绪帝死后，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他又被赏太子太保衔。1909 年秋，张之洞病逝，三天后清廷即上谕加恩谥予"文襄"，备极哀荣。

与张之洞的官运亨通相反，张佩纶却是仕途坎坷潦倒。1883 年年底，张佩纶进入综理洋务的总理衙门，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开始管理实际事务。以言官翘首而执掌实际事务，35 岁的张佩纶官至正三品，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但进入总理衙门只几个月，政坛突发变动。慈禧与恭亲王奕䜣的矛盾白热化，最终在 1884 年 4 月下旨罢免奕䜣，史称"甲申之变"。但张佩纶"不识时务"，上疏为奕䜣辩护，触怒慈禧，被严斥。5 月中法战争和战未明时，张佩纶坚决主战，言辞激烈。出于种种考虑，慈禧干脆任命这个喜谈兵事其实毫不知兵的书生"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前往福州主持防务。7 月 3 日，张佩纶抵达福州，以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充任事实上的前线主帅，而且还是主持复杂的"现代化"军舰为主的海战，虽然尽心尽力，备战措施却难得当。8 月 23 日下午，海战打响，马尾港内 11 艘中国军舰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被击沉 9 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江之败，原因多多：有中法两国军舰水平的差距，参加马江之役的中国海军装备技术要比法国落后 30 多年；有两国兵力的差距，而张佩纶曾向北洋、南洋求援却被拒。当然还有张佩纶备战、指挥的失误，

如将船小、炮火弱的福建水师的所有舰只集中停泊一处并紧靠法舰，对部下提出的将军舰与敌舰保持一定距离的要求置之不理，使军舰全部置于有强大杀伤力的法国现代化舰只的火力之下；还下令在没有火炮的运输舰上布置300余名官兵，想在战斗中撞沉敌舰然后登舰与敌兵短兵相接。熟读经史的张佩纶还使用诸如让士兵换上商人衣裳，派人在岸上插许多旌旗以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用火船攻击敌舰，或许想上演一出当代“火烧赤壁”吧。

战斗打响后，从未到过前线的张佩纶上山观战，法舰炮火之猛烈远远超出他的想象。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主帅”张佩纶惊恐万分，从后山仓皇而逃，全然不顾自己平时总是慷慨激昂、大言主战的形象。当时下着大雷雨，他的鞋都跑掉了，“中途有亲兵曳之行”，狼狈不堪，跑到18里外的彭田村才安顿下来。而船政大臣何如璋也逃之夭夭。

马江之败，其实清廷应负最主要责任，但专制政府的责任历来是责下不责上，张佩纶自然罪责难逃，先被革去三品卿衔，而后又被革职并从重处理，被发配到察哈尔充军。这一年，张佩纶三十有七。令人深思的是，清廷开始命令左宗棠和其老部下、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杨昌濬查办马江战败责任时，左、杨认为张佩纶只是“调度乖方”之失，且“勇于任事”、“尚属不避艰险”，建议“请旨交部议处，以示薄惩”。但慈禧勃然大怒，严斥左、杨“语多含糊”，对张、何“情重罚轻”、“意存袒护开脱”，下令将张、何二人“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张佩纶曾是慈禧的宠臣，这次慈禧却定要严惩，原因殊不简单。其实，就在任命张佩纶出京赴闽的同一上谕中，还命令同是“清流”的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名为重用，其实是要将这些“清流”赶出京城。“南洋”由曾国荃主管，本无陈宝琛之事，但陈还是因所推荐的两名将领在中法战争中败仗连连、“荐人失察”而受到朝廷降五级调用的处分，适逢其母病逝，丁忧回家乡福州，从此在家赋闲25年之久。“北洋”因李鸿章主管且无战事，故吴大澂保住官职，但也自此离开京城。他们的出京与受罚，标志着“清流”的解体。不久前，这个强大的政治派别还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不到一年便土崩瓦解，只因此时慈禧已剪除政敌，大权在握，无须再借“清流”敲打异

己。相反，“清流”的存在已成为她为所欲为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句话，“清流”本就是最高统治者打人的工具，兔死狗烹，中国政治传统向来如此。只是慈禧为削其势力而把他们赶出京城太过于迫不及待，甚至不惜以“会办”军务之名，全然不顾书生典兵可能酿成大祸，未免太把军国大事视同儿戏。或许，对慈禧来说，与争权夺利相比，军国大事只能是“儿戏”。

清代制度，察哈尔都统驻在直隶省的张家口厅，负责管理察哈尔八旗，遣戍官员到达后，由都统指定具体军台。1885 年春夏，张佩纶被派到张家口之北、条件更差的察罕陀罗海，开始了为时三年的罪臣流放生涯。哪知他来到荒僻的察罕，竟引起了蒙古王公、俄国商人和日本“游历使”的注意，访客不断，朝廷立即关注，都统急将他追返张家口。

作为罪臣，自然没有官俸，京中家眷也供养困难，开始变卖家当。他的第一个妻子朱芷芗已于 1879 年病逝，1886 年流放中，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病逝，他与朱所生二子尚幼，只能来戍地倚他为生，生活自是更加艰难。对于自己戏剧性的宦海沉浮，张佩纶发出了“朝是青云暮逐臣”的无限感慨。好在京中好友时常寄赠银两，尤其是李鸿章，多次赠银不菲，使他平安度过三年戍期。1888 年春，张的戍期已满，按例要交“台费”、“部费”三年共计 2000 两，这笔巨资又是李鸿章一力承担，他才得以释归。

李鸿章之所以慷慨援张，是因为其与张佩纶本有“世谊”。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曾任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太平军攻打安庆，张印塘因守卫庐州要隘集贤关有功而升任安徽按察使。这时，李鸿章正在安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团练，与张印塘属“患难之交”，且张守卫的庐州就是李鸿章的家乡，二人交情更深。1854 年张印塘在任上病逝，这时张佩纶才六岁，李鸿章即资助张家，将张印塘的灵柩送回河北丰润安葬。以后张佩纶步入政坛，李鸿章一方面“念旧”，一方面欣赏其才华，故对他一直另眼相看。同样，张在官场上也给李“面子”，他“以直声震天下”，参劾过的高官举不胜举，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清流”总是厉声抨击主和，李鸿章对外历来“主和”，自然时时受到“清流”的猛烈攻击，但张佩纶在与其他“清流”一起抨击“主和”时，却从未对李

点名指责，只是曾间接地批过李一味主和是“直苟且欺饰以误朝廷”。1879年，张佩纶相继丧母丧妻，经济困顿，情绪低落，李鸿章赠白银千两作为营葬费用和守孝之需，并想请他入自己私人幕府。因为按规定，父母故去丁忧之期未满不可出仕，但可入幕。李请张入幕，一是想用张之才，二是借此使张能有不菲的收入。张佩纶过津时，李曾主动看望，二人来往更加密切。现存二人之间的六百余封信函表明，两人对朝政意见曾长期互相沟通。尤其是在进入总理衙门的几个月里，张更是两三天就与李通一次信，向李详告各种情况。此次张佩纶落难，李鸿章不仅不吝钱财助其渡过难关，还多次去函表示慰问。他以长者身份劝张说：“公是有心人，惟矜气过重，视事太易，致此蹉跌”，但又鼓励、赞扬说国内像他这样“敏果有志略者，戛戛难之”。天津机器局将奥地利普兰德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著的《海战新义》译出印行不久，李鸿章即给张寄去：“附上《海战新义》一书，望悉心参详，较胜于故纸堆中寻生活。以水师败者，必以水师求胜，非空言大话所能济事也。”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李对张的殷殷关切。

所以，当张戍满回京，成为一介草民、四顾茫然不知何往时，又是李鸿章接纳了他，让其成为北洋总督府中为其主管文书的幕僚。对经过一番磨难的张佩纶，李鸿章更加推重，他在给人的信中称赞说：“幼樵来津旬日，意气不衰，患难之余，更进深稳。年满四十，来日正长，渑池之奋，会当有日。”他竟然将张比做蔺相如。最后，李干脆将才貌双全的女儿李菊耦嫁与张佩纶。李菊耦当时23岁，相貌出众，能作诗、弹琴、弈棋，还熟悉历史掌故，喜品评书画，由于有见识，有时李鸿章还要她代看公文，是有名的才女。宰相府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千金小姐竟要嫁与年满四十、结过两次婚且是流放归来的“罪臣”张佩纶做“第二填房”，以世俗标准来看太不相配，故轰动一时，甚至传为笑谈，戏谑文字不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并于1896年生子张志沂。附说一下，张志沂于1916年娶逊清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二人于1920年秋生下一个女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

张佩纶婚后一直住在天津北洋总督衙门内，着意回避政治。但原本

是政治中人，又是“宰相”李鸿章的女婿，还住在“政治旋涡”的北洋总督府内，最终未能逃避政治。1894 年 7 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丰岛海战中方失利，支援牙山的部队沉于海底；陆路驻守牙山的中国军队因敌众我寡而失利。8 月 1 日，清政府向日本宣战。甲午战争，事关重大，李鸿章首当其冲，张佩纶自不能免，此时他在北洋总督府亦不能不对此屡发议论、屡提建议，一些建议与李的其他幕僚不合，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就在清政府对日宣战之后、平壤战役全面展开之前，朝廷突然下诏，将张佩纶逐出天津，勒令其立即回原籍。原来御史端良奏劾张佩纶，说他以罪臣身份待在北洋总督府，紧随李鸿章，“居北洋幕中，妄干公事”，应对这几次战争失利负责。奏劾张佩纶，是军机大臣、醇亲王亲信孙毓汶和北洋总督衙内李鸿章的几个亲信共同策划的结果。因为孙向来以贪著称，十几年前张佩纶就参劾过他，故一直想找机会报一箭之仇。李鸿章左右则因对张提的意见不满而生忌恨，其中主角竟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郎舅失和，反目成仇。

不得已，张只得离开天津，但他提出想去南京，因张在直隶丰润老家已无直系亲属，且张自幼在南方长大，更习惯南方生活；朝廷则认为丰润离天津太近，所以也同意他到南京。1895 年初春，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时，被逐出北洋衙门的张佩纶携妻南下南京。随后几年国事蜩螗，张佩纶“忧伤君国”却又对政坛深感失望，无可奈何。1900 年秋，慈禧急盼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尤怕自己被列为应受惩罚的“祸首”，盼李与列强交涉，使自己免受惩罚。这时，慈禧又下旨重新起用张佩纶，赏他为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但张并无意于此，经多次催促才在 1901 年初谈判基本结束时前往北京。在形势逼迫下，慈禧也下诏变法，开始行“新政”，设立“督办政务处”统办全国新政，庆亲王奕劻、荣禄、王文韶等人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张佩纶被任命为襄办。不过，他对于仕途已意兴阑珊，不顾众人劝说坚辞不就，离京返宁。李鸿章于 1901 年深秋在北京逝世时，张佩纶在南京未及奔丧。

1902 年至 1903 年，此时已是“天下名臣”的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多年老友近二十年未见，在此期间却只见了一面。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一说是张之洞知道朝廷不喜张佩纶，故百般推脱。另一

说法则正好相反，谓张之洞来宁后多次想见张佩纶，但后者因当年同僚如今天壤之别而以病辞之。不论哪种说法，终归最后还是见了一面。回首当年意气风发，今天物是人非，二人垂泪而别。1903 年初，张佩纶于潦倒中在南京病逝。1909 年秋，已是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在北京病逝，清廷颁布上谕高度赞其一生并赐谥号“文襄”，可谓备极哀荣。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张”最终的命运却完全一样：“文革”中响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伟大号召”的红卫兵，在 1966 年 11 月 8 日掘开了张之洞与三位夫人合葬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坟墓，四人尸骨被曝荒野，任人拨弄踢踹，不知所终；1967 年 10 月 24 日，红卫兵掘开张佩纶与夫人合葬在家乡河北丰润大齐坨黑山沟的坟墓，二人尸骨完好，被红卫兵用锹镐捣烂。

“有学有术”张之洞

政治体制改革往往会引发政坛动荡，戊戌维新时的政坛更是云谲波诡，险恶异常。因为最高层出现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政见完全相反、斗得你死我活的两个权力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司令部”。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身处旋涡之中的大臣自然危险异常，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甚至有丢脑袋之险。

洋务、维新结盟

此时的张之洞正处在政治旋涡之中。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代表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而名声扫地，被投闲京师；张之洞则取代李鸿章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封疆大吏，成为具有开明色彩的洋务派领袖，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

1895 年 5 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变法。但上书不达，于是康决定先组会结社推行维新。北京、上海是他活动的重点。1895 年 11 月，北京成立了第一个维新团体强学会，并创办机关刊物《中外纪闻》。强学会的成立，得到了一些中央重臣和地方封疆大吏的支持，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这时身在南京，捐银 5000 两，并要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入会。谭嗣同在给人的信中说，强学会官方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朝廷内的翁同龢与朝廷外的张之洞，甚至认为现在能够顾全大局、通权达变、讲求实际的重臣，只有张之洞一人。梁启超也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也”。

在筹备北京强学会之时，康有为于 1895 年 10 月中旬曾到南京游说

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在南京二十多天，每天与张共进早餐，每隔一天就长谈一次，每次都从午后谈至深夜。对于上海成立强学会的主张，张之洞大表支持，并答应捐银 1500 两作为活动经费。他甚至向康有为表示，中国如有维新党，自己愿当领头人；如果有维新领袖，自己愿意跟随。此会的成立宣言《上海强学会序》虽由康有为撰写，但由张之洞署名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因此，时人多以为张为上海强学会会长。1896 年 1 月，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不少入会者都与张关系密切，其中梁鼎芬、汪康年等数人不是他的幕僚就是他的属下，会务即由汪康年主持。同时，上海强学会还创办了《强学报》作为机关刊物。张之洞虽然极力支持上海强学会，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列名之请："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大力襄赞，甚至要幕僚主持会务，自己却坚决不入会而在幕后指挥，实足表明他的谨慎老到，为自己留有余地。

果然，在朝内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久就下令取缔北京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张之洞闻讯立即解散了上海强学会，要他的幕僚致电上海各报，宣布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停刊。虽然如此，"洋务"与"维新"此时仍是共同点远大于分歧，而且维新派也理解张的无奈，所以双方继续合作，并将遗留资金转到新创刊的《时务报》，这笔资金为《时务报》所筹款项中最大的一笔。

1896 年 8 月创刊的《时务报》，其发起人是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三人。三人中汪是张之洞的幕僚，黄也曾是张之洞的属下，张又是最主要的"出资人"，所以虽然梁为主笔，但汪任经理，掌管报馆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才华横溢，博古通今，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宣传新思想，别有魔力，往往使人"急读之下，狂舞万状"，古国为之震撼。后来梁启超回忆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大力支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颁发《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赞扬说："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规定将

《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报费当然由官府支付。

《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梁启超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张之洞亲自写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来。他在信中谦卑地写道："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并捐银500元。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才24岁，地位不高，而张已经60岁，且是堂堂湖广总督，竟纡尊降贵恭称梁为"卓老"，急欲与梁结识的迫切之情跃然纸上。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归来途经武昌，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宾客盈门，但张接到通报后当即撇下众多客人，专门殷勤招待梁启超。晚上还正式设宴为梁洗尘接风，提出请梁出任两湖书院院长，或留其幕府任职，许以两千金相待，均为梁婉拒，但他仍与梁畅谈天下大事，直到二更时分才依依话别。张如此热情使梁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对张也不吝赞美之辞。

联盟破裂

可惜，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结盟并不巩固，接踵而来的不是进一步加强团结，联手制衡力量强大的守旧派，反而是双方各持己见，公开决裂。维新派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兴民权"，梁启超的许多文章都大力倡言民权，同时激烈抨击官场的腐败无能，甚至汪康年也发表了《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这些都使张之洞大为不满。梁启超在第40期的《知耻学会序》中痛斥官场现状："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张之洞读后大惊失色，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禁止该期在湖南发行，怒责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张还要他人致信汪康年，劝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汪自然奉命唯谨，生怕报纸惹事，而梁启超执意宣传变法维新，双方矛盾不断，日益尖锐。最后，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被排挤出《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梁、汪公开互相激烈指责、抨击对方。后来，梁启超还愤愤回忆说张之洞"以

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自已与张的关系“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媒体的“出资人”与具体办报的“新闻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外人能够厘清。不管怎样，当时即有人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公开决裂，明显对变革不利。

在维新运动中，属张之洞管辖的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等省级领导坚决支持维新运动，为其他各省所罕见。陈宝箴曾任湖北布政使，与张关系密切。湖南新政开始是大办新式企业，改旧书院为新式学馆，提倡“时务”，同时还创办旬刊《湘学报》，以开启民智。这些并不背离“洋务”的框架，所以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他还通过官方力量，使该报能在湖北全境发行。1898 年 2 月，谭嗣同、唐才常在陈宝箴支持下在长沙成立南学会，经常举办公开演讲宣传维新，不久，他们又创办了日报《湘报》，使湖南的维新声势迅速大振。湖南维新运动的急剧发展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和不满，对《湘学报》从支持到屡有批评，表示官方不再订阅，对观点更加鲜明的《湘报》则反对更加强烈。3 月末，《湘报》第 20 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他怒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相反，从第 37 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些必然使湖南维新人士对张极为不满，谭嗣同就对张的心腹汪康年抱怨说，他的做法使“湘人士颇为忿怒”，“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1898 年 4 月，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新旧矛盾斗争更加激烈。这时，张之洞发表了影响极大的《劝学篇》。他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是想“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此书详细论述了“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对顽固派和维新派都有批评，但此时维新派风头正健，此书的主要所指则

是“暗攻康、梁”，反对变革政治制度，反对民权理论。

这样，从实践到理论，张之洞都明确与维新派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劝学篇》发表后，光绪皇帝因其“权衡新旧”、反对守旧而谕令将其颁行全国，称赞此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守旧派则因其批驳康、梁而视为守旧、维护名教之论，并将其大量摘录于攻击康、梁的《翼教丛编》中。由于维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并无政治威望，无论怎样，张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称者，所以光绪皇帝颇想让他来京主持维新大业。保守派知道皇上要维新，所以也希望由张来主导维新，而不是康、梁主导。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 1898 年 4 月保奏调张入京，经慈禧同意，光绪帝立即电召其入京。得此谕电时，张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复奏说：“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于 5 月初乘船东下，准备经上海北上。事有不巧，当他 5 月 15 日到达上海后，却接到要他回鄂处理沙市教案的谕旨。原来湖北沙市突发民众反教运动，民众还烧毁日本领事所，一场中外纠纷和大规模民变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紧”，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张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 月 27 日，张之洞返回武昌。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因素，此时距“百日维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发一月，由重臣张之洞赴京主持“变法”大局，以后的历史或将改写。

为自保不择手段

虽然回到湖北，但此时朝内的维新之事已紧锣密鼓地进行，如此政治大变动，张之洞自然密切关注，暗中活动。“百日维新”开始，光绪任命的参与新政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这“军机四卿”中，刘光第、杨锐均与张关系密切。刘、杨均为张之洞托陈宝箴出面向光绪举荐。尤其是杨锐，为张的“第一亲厚之弟子”，且长期为其幕僚。张的

儿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情，张都托杨办而不托其子。朝中事情无论巨细，杨锐自然也向张详细禀报，实际上是张的坐探。当维新运动达到高潮，康有为得势时，他曾密电杨锐，自己与康素来不和，要杨警惕康，“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坚决反对光绪皇帝变法的态度已明，光绪地位岌岌可危，光绪正是通过赐密诏给杨锐向维新派透露这一消息的：“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

在这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的儿子、侄子、侄女婿，门生黄绍箕、心腹幕僚钱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触角伸向各方，四处打探消息，与各种人物联络。深知宦海风波险恶的张之洞明白，如此关键时刻，任何信息都不能遗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就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张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请要他进京“入枢”主政的消息，急忙电告钱恂：“如拟召不才入京，务望力阻之，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他知道，此时进京将直接卷入慈禧与光绪的尖锐冲突中，无疑是往火坑里跳。此时的“万万不可”与几个月前“无论病愈与否，亦必力疾起程”恰成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时机的艺术。政变发生后，他指示属下与荣禄、袁世凯等慈禧宠臣加紧联络。政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点名抓捕梁启超时，张之洞就致电有关者说“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于慈禧的态度，一方面又急电有关人士，想营救心腹杨锐。他辩护说，杨“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实系无辜受累”。为杨辩，其实也是为己辩。但在营救杨的同时，张又致电慈禧太后，要求严惩维新党人，严惩包括杨锐在内的“六君子”，以此洗脱自己。对杨锐的死，张之洞内心其实异常悲痛，所以1902年当他再署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时，又到曾与杨把酒畅谈古今诗文、经史百家的地方，捐资修楼，名为“豁蒙楼”。世人都以为“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而不知其实是张感慨旧事，为杨锐而建。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杨锐曾在张面前将杜甫长诗《八哀》背诵无遗，并反复吟诵其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最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

蒙蔽。”张之洞当时大为感动，印象深刻，故修此楼以怀念故人。

虽然与荣禄拉上关系，荣还主动告诉他要给慈禧的“训政大典”发“贺折”，但他毕竟有开明、求新的名声，特别是曾与康、梁关系密切，杨锐、刘光第、陈宝箴等均是他的属下，所以他又成为保守派攻击的目标。几个月前曾保奏过他的徐桐现在又上书慈禧，指责他变节，成为康、梁的同路人，要求严惩。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决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其实只是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很难有大的作为；没有维新派打前锋，洋务派便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派攻击的对象。

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张之洞想方设法将曾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尽可能抹去，有些做法甚为可笑。维新运动初起时，张在南京代理两江总督，与康、梁交好，一次游镇江焦山时，突然对时局大发感慨，遂在松寥阁题写长诗，其中有赞扬维新派人士的字句。天下名臣题的诗，寺僧自然将其精装悬壁。戊戌政变发生后，张忙派梁鼎芬乘小兵船星夜赶往焦山，问寺僧张督的题诗是否还在。寺僧拿出卷轴说：不敢损毁。梁鼎芬忙说：张总督想再题跋于后，题好后再还给你。于是将卷轴取回，撕碎后烧毁。

为了洗刷自己以求自保，张之洞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迫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逃亡日本后，在日本继续进行反对慈禧的维新活动。张之洞以“通洋务”、能与洋人打交道自命，所以不断通过日本驻上海领事、驻武汉领事、驻华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将维新人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认为张未来在中国政坛将举足轻重，而且张许诺如果自己渡过目前的政治危机，日后将扩大与日本的合作。在张之洞三番五次的要求下，日本政府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向康有为和王照施压，迫使二人先后离开日本。后来，康有为从加拿大乘船返港，途经日本横滨，日本政府仍拒绝其上岸要求。为了在境外将康有为“搞臭”，张之洞竟将其心腹幕僚梁鼎芬编造的充满诬蔑之词的《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刊布发行。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日本政府同意报纸刊登此文。

这一系列举措终使张之洞平安渡过了这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甚至更

获慈禧信任。但曾经热情接待、夸赞康、梁的张之洞，现在为自保又如此不择手段，欲置康、梁于死地而后快，必为时人所不齿。章太炎在政变发生后，曾鄙夷地对友人说："今日中国之反复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确实，以"儒臣"、"忠信"著称的张之洞在这次风波中的表现，使其道德声誉严重受损。或许，张之洞因此格外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他曾问自己的幕僚高某："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某回答说："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岑西林为岑春煊，袁项城为袁世凯，岑、袁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说张"有学无术"，显然是门生、幕僚深知老师、幕主心事而曲意讨好的谀词。张之洞闻之高兴不已，故作谦虚、实为自夸地说："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精通权术者，大都不愿承认自己精通权术。

其实，对张之洞最为准确、客观的评价应是"有学有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所推崇的"学"，即儒学所称的仁、义、礼、智、信，只能用于"平常时期"，而在生死关头的"非常时期"，他所实行的恰是他在书本中所不屑、所严斥的"术"，如荀子之倡恶、申不害之教人不诚、韩非子之教人不务德行、公孙龙之巧言无实、鬼谷之阴贼可鄙……但是，这种丝毫不讲信义、不顾道德的权谋术数，其实并非张之洞所独有，而是专制制度下绝大多数官员面临此情此景时合乎理性的选择。在面临革职甚至杀头之险时，能不顾身家性命而坚持理念的官员毕竟少之又少，所以，只要在"平常时期"不贪渎或少贪渎，为官一任时能有所建树，管理一方能大致安稳，能在一定程度上体察民情等等，就是难得的"好官"啦。因此，不必因"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就在道德层面上对"张之洞"们过分苛责；在专制制度下，确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专制制度必然使官德败坏，而官德败坏必将导致社会风气败坏。

总督的抉择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地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渡过了一次次的严重危机，其权位反而更重更高。

“小事勇”、“大事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除掉这心头大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了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

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命人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于是慈禧采纳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准备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即同治皇帝立嗣，溥儁是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作准备。出乎慈禧意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 von 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光绪皇帝被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并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求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的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病。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令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

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上海《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大阿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上是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会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的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张之洞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而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举棋不定。于是，他致电闽浙总督许应骙，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的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示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为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的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东南互保

清廷颁布“立储”诏书后，载漪入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此前平庸无闻的端亲王顿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一些王公大臣竞相向他献媚，以期今后得到这位皇上父亲的恩宠，一些顽固派大臣更是积极向其靠拢，因此他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这样，朝廷中一个以载漪为中心的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迅速形成。载漪急于将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更加不择手段，完全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大清王朝的安危。他们的观点、利益和立场与慈禧完全一致，自然得到慈禧的强力支持。这样，清廷的内外政策便完全由慈禧、载漪集团决定。

由于各方反对，慈禧未能废黜光绪，隐患仍在。在各种反对声中，她最忌惮的还是列强的态度和干涉，因此对洋人极端仇视，载漪集团对洋人也是恨之入骨。但他们又知道自己无力打败洋人，便将目光转向民间兴起的义和团。

对义和团，张之洞一直主剿，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也都坚决主剿。较早时，张曾致电一位京官，说“扶清灭洋”的口号是会匪的一贯策略，“若因此姑息，大误矣”！义和团“能避枪弹，更是谣言”，如果因此而害怕义和团，则“更大误矣”！

5月末，义和团在朝廷的支持下向直隶、京津发展，行为更加过激，烧焊北京一些店铺，并拆毁铁路，焚烧车站，张之洞立即致电荣禄：“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则“各国必以保护教士教

民为词，派兵自办，大局将难收拾”。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对义和团由抚改剿。6 月 15 日，张之洞、刘坤一联衔电奏朝廷，力促朝廷改变政策。他们提醒朝廷：对义和团“如果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并表明自己心迹：“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所以恳请朝廷明降谕旨，立即镇压义和团。由于此奏意见与朝廷方针正好相反，所以张、刘事先曾反复电报磋商，字斟句酌。刘坤一起草的电稿原有劝朝廷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后改为张之洞提出的“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虽然实质仍是剿灭义和团，但语气缓和了许多，“后抚”之说照应了朝廷的政策，并未完全否定朝廷支持义和团之举，不使朝廷产生臣下忤逆的感觉，可能更易为朝廷接受。此奏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张之洞专门电刘，要其加上的：“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乱，悔不可追。”他们强调：“机变甚速，间不容发。”

清廷从 6 月 16 日到 19 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虽然朝廷在 6 月 17 日收到张、刘电奏，得到主和派官员的强烈响应，但最终仍无法改变慈禧向列强开战的决心。6 月 19 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两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张之洞、刘坤一认为大祸临头，但还想作最后努力，于是联络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湖北巡抚、江西巡抚及长江巡阅水师大臣联衔电奏朝廷，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土匪”、“劫盗”，滥杀中外无辜、“华洋均受其害”，所以“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保护各国商侨、教士和使馆，向各国政府致歉，对 6 月 11 日被清军杀害的原日本使馆参赞杉山彬“优加抚恤”。最后，他们几乎是哭求朝廷：“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

然而，众多封疆大吏的哀求依然无济于事，慈禧于6月21日发布对外宣战上谕。为了自己的权力，慈禧向来不惜一切代价，因此在权争中总能获胜。而且，她把“中国”、“大清”和自己的权力分得清清楚楚。对她来说，有中国而无大清，中国便无意义；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因此，为了一己之权，她故技重演，以为仍可获胜，把中国乃至清王朝都作为赌注，押在了一场明眼人皆知必输无疑的赌局上。

在朝廷与各国正式宣战之前，以张之洞、刘坤一为核心的东南地区督抚感到大局已难挽回，于是开始大胆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张之洞、刘坤一多次与外国驻汉、驻沪领事馆和有关洋人联络，一再表示决不愿与洋人开战，坚决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一方平安的主张。英国担心他们无力保持局势稳定，提出可以派军舰进入长江协助，但被张、刘拒绝，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长江流域稳定。同时，张之洞还致电一些驻美、驻日大臣，要其劝说两国仿效英国，不对中国东南动武，“共保东南大局”。在张之洞、刘坤一的指示下，早有此意的盛宣怀在东南官员之间和中外之间四方联络，积极奔走，成为“东南互保”的穿针引线者。李鸿章、袁世凯也对“东南互保”表示坚决支持。这时，京城义和团在载漪、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的唆使下正在加紧围攻各国使馆。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张之洞闻讯大惊，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与刘坤一商量就自作主张，以与刘联衔的名义给荣禄发电，请求荣禄设法保护各国使馆，将使馆人员安全转移到天津，如此以后还有议和、谈判的可能。他强调，能救使馆一个人即“减祸一分”。他还数次与其他督抚联衔电奏，恳请慈禧太后极力保护各国使馆。

就在东南各督抚开始与列强谈判的关键时刻，慈禧于6月21日向各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同时，朝廷还在20日、21日先后下达了命令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的谕旨。张之洞、刘坤一知道事关逆旨抗上，非常担忧。而盛宣怀也担心宣战上谕一旦公开，谈判将功败垂成，于是立即建议张、刘令各电报局不准公开宣扬此谕，只能“密呈督抚”。盛还电告张、刘，劝他们在未正式接到朝廷宣

战上谕之前，赶快与各国领事订约，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为打消张、刘的担忧，盛宣怀还说：“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不能不有所变通，“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经张之洞、刘坤一指派，以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于6月26日在上海正式就“东南互保”与上海各国领事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保证东南和平的《中外互保章程》。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参加“互保”。

“东南互保”与朝廷的“宣战”谕旨显然相悖，所以张之洞、刘坤一在签约的同一天就联衔电奏慈禧，沥陈苦衷，有理有据，希望使朝廷接受他们的所作所为。此奏由张起草，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赞同朝廷向各国“宣战”和招募义和团民的政策，并劝朝廷改变政策：“此次大患在与各强国一齐开衅”，“拳会仅持邪术”，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躯战胜列强的炮火。“以京师之重地，作孤注之一掷，危迫甚矣”。“论兵力，一国焉能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焉肯输一国，不胜不止。”结果必然是“各国大队直入京城，宗社乘舆何堪设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者也”。而且，长江沿岸只有抢劫偷盗的“会匪”、“拳匪”，“并无拳会之党可招”。在论证了朝廷面临的可怕局面后，他们自然得出为全国计、为朝廷计应实行“东南互保”的结论：“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强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矛盾严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他们坦承，在长江流域如果只与一国开战，有可能支撑半年，但如果说可以抵抗多国，则“臣等诚不敢故作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张之洞抓住谕旨中有“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尽量将“东南互保”说成是符合圣旨的“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之举。当然，他们不能不表示：“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

力抵御，存亡与共。”最后，他们特别强调朝廷不要将驻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国，即是明言决裂，自认攻毁各国人命物产，以后更难转圜，似宜仍令暂驻各国为宜”。尽量为朝廷日后议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东南互保”的《章程》签订两天后，朝廷的“宣战”谕旨才在上海公布，张之洞、刘坤一向盛宣怀等保证，一切责任都由他们两人承担。但慈禧在“宣战”后给他们的上谕中，对他们的违旨不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他们的“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并且朝廷“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经过一番串联，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省份也先后参加“互保”。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张之洞、刘坤一在8月17日忙致电各国驻上海总领事，为慈禧开脱，说“东南互保”“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所以请求联军“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此电虽短，却用意殊深。慈禧此时最怕被列强作为“祸首”严惩，为其开脱正中下怀；为其开脱而将“东南互保”说成是按照慈禧旨意办理，慈禧根本不敢也不愿否认。所以，此电在讨好慈禧的同时，又使她不能否认“东南互保”是“奉旨办理”，因此更具“合法性”。

于是，中国大地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如此“怪象”充分说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已迅速减弱，因此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并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抗衡朝廷几近疯狂的决策而“东南互保”，才使中国最富庶繁华之地、为数不多的新式工商业最集中之区局面大体稳定，免于被战火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同时也阻止了列强势力在长江流域更迅速、更强烈的深入。从清廷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的确为朝廷后来“转圜”、与列强议和、慈禧被免于惩罚作了重要铺垫。所以，当朝廷与列强“议和”成功，当初强烈主战的顽固派大臣如载漪、毓贤等受到严惩，而“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张之洞、刘坤一大受表彰。张赏加太子少保衔，刘赏加太子太保衔。1909年张之洞病故，清廷在褒奖上谕中还不忘提此一笔：“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镇压自立军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 年出生的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之举，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经汉口时，传来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

1899 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 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并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两万人，分

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 8 月 9 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仍按原计划于 9 日起义。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因孤军奋战，被镇压了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的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于 8 月 14 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是在弦之箭，不得不发，故决定于 8 月 23 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枢纽，用武之地也，而商务日盛，当道者狃于形胜，防御不密，可袭而取也”；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了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附提一句，“保皇派”在策动“拥张独立”的时候，“革命派”孙中山正在紧张地策动“拥李独立”，活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独立。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可以说，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

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两千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了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是静观局势发展，准备相机行事。在局势未明朗之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的反慈禧的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就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行动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敢贸然行动。

局势很快明朗：8 月 15 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仍将在慈禧手中。从 8 月 18 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 23 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作出最后的抉择，抢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 22 日凌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共二十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二十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地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过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而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全都故意含糊其辞、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而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酷决断。他的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唯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之门正在迅速关闭。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敞开之日。

第二辑　民国的新意义

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

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愁解闷、缓解心情高度紧张之用。没想到，这本原来供梁消遣的小说竟令他激动不已，引起强烈共鸣。

《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小说把这几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流亡志士会聚在一起，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中日战争这百余年的历史事件穿成一线，各国独立运动的名人也相继登场。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改革与革命的波澜壮阔和腥风血雨。如此内容，无疑使刚刚经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的梁启超感同身受。所以到日本不久，他便将其译为中文，并从他创办的刊物《清议报》第一册就开始连载。

此书在《清议报》的连载引起了巨大反响，1901年便出版单行本。梁氏意犹未尽，一时技痒，在1902年干脆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发表这部作品，梁还专门创办了文学杂志《新小说》。这部小说共五回，约九万字，并未写完，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宣扬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

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罗”是光绪皇帝的姓爱新觉罗之意，“在田”是光绪名字载湉的谐音。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第三任大统领。“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此时刚到日本尚为留学新生的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辛亥前后多以黄克强称之。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他在1902年对十年后所作的预言之准，令人惊讶：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定都南京。至于“黄克强”，那是蒙对的，可不必当真。然而应当一提的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虽只寥寥数语，却是意味深长。“上海世博会”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展示各种产品，进行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将其办成来自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与交流的公共空间，大上海“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在他看来，思想的“展示”要比物品的“展示”重要得多。

好在现实世界的“上海世博会”已经开幕，究竟是一个只展示产品的“世博会”，还是各种思想观念百家争鸣、百家争妍的“世博会”，梁氏的这个预言究竟准不准，这个期盼憧憬能否实现，已经揭晓。

“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作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儒学、孔子的崇敬自不待言。不过，他对别人的尊孔、崇孔并未一概肯定，而是要考察其行为动机。若有他认为“行为不端者”和“动机不纯者”，则百般讥讽乃至谩骂。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原来，清代国子监肄业的生员称监生，但其中大多数仅是挂名，因为只要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捐一个“监生”。这些挂名“监生”并无资格到国子监中正式叩拜孔子，所以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之说。辜鸿铭对孔教会中诸人，尤其是陈焕章不满，因为他认为孔教会表面尊孔，实际上是为营私谋利。对于陈焕章的为人，他更是不齿。

陈焕章于1881年出生在广东，青年时曾随康有为求学于广州著名的“万木草堂”，为光绪进士；1907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11年夏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孔门理财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所以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主张尊孔者的

强烈反对。陈焕章此时回到国内，发表了《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1912 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还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下者，收银五分，十六岁以上，收银一角。”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国总统大位的袁世凯的支持和种种帮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和公文。1913 年 6 月 22 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急忙离沪进京，以配合袁世凯尊孔。他联络了一些孔教会代表向正在制定宪法的参、众两院请愿，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深通权谋之道的袁非常明白，传统的“礼治”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独裁专断，而现代的“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在 1913 年 10 月 10 日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在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但在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人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人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时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款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多数人是从“学理”的角度来反驳。而复旦大学创办人、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马相伯则指出了陈焕章背后的敛财目的。因为陈焕章等规定，入孔教会者无论男女老幼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而这次《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还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 200 元，以后再纳则加倍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 4 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 3000 万，仅此项收入即达 1.2 亿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二三万户，收入也很可观。实际上是将“孔夫子”当做“财神爷”。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

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陈焕章则代表孔教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定孔教为国教”称为“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法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最后这句“孔道一昌，邪诐斯息”倒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代统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与用心。正、副总统发电，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广西、江西、安徽、云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长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过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陈焕章等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促其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 11 月 10 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1 月 26 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6 年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的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这年 6 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同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

赞扬公布祭天祭孔之制是袁世凯的功绩："袁氏将来不可磨灭之处，即在于是"。并激烈指责那些反对派议员是还不如袁世凯"之真能代表民意于万一"的"败类之议员"，仍是"诚可谓无教之禽兽矣"。陈的请愿书刚刚提出，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他们还威胁那些反对的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由于赞成者与反对者势均力敌，因此争论激烈，久议不决。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他本人出任会长，张勋、康有为等为名誉会长，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并以要"组织各地尊孔会代表进京请愿"向国会施压，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在孔教会会长康有为的参与下，于7月1日正式拥戴溥仪复辟，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并亲自修改了宣布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可惜孔教会还未大展身手，这次只有短短12天的复辟，就在举国反对、段祺瑞的武力讨伐下宣告失败。段祺瑞掌权后，陈又转而投段，甚至直接从政，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并被授予文虎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当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会上书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时，梁启超也名列其中，还著文加以辩解说明。但陈焕章及"尊孔派"的种种表现，使梁很快就对此不以为然，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表示质疑甚至反对。在1915年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中，他针对这些人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和道德败坏归咎于国体变革、孔教未受尊崇和提倡自由平等之说写道，这些老官僚、老名士与道德家"三位一体"，"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其真实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对新政新学。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为名而

道德败坏，也是些权位不高的年轻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其实，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曾经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的梁启超都看穿了陈焕章及孔教会的真实目的，更不必说一直反对陈焕章的辜鸿铭了。因为辜鸿铭虽是“顽固守旧派”，却是奉清王朝为正朔，所以从袁世凯辛亥的“逼宫”到后来“帝制自为”，他一直将袁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而陈焕章居然支持袁世凯，还先后投靠段祺瑞、徐世昌，在辜鸿铭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他当然要痛骂陈焕章为“陈混账”。胡适记下的是1921年辜鸿铭的痛骂，而两年后，陈焕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并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而臭名远扬的曹锟，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看到陈焕章如此这般的表现，辜鸿铭很可能更加愤怒，骂得更加激烈恶毒精彩，只可惜没有人记录下来。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

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如果说因为鲁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学家而不是所谓学者，所以他的这些深刻近于刻薄、尖锐近于尖刻的言论全是过激的“当不得真”、不足为据的“小说家言”，那么，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海内外当代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则不能等闲视之吧？他在《道学政》中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他所说的“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非陈焕章一类莫属。

所以，如果真信、真爱、真想弘扬儒学，尊孔敬孔，与其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孔，不如严责那些把孔子当做“敲门砖”者和那些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才是对儒学造成“最严重损害”的真正“肇事者”。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不必细究，那么更重要，更应该深思、检讨的是当下“尊孔”与“权”和“利”的复杂关系。

尽管反孔的鲁迅与尊孔的辜鸿铭两人立场完全不同，但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与辜鸿铭“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讽刺谩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语点破了“尊孔”背后的权与利的目的。的确，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不乏其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或许是“孔圣”的不幸，不过，或许这也正是“孔圣”千百年来一直香火不断的重要原因呢！

“五四”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历史、思想史的影响既深且远，对新文化运动亲历者的影响更不待言。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等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发生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后不同的政治选择，都引人深思。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大力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化教育”和“党化统治”。对此，胡适公开表示激烈反对。在他参与创办的《新月》杂志上，从 1929 年 4 月到 6 月，胡适连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这些文章认为，今天侵犯言论自由、公民财产和人权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中国的进步需要民主、法治、宪政。他尖锐地指出：“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他举例说，安徽大学的刘文典因为当面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了好多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评孙中山后来只讲军政、训政，不讲宪政，并从哲学上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及《新月》发表的其他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文章，使国民党大为震怒。从 8 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发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攻，对《新月》和胡适全面围剿。在舆论攻击、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严厉的政治迫害。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于 8 月 24 日作出决议，呈请

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撤职惩办，北平、天津、江苏、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纷纷响应，要求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甚至要求将其逮捕“法办”。10月4日，教育部发出“训令”，警告胡适。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店员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杂志被没收……

面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胡适立即写了一篇名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发表在《新月》上，力图分析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说国民党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他进一步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所以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他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国民党拒不接受批评，仍坚持与新文化运动相反的种种做法，“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谥号的”。

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胡适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中国迫切需要团结，需要政府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尖锐

批评者渐渐变为“体制内”的温和批评者和“建言”者，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政治立场开始有变，但胡适对国民党仍时有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仍无变化。1935年5月，他又写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强调“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此时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受到批判和抵制。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从社会进步、革命成功的角度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但在现代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是势单力薄，难成“气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适感到自己对国家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1938年秋出任驻美大使，尽力促美对日作战。就这样，他虽然一直未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深怀不满，但与国民党的关系一步步加深。直到晚年，居住在台湾的他虽然对新文化运动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扰”颇有微词，但对新文化运动依然赞赏有加；并因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对蒋介石不尊重“约法”一而再地连任“总统”而与国民党当局又起激烈冲突，国民党发起了对他的批判运动；曾在众人之前反驳蒋介石认为忠信悌孝、礼义廉耻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强调“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令蒋大为恼火；在逝世前不久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仍坚持“五四”时的观点，反对“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说法，强调西方近代之科学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在台湾又引起了对他的新一轮批判，以及直到他身后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论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老师辈”，闻一多是受其浸淫的“学

生辈"，但对新文化理念的坚守同样坚决。

众所周知，"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于 1946 年 7 月 15 日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对共产党抱敌视态度。由亲蒋反共突转为拥共反蒋，变化如此之大，自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但国民党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是促使他政治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华和外国留学读书时，深受国家主义、渐进改良思想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它们是只破坏不建设。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谴责张学良，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地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校刊》第 799 号，1936 年 12 月 16 日）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直到 40 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1943 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书中内容给闻一多以强烈的刺激。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尤其是"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

的立场。”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有皇权专制，反而中国则相反，不仅历史上从无皇权专制，反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无论在战时或在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今后立国的基础。

一向信仰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闻一多，实在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 4 页）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对共产党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而彻底的。为了维护“五四精神”，争自由、争民主，闻一多于 1944 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最后，他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种种因缘使胡适、闻一多二人最终的政治选择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五四精神”，对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理念、情感的坚守和维护相当一致，确实耐人寻味。

梁漱溟的意义

自 50 年代受到激烈批判后，梁漱溟先生就被打入“冷宫”。年轻一代当年多从《毛选》五卷中毛泽东对他的如此这般批判嘲讽中，略闻其名：“梁漱溟反动透顶”，“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及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梁氏刚刚“解冻”，但仍未成为社会“热点”，其“意义”尚未被发现。他的《东方学术概论》与《人心与人生》两部书稿的遭遇，颇能说明他彼时的境遇。他在这数十年冷寂岁月中沉思已久、潜心写就的《东方学术概论》一书手稿在出版送审过程中居然丢失，足见其被忽视的程度；而《人心与人生》的书稿送到多家出版社通通被拒。《人心与人生》的序言发表于 1926 年，最后成书于 70 年代末，所以这部书可以说是梁漱溟一生最重要之作。但在 80 年代出版此书不仅要冒相当的经济风险，而且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所以没有出版社愿冒此“双风险”。最终，通过种种努力，此书由梁氏付出一笔不菲的资金后，才得以在 1984 年“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绝对“洛阳纸贵”，各出版社一定竞相出高价抢出此书。不过揆以当时情况，虽然要求他“自费”，但愿出、敢出此书，足以说明学林出版社的眼光与胆识至为难得，功莫大焉。

时代精神说变就变。从 80 年代中期起，梁漱溟先生的人品学问突然成为“热点”。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当时“文化热”中讨论、研究的热点。他的东西文化观、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影响既广且深。继而，他在 50 年代就敢于

坚持自己观点当众与毛泽东争辩，那种“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嶙嶙风骨，与几十年来，尤其是“文革”中，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不是盲从就是随波逐流那种自我的丧失与人格的琐屑形成鲜明对照，赢得广泛的尊重，并在初起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引起深刻的反思。直到现在，虽经多年风风雨雨，但对梁漱溟研究、思考的热度依然未减。

今天，当“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思考时，梁漱溟当年积极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更成为关注的焦点。

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先生 24 岁就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但他完全不是躲在学院、书斋中的学者，不是在“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而是满腔热情地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他积极参与种种社会、政治活动：考察北伐，发动乡村建设，投身抗战，积极组建民主党派，致力于民主运动，调解国共之争，为和平奔走……而乡村建设，则是他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手段和方案。

1927 年，中国大地风狂雨骤。国共合作的北伐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前进时，两党却突然分裂，刀枪相见，一片血火；农民运动声势浩大，打土豪、分田地、斗斗杀杀……这一切，都引起梁漱溟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必然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局面”，而“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做些个建设事业”，这个“建设事业”就是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他明确表示了希望在体制内，通过手握大权的“上焉者”的改革而不是体制外的暴力革命达到政治、社会面目一新的目的。“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严重危机早已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一些人提出了“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各种改革农村社会的方案。例如，国际社会委托国联调查组在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商品市场，提出了著名的《拉西曼报告书》，并组织对华技术使用委员会，希望通过兴修道路、水利，改良农作物，发放贷款等措施复兴中国农村。而国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了广泛的乡村教育，米氏兄弟在河北翟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乡

村自治和建设，阎锡山在山西也以建设新农村为号召。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广泛的参观和调查研究后，梁漱溟更坚定了以“乡治”、“乡村建设”作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虽然他对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十分钦佩，但他也看到了这些地方乡村建设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全局观念，教育不尽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等。他对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建设最为不满，认为问题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作用太大，民众作用太小，而且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所谓建设反而会成为官员敛财的借口。他尤其强调乡民的自觉主动性，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管制。“政府愈管则人民愈被动，愈被动，愈不动”，“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则自治之生机已绝。”“对于山西村政的批评此两句话可以尽之：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山西各项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过，人民纯处于被动，其易有弊害，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今日也应时时记起的警世之言。

他还形象地比喻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全国党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设’，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始，应有尽有。”总之，他认为乡村建设如果不是由最底层的村民自己动员起来的自己的运动，则必然要失败。

经过一番考察，梁氏先后在河南和山东个别地方进行了乡建实验，其基本特点是在以伦理为本位（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的社会条件下，重建乡村自治组织。他认为，乡村组织的关键是借助中国传统的“乡约”制度。之所以说“借助”，是因为中国传统乡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官家”所控制，甚至成为一种官僚统治工具。而梁氏心目中的乡约是一个由乡民自愿发起、自觉维护的社会组织。他承认，农民自发组成乡约并非易事，所以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因此，乡村组织的关键其实在于乡学、村学。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

这种希望当政者支持却不干涉具体事务、通过教育实现农村革新的

做法，在当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全国农村而言，就显得杯水车薪。另外，当时农村最迫切需要的是改革或曰调整旧的土地关系，梁氏希望通过改革而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这种土地关系，无疑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但旧体制的主政者并未能“从善如流”，听从体制内的梁氏及其他类似者的意见，未对土地关系作实质性的调整和改革，他的实验之实效不能不大受影响。

当诸如梁漱溟这类用心良苦的“补天派”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执政者的赞同、施行时，“失败”就是这类体制内改革者的必然命运；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革命者即将取代改革者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革命”已经很难避免了。

教育总长蔡元培

近代中国面临社会的全面转型，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培养发育重要途径的教育，尤其是教育体制，无疑面临根本性变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由国家开办的新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嚆矢。但这些学堂仍居于社会、体制的边缘，备受歧视排挤，没有引起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则将“变法”与“兴学”联系起来。在社会结构、价值体系、知识谱系的大转变中，学校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即意味着独立于国家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多元化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产生、传播，因此要求承载其重任的教育必须独立。或者说，教育只有独立才能起到开创历史的作用。对此，已有一些思想家在清末就提出这种主张，如章太炎认为“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严复则一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将“治学”（做学问）与“治事”（从政）分开，强调应该“政、学分途”。王国维则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1912 年清朝覆亡，民国初创，蔡元培以辛亥元勋与学通新旧的著名学者，众望所归地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在中国语境中，以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教育独立”这一历史性课题。

早在就任教育总长之前，他就确立了“教育独立”的理念。蔡元培是清末翰林，少年得志，应该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从 1907 年到 1911 年末在德国留学四年，他的教育思想深受 19 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者洪保（Wilhelm von Humboldt）和当时德国其他一些思想家

的影响，主张大学自治，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2年，作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总长”，他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否定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忠君”、“尊孔”这两个思想专制的中心宗旨，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思想自由：“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如果将“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定于一尊，必将桎梏受教育者的心性灵智，长此以往，必将造成民族的愚蒙退化。“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他又批判“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即封建专制的教育目的在于愚弄受教育者，使之心甘情愿地被统治者驱使。他对封建专制教育实质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孔子、儒学并非反对、拒斥，而是不同意将其作为一种“准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强迫学校灌输、学生接受，反对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孔子顶礼膜拜。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他谨慎地表示对于“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在临时教育会议上，他又提出“学生不应拜孔子案”，由教育参事蒋维乔作说明，列举了学校不应拜孔子的三项理由：一、“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二、“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三、“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在他看来，思想自由、多元，是教育独立的重要条件。

将教育从统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强调教育的独立性，确有

划时代意义。再进一步说，即便作为纯学者、纯教育学家，提出这种观点在当时已属不易，而身为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员，蔡元培不仅不扩大自己的权力，反而主动“放权”，则更为难得。因为古往今来，从政之后为权、利所诱，改变、背弃自己原来的学术观点、政治思想的学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昔贤垂范到斯今”，作为教育总长却提倡教育独立，而不是强调、扩大教育部和总长对教育的权力，唯愿后世主管教育的官员们都有这般识见与胸怀。

身体力行是蔡氏特点，在民国初年党派纷争激烈的环境中，他请资深教育家范源濂（字静生）做教育部次长。由于范是与国民党作对的共和党人，一些国民党元老、亦是其好友对此举大为不满，颇为愤慨，而另一方面范本人也不愿为“敌党”所用，坚辞不就。蔡元培不顾党内同志的反对，两次拜访范源濂，诚恳地对他表白：“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经过他的劝说，范氏欣然就职。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前清学部人员胡玉缙的《孔学商榷》一文，颇为欣赏，便邀胡到教育部工作，并不介意胡曾是“旧政权”的官员。没想到，教育部承政司在委派胡工作的便函中有“奉总长谕”字样，胡甚不满，立即写信给蔡元培，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惟‘谕’字似承亡清陋习，现虽一切程式尚未规定，而专制性质之字样，必屏而弗用。民国前途，方有冀幸。”对胡的批评，蔡元培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复信致歉，表示接受，承认自己对此“字句小疵”负有责任，并进一步反思道：“无论专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谕，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议，致承政厅遂袭用之。”

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自己当教育总长时的用人原则："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教育部一半部员竟由范源濂提出，可见他请范源濂出任次长是真正授其实权，并非要其仅仅"挂名"，只是显示自己包容各派的"点缀"。

教育要超越党派，承认教育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一党之私产，因此教育应"立在政潮外边"，确是他的真知灼见；而以一个党派要员执掌教育行政部门，却力邀敌对政党的合适人才做自己的副手，则是他的胸襟、人格的显现。

民国初创，以前专制王朝的教育制度必然面临根本性改变，首任教育总长自然负有重新制定全国学制的重任，好在蔡元培于此早就胸有成竹，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为新生的共和国全面制定了大、中、小学学制。这个新学制推行了十年，直到 1922 年 9 月才由他主持作了修改。

然而，民初的中国并未给蔡元培提供实现自己理想的环境。袁世凯的专制使他忍无可忍，最终辞职。在他当面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时，袁为博取名声，以"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表示挽留时，蔡则坚定地以"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回答，表明决不与其合作的立场，最终于 1912 年 7 月辞去了只当了半年的教育总长之职。

他知道，在专制政治之下，难言教育独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怀着对国事备感失望的心情和对西方文明作更深入了解探讨的理念，蔡氏于 1913 年秋踏上了为时三年的赴法游学之路。

大学不是衙门

1917年元月就任北大校长时，年已半百的蔡元培在政坛和学界的地位早已奠定。此后在北京大学的短短六年，是他壮阔一生中最为辉煌、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段历程。时至今日，他之所以一直被人们以崇敬之心、景仰之情反复纪念、思念、怀念、探讨、研究，盖因“北大校长”矣。在蔡氏之前之后就任北大校长者不乏其人，而唯独他享此尊荣，足见并非“北大校长”使其有此崇高历史地位，而是他“校长”北大而使中国教育、文化进入新境界。

1916年夏，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暴毙而亡，中国开始陷入军阀混战。各路军阀忙于你争我夺，无人关注教育，客观上为教育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自主的空间。1916年末，蔡元培在友人的力邀下回国，于1917年元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所收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多数学生都雇有当差，是为了做官而求学。而学堂的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多为官僚。由于学生是为今后做官而来，所以教员受欢迎的程度不是由其学问的高低而是由其官阶的高低所决定。1912年民国成立，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便想将“衙门”化的京师大学堂改造成真正的大学，将学校改名为北京大学，总督改为校长，各科监督改为各科学长，等等。但他不久即辞职而去，未能实现改造北大的计划。1917年他重返北大时，发现并无根本性变化，他曾谈起当时北大学生“仍报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北大仍是旧式“衙门”。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在校长就职演说

中，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要求学生抱定研究学问的宗旨，注重道德修养，敬爱师友。以后他多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是做官的场所。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谈到改变北大校风的计划，首先“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是“纯粹之学问家”受重视还是由官僚政客或所谓“学官”主导，这对任何大学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强调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不是“衙门”，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任何机构都是一种组织，都要有制度管理，要有管理者，大学自不例外。但把大学作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与将其作为“衙门”的管理方式则大不一样。

在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的北大，实际上就是一个“衙门”，一切都是校长说了算，所有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极少数人参与决定，连各科学长都不得与闻，一般教授、讲师更无缘置喙。在德、法游学多年，深受“教授制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影响的蔡元培认为，北大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他决心改变这种“衙门”式管理体制，代之以民主的现代学术机构的管理体制。

1917年，他到北大不久，就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负责学校各种章程、法规的制定。同时，各学科的废立、各门课程的多少及改革、学校的财政安排、聘请新教授等事项，均须经评议会严格审核才能通过。评议会的评议员全部是教授，校长与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各科评议员由本预科各选两名教授做代表，任期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文本科教授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教授沈尹默、周思敬等都曾担任过评议会评议员。1917年底，他主持召开评议会会议，决定设立各学科教授会，教授会会员由各科教授和讲师组成，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1918年，共成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哲学、经济、法文、德文等共十一个学科教授会。1919年北大

采用分系制后，学科教授会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系主任由本系教授会会员投票选举产生。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蔡元培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教授参与管理。1919 年底，在评议会下另设立三个机构：一是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的各项决议，成员必须是教授，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立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系学科主任组成，从中推选教务主任，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三是设立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人事与杂务，总务长也由教授担任。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扩大、巩固了教授治校的范围。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教授治校使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的或主导的作用，减少了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学校的行政机构确实起到了服务与辅助作用，而不是外行领导内行，行政部门“喧宾夺主”或“反客为主”，业务部门反过来为行政部门服务。而且，教授治校是基层民主政治的一种拓展。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说明，民主政治完全可以在“基层”首先实行，而这种“基层民主”的渐次展开恰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教授治校是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保证，使大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和政治斗争的干扰，在不民主的社会中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主的“小共同体”。他曾这样评说对他影响至深的德国大学制度：“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他营造的北京大学，即是这种生存于专制社会中的一个民主孤岛。

对以探索、传承知识为天职的大学来说，这种民主格外重要。对知识的追寻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必然充满种种失误、错误。只有这个学术共体中的每个人都能独立、平等地发言、批评、被批评，彼此能畅所欲言地交流、商榷，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才有获得知识的可能。现代思想家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认为，这种共同体应该形成的是“普遍权威”（General Authority）而不是“特定权威”（Specific Authority）。所谓“普遍权威”是指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知识、规则的“诠释权”，这种权威是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自由、充分地表达各自观点后，

相融而成的一种普遍意见，其权威是在民主制度下，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反，“特定权威”则是规定只有高高在上的“中心”、“总部”才有知识、规则的“诠释权”，一切重要的诠释和变革创新都由这个“特定权威”发布命令、发出宣告，而成员只能服从其决定，其权威是由上面指派的。波拉尼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威观念，一个要求大家自由，另一个要求大家服从。两相比较，“普遍权威”更有利于科学、知识、学术的发展进步。“在科学上面设立一个明定的权威类型，对科学极具毁灭作用，由科学意见以正常方式来运用的‘普遍权威’则为科学之继续存在所不可或缺。”

蔡元培的这一系列改革，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治校方针的实施获得了制度性保障。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具体落实，是从北大文科整顿开始的。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申明：“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但他深知“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提倡思想、学术自由至为不易。

北大文科一直为桐城派古文家把持，守旧派居统治地位，新思想、新观点不为所容。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为打破守旧派的“一统天下”，使北大学术、思想多元化，他着重聘请具有新思想、新观点的学者到北大任教。在短短时间内，就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思潮的代表人物（1920 年，鲁迅也来到北大）。为了表示“礼聘”之诚，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允许其将非学术性的思想性刊物《新青年》带到北大出版。新文化先锋迅速云集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蔡氏支持新学派，但并不压制坚守传统的旧学派，因此北大同时还有政治或学术观点属于旧派的学者，如仍拖长辫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

称帝、“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以及黄侃、崔适、陈汉章等。当年仅24岁、且无学历的梁漱溟在佛学研究方面才华初露时，蔡元培立即破格延请其来北大任教，丝毫未考虑他的学术、政治观点的“新”与“旧”。

如果说蔡元培对“新”派表示了更多的支持的话，则因此前是“旧”派主导，“新”声备受压抑。新旧兼容，使他往往不被双方理解。他的这种办学方针，首先遭到旧派学者的强烈指责，对此，他作了公开回答，提出了著名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当激进的青年学生猛烈攻击旧派学者辜鸿铭、刘师培，并对蔡元培仍聘用他们表示不解时，他则开导劝说，希望他们学习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他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将教师的政治观点与学术水平分离，学校只问其学术水平而不干涉其政治观点。这种将“公”、“私”区分，“互不干涉”的划分标准，无疑能广罗人才。

中国向有将不同思想观点诬之为“异端邪说”而不容其存在、强调思想“大一统”的传统，蔡氏这种容纳各派、包括自己并不赞同的思想派别，真正鼓励百家争鸣的做法，确开一代新风。其实，这也是办好大学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语境中，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权力总想介入学术；亦总有人不敢或无力进行学术争鸣，因而乞求权力介入学术。随着新旧文化争论越来越激烈，政府开始介入，支持强调传统的守旧派。一些议员向教育总长傅增湘示意，如果不撤去蔡的校长之职并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逐出北大，便要弹劾傅增湘。1919年3、4月间，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傅增湘、蔡元培等，对蔡施压。傅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致信蔡元培，要求其对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严加管束，并点名严责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对此蔡元培复信反驳，并为新思潮提倡者辩护说：“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畸。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

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他再次强调：“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教育总长傅增湘虽有总统支持，对蔡却无可奈何。这种为维护思想、学术自由，不畏强权的凛然风骨，的确令人钦佩。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蔡元培通过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社团、出版自己的刊物而使学生真正成为主体。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各种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学生创办的刊物林林总总，蔡元培还批准专门经费，并决定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给以切实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新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现代中国学界和政坛上一大批风云人物，即从北大学生社团和杂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民间社会的产生，这种公民的“自组织”是民主、开放社会最重要的基础。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师生冲在运动前列，蔡元培必然卷到政治旋涡的中心。对学生参与政治，他的观点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他认为学生应有社会责任感，有权也应该过问国家大事。同时，他又强调学生毕竟要以学习为主，对政治不必过于热衷，特别是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有赖于学有专长的专家，而非激情可以解决。对“五四”当天北大学生的游行，有关记述、回忆与研究不尽相同。一种说法是他支持学生游行，另一种说法是他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曾对学生进行劝阻。但有一点十分肯定，无论他对学生游行的态度如何，当学生被当局抓捕后，他即全力以赴营救学生。他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一定负责营救学生，为了保出学生“愿以一人抵罪”，并与其他一些大学的校长在北大开会，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校长团，向警厅、教育部直至总统府请愿。经过与警厅和教育部反复交涉，被捕学生终于在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不论蔡元培及其他一些大学校长对学生的行动支持与否，对学生的政治观点赞成与否，一旦学生因政治原因被捕，他们顶着种种压力积极营救，显示了对学生的深切关爱，也为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作出了应有的职业道德行为。

由于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制的军阀政府认为蔡元培应负主要责任，于5月8日决定撤免他的职务。由于被捕学

生已被释放，为了表示对黑暗政府的抗议，也为了避免学生因此再次走上街头，蔡元培当即提出辞呈，于9日晨悄然离京南下。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学生的怒火即将再次爆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经过反复斗争，政府被迫让步。1919年9月中旬，离开北大数月后，蔡元培终于重返北大。

中国传统女性并无受教育的权力，更不可能享受到在当时中国仍属“新生事物”的高等教育的权力。对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蔡元培一直深深同情。从投身于教育事业起，他就一直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力而努力。当上北大校长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开放“女禁”。“五四”风潮过后他重回北大，借新文化运动“风气大变”的气势，将此付诸实施。他很清楚，禁止女生上大学是“不成文法”，便巧妙地钻此空子，公开声明“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我国教育部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希望女生报考。由于当年报考时间已过，经审查资格后，于1920年春允许九位女生旁听。从1920年春起，北大就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女性上大学之先河。北大开放女禁，引起了当时掌控北京政府的军阀们的愤怒，甚至扬言要对蔡采取强硬措施。但大学开放女禁已是潮流，闸门一开，任何人都无法遏止。

重返北大的蔡元培本想从从容容地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一点点付诸实施，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蔡元培亦不能不一次次身陷其中。时代，未给他从容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他曾与胡适等人一起出面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希望以此改变政治的黑暗。军阀政府为了收买人心，似乎响应他们号召，成立了所谓的“好人内阁”，蔡元培对此一度抱有一分希望。然而，1923年11月，军阀政府终于暴露出本来面目，制造冤案，搞垮“好人内阁”。蔡元培在失望和震惊中于1924年元月提出辞职，并于1月19日在各报刊上刊登“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于1月23日离京抵津，最终离开了北京大学。

“校长”北大是蔡元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他在中国播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火种。但他深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前提是“教育独立”，在北大的短短几年，他排除重重困难，践行“教育独立”的理念。1922年3月，他在《教育独立议》

一文中写道："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此时，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已经五年，备尝艰辛，深知其中甘苦。如果说，他以前关于教育独立的言论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观念和理想，那么，此时所写的这段话，则已是饱含风霜的经验之谈，弥足珍视。

新文化与新教育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地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的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直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沿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其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

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袁世凯为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的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因缘际会，新思想在几年间便由少数人的观念而在知识界、教育界蔚为大观。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深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 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 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并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是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彼此打官腔，无法对话、沟

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仍上台大骂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这是当时民主的反映还是政府权威的缺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骂教育部、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门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中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直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

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中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入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地规范化、城市化办学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的代表《新青年》上。

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国家”：从维新到五四

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自然包括，甚至可以说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先行的转变，即通常所谓的“启蒙”。在种种启蒙的观念转变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家”观念的转变。当然，在中国的现代性追寻中，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虽最为重要却并非最先，各种观念转变从鸦片战争开始渐次发生，真正使国家观念变化的则是半个多世纪后的戊戌维新。因为变革国家政治制度，不能不涉及国家观念的变化。从维新到五四，国家观念的转变，与欧洲启蒙精神一脉相承。

西欧中世纪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人间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以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

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要求具备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契约、共同承认的一个主权。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超乎公民和居民、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进而提出了三种政体，即主权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民主政体，在少数人手中的贵族政体和在一个人手中的君主政体。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从人性论和自然法的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成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不同和差异，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不在人民手中，国家也就丧失了合法性。

维新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他更明确地就君、臣、民三者的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他们已开始受到契约论的国家观影响，谭嗣同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长久以来，“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天下尽失其权，君主将国变成

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谓“私天下”是矣。所以，一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有的国；“民”不值得也不应该为一姓之私的国去死。

从维新失败到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梁启超等人对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国家理论等。具体观点不必细论，仅从诗人蒋智由的《卢骚》便可见以契约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观念在思想界的影响之大：“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思想多变的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热情赞扬“民族主义”，严厉抨击“帝国主义”。在比较了西方中世纪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后，依然为国家的主权在民辩护。他认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他承认，19世纪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他仍强调经过启蒙运动后的“帝国主义”与之前的有本质不同：“虽然，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用今日人们熟知的话来说，就是“对内搞民主，对外行霸权”。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有感于中国启蒙的未完成，因此承继维新以降的新思潮，在国家观念的思考上继续探索。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不仅把旧的“伦理”体系作为一种习俗观念、行为规范等上层建筑加以抨击，而且作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加以批判。

在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作一比较后，他们认为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在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个人都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严密的“三纲五常”之中。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把人从这种依附性伦理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平等的人。在人人平等，注重并保护

个人权利的条件下，只能建立契约型伦理关系。因为个人的权利是独立、平等的，彼此不能依附，只能“契约”。可以说，个人独立、平等是“契约”的基础。由此，他们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根本不应是依附性伦理关系，而应是一种契约关系。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等文章中反复强调：“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得归宿之途径也。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这种新的国家观破除了“皇权神圣”、“朕即国家”的神秘观念，实际上批判了“国家神圣”的国家崇拜论。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所以，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启蒙需要长期和平环境“润物细无声”般的浸透，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启蒙一次次中断。梁启超在 1901 年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时就预感到启蒙的命运，他担忧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顽锢者流”会“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即主权在君、专制的帝国主义“以与公理相抗衡”，即与“主权在民”的公理相抗衡。他忧心忡忡地写道：“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历史证明，一百多年前的他并非过虑，时至今日，“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的那些“耳食新说”的“所谓政治学者”，不是比比皆是吗?

第三辑　新鲜的记忆

沉重的“外交笑话”

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 81 期发表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到，1952 年 5 月 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 但碍于领导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这部新闻片的结尾是周恩来答记者

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带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适，于是改称为“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学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要求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领导”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次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

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那时，还会强迫要求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　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曾有这样的年代：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的《我所

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 年 12 月 17 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于 1964 年 11 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的还是外语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 1967 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还是根据李达南先生的回忆，当 1969 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

料》也不例外。1970 年 9 月 2 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 9 月 5 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无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军国大事何可胜数？相比而言，这些都是细碎小事。然而，唯其“细小”，才更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氛围”之荒诞。在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

“蔡文姬”向“曹操”忏悔

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了一股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在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为一位“帝王将相”评功论好，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来头，大有深意。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因为一些年来，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曹操的看法，明确提出要为曹翻案。总能“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一

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

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亲人的谈话、书信及自己的读书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当这种看法频频出现在他的公开报告、演讲、谈话和批示中时，领袖的“个人观点”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导话语”。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

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在陶的记忆中，从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4 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其实，上海会议后毛泽东仍说起曹操，在 1959 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谈到了曹操。这时，郭沫若、翦伯赞等为曹操翻案的戏和文章已发表数月，所以，毛泽东在 8 月 11 日严厉批判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中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 2000 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 1000 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 3000 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二

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1959 年 1 月 25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为了消除《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也想以通俗的戏剧形式为曹翻案。1959 年 2 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 4 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

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引用了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来，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与毛泽东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此时，郭氏不仅提出要为曹操翻案，还提出要为他在1949年以前作为暴君而进行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义，不言自明。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对写这出历史剧的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 年版）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 年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

（郭沫若：《蔡文姬》，《羊城晚报》1959 年 4 月 15 日）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文汇报》1959 年 5 月 24 日）

郭沫若在发表的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还以一种奇怪的逻辑“论证”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 年 1 月 25 日）有趣的是，此时《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郭沫若：《蔡文姬》，第 60 页）但在 1978 年 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早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此时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

郭沫若写到，自己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没有想到六十多年后自己把蔡文姬戏剧化。他承认：“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郭沫若：《序》，《蔡文姬》）或许，的确有种种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现的最重要的经历和感情，是蔡文姬兴奋地对曹操歌功颂德：“我自从回到汉朝，经过长安来到邺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同时，为自己一直沉溺于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地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蔡还

感激曹操使自己摆脱了一己的悲痛，现在“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这完完全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语言。对此，郭沫若仍唯恐读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单行本序言中，还要借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对“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这“一年七八个月以前”，就是反“右”以前。

郭氏坦承，写《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为曹操翻案，是为了表现“蔡文姬”们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为“新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蔡文姬》上演后，媒体上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回忆说，这出戏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她当时还不到十岁，当然无法理解剧情，更无法理解对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但她记得：“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版）

她的记忆大体不错，开玩笑的那位将军是陈赓大将，郭沫若不仅在场，而且“玩笑”正是当面对他而开：“看戏之后，大将陈赓在休息室中看见郭沫若，郭请他谈及对该剧的看法，陈赓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党的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

笑。"（《陈赓传》编写组：《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版）真不知郭沫若面对如此玩笑和哄堂大笑时的反应如何，或会有些许尴尬罢。此虽"细节"，却也耐人寻味：如果郭真是非常"自己人"、在党内真正位高权重，以陈赓性格的幽默洒脱或仍有可能开此玩笑，但周围的"听者"敢不敢"哄堂大笑"还真说不准；即便周围人真敢"哄堂大笑"，《陈赓传》会不会记述此事，则更说不准了。

三

不幸的是，主张为曹操翻案、颂扬曹操专断的史学家，几年后却未能在"文革"狂暴的迫害中幸免。"文革"一开始，翦伯赞就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揪出，受尽凌辱之后，夫妻双双于 1968 年被迫害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压力，被迫宣布应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统统烧掉。但对他来说，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来。

1967 年，他的第九个孩子郭民英自杀身亡。出生于 1944 年的郭民英于 1964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为了学习曾将当时极为罕见的录音机带到宿舍。此时已经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个同学便写信给毛泽东，告发说这是"精神贵族"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这封信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4 年 9 月 16 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 79 期上。毛泽东早就认为文艺界问题严重，在 1963 年 12 月曾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他对此信作出了批示，赞同写信者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此事给郭民英，也给郭沫若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后郭民英学习一直不顺，第二年便从音乐学院退学。郭沫若将他送入解

放军，希望他在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中改造、锻炼。但“文革”开始后，性格孤傲，也就是类似于郭沫若说孔融性格的“乖僻”的郭民英更为这“时代氛围”所不容，终于自杀身亡。

就在第二年，即 1968 年，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迫害身亡。出生于 1942 年的郭世英于 1962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好学深思的郭世英绝不趋时从众，他和几个同样喜欢独立思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X 小组”，对当时被视为绝对正确、丝毫不能怀疑的一些思想禁区进行思考、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怎样看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探讨在当时不仅是与“法令相抵触”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他们的探索很快为公安保卫部门所侦破。1963 年夏，郭世英的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由周恩来出面过问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5 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农业。1968 年春，“文革”按照“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部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 月 19 日，他被北京农大的红卫兵关押，26 日便被残酷迫害致死。

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内痛失两个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吗？锥心之痛岂可言说！此时，悲痛万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孔融因性格“乖僻”就应当被杀的评说？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曹操那种“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的辩解？……当然，人们无从知道这位老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但从此刻起，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郭世英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拳拳之心，蕴含着怎样巨大的悲痛呵！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民族的悲剧，因此更应反思。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大文人，为统治者随意杀人作这般辩护时竟如此“自然而然”，足以说明这种“辩护”已是主导性话语，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后来“文革”的劫难就很难避免了。

历史剧于郭氏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当年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此时的“蔡文姬”则为“曹操”歌功颂德，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为曹操翻案的复杂、深刻的背景，值得分析之处有很多很多：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本应是“学术”问题，但曹操的历史定位为何有如此直接、复杂的政治因素？当与法令“相抵触”甚至性格“相当乖僻”都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包括辩护者在内的个人的基本权利还有何保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曹操、殷纣王、秦始皇的“翻案”，与后来政治形势一直恶性发展到“文革”的程度有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在均应引起深思，这样，历史才不会“白费”。

“灯塔”与“大桥”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首名为《你是灯塔》（又名《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风靡全国，但因被指与苏联一首乐曲雷同而突被禁唱。二十余年后的“文革”中，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曲亦因被指与苏联的一首歌曲雷同而被禁映，要修改配曲后才能上映。

1940年6月下旬，抗大一分校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正紧张筹备在“七一”召开该分校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要校文工团演节目，同时要创作新歌作为给党的生日和校党代会的献礼。词、曲创作任务分别交给年仅20岁的校政治部宣传干事沙洪（原名王敦和）和年仅22岁的文工团副主任、鲁艺音乐系毕业的久鸣（原名王岳）。接受任务后，两个年轻人激动不已，灵感迸发。沙洪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写好了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拿到歌词，久鸣也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把曲谱写出来了。曲调流畅激昂，有起有伏，结尾雄壮，却并不复杂难唱。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很快就口口相传，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广为传唱。先是在八路军各根据地传唱开来，很快又在被敌阻隔、远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根据地传唱，再后传到了国统区，甚至日伪占领的许多城市，也有人偷偷传唱。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首歌传唱更广，在日益高涨的争民主、反独裁的学生运动中，人们高唱此歌；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群众集会中，人们也高唱此歌……解放军开进上海时，电台开始播送革命歌曲，而《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打得好》和《你是灯

塔》这四首则每天播放。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为数不多的曲目中即有《你是灯塔》。成为开国大典的演奏曲目之一，本应是这首歌曲的光荣，是创作者的光荣，但没想到，厄运因此而来。原来，在开国大典演奏此曲时，参加典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陪同人员说："奏的曲子，像是苏联追悼歌。"

这本只是苏联文化代表团某成员个人的一句偶感，但当时对苏"一边倒"，以苏划界，以对苏态度来分左与右、敌与我、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苏联人随便的一句话便是"圣旨"。抄袭苏联悼歌，还在开国大典上演奏……罪莫大焉。于是，这首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歌曲在10月下旬便被禁唱。久鸣背着这种"罪名"，被发配到河南一个小县城，先教高中，后教初中，再后教小学，最后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文革"中惨遭迫害，眼被打坏。

"文革"结束，万物复苏，久鸣看到了希望。1979年11月，他到当年直接处理此事的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此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冯定先生家中，向其说明几十年前旧事的原委。久鸣写道："冯老对我很亲切，一再说他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对不起我。""别的同志告诉我，'十年浩劫'中，冯老受罪不轻，饱经风雨沧桑，所以能体会到被诬者的心情。"（久鸣：《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的曲折故事》，王滨主编：《永远的歌声》，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由于当时"禁唱"并无正式文件，只是口头传达、口头命令，现在也无法以正式公文形式为其"平反"。为解决此事，冯定专门给久鸣写了道歉信。得此信后，久鸣与其在延安"鲁艺"时的老师、时任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联系了《光明日报》，以在报上发表冯信和久鸣致《光明日报》编辑信说明原委的方法，为此事平反。

1980年1月15日，《光明日报》在《关于歌曲〈跟着共产党走〉》的大标题下，不仅登出了冯定的道歉信、久鸣给报社的信，还将这首歌连词带谱登出。冯定在道歉信中诚恳写道："现回想起来，这件事如此匆忙，主观地轻信人言，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是一种粗暴的工作作风！经过这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更能体会你被诬指的心情。"冯定反复

表示："我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可以"用音协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支歌的创作始末和在全国各地流行的情况"以示平反；"另外，我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发表对这件事的错误处理的经过，目的是向作者和作品赔礼道歉；另外，总结在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工作引以为戒。"至此，《你是灯塔》正式平反。1980 年 3 月 5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向全军推荐的十二首歌曲中即有此歌。

《你是灯塔》因苏联人的一句话而遭殃，而"文革"中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则因电影配乐主旋律被指与苏联歌曲《列宁山》相似，而引发一场风波。

1968 年 9 月、12 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先后建成通车，由于"文革"中经济一片混乱，乏善可陈，所以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自然被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予以热烈宣传。其实，此桥在 1960 年 1 月即已开工，"文革"前已建成大半了。为了宣传这一伟大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长长的纪录片不能只有画面和解说词，必须有配乐，此片自不例外，也配有音乐。1969 年 5 月 13 日，周恩来总理审查通过这部影片，并指示："这部影片也可以输出国外。"该片立即在全国上映，同时译制成英、法、阿拉伯等语版发向国外。

没想到，三个月后有人向江青打小报告，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立即调看电影，专门听了音乐资料，认定抄袭了《列宁山》，勃然大怒。从 60 年代初起，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开始严批"苏修"，"文革"的发动即与"反修防修"有密切关系，"苏修"进一步"升格"成比"美帝"还要可恶的"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此时，也以苏划界，以对苏态度来分左与右、敌与我、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只不过与 50 年代正好相反，略有"亲苏"即罪莫大焉。1969 年 8 月 16 日，姚文元严斥道："现已查明电影《南京长江大桥》确实采用了苏修《列宁山》的一句曲调，出现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说明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很尖锐，而新影有的人员对苏修靡靡之音竟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

“认真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破坏，有关人员做出自我批评。”江青接着批示：“还有下流小调，美其名曰‘民歌’，情郎妹子等等。”“该制片人竟对抗中央批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

江青马上在京召开有关文艺界人士的大会，在会上作了长长的训话。她回顾自己领导“文艺革命”与“文艺黑线”斗争的历史，说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起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牙慧，把苏联歌曲《列宁山》中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纪录片，是可忍，孰不可忍……由于影片中没有创作人员署名，江青下令要查清作曲者是什么人，并指示此片必须修改配乐后才能上映。于是，这部影片立即从全国电影院和农村放映队统统撤回，发往国外的全部追回，已发行的几百部拷贝全部报废，大批尚待发行的也全部追回，要修改配乐后才能重新上映。

遵照江青指示，有关部门派“联络员”进驻新影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始“清查”。制片人作检查，负责音乐者一次次在大会、小会上“请罪”、交代，音乐工作室干部全部被审查，成立“专案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全面政治历史审查，凡是先看过这部电影的都要调查、了解。一时间，新影厂人人自危。

查来查去，终于查清作曲者是上海电影乐团的青年演奏员乐祖风。乐当时才 24 岁，本是长笛演奏员，但对作曲感兴趣，“文革”中老作曲家纷纷被“打倒”，他与几位青年作曲家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他们还创作了不少音乐片断，录好音保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音乐库，作为备用音乐素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好《南京长江大桥》后，未找专人创作配乐，而是四处寻找合适的音乐素材作为配乐，找来找去，最终在上海科影厂音乐资料库里找到一些音乐素材作为影片配乐，并以乐祖风为纪录片《上海欢庆建国十八周年》所写的一段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音乐为主旋律。清理、批判完“苏修”，还要落实江青对“下流小调”、“情郎妹子”的指责。不过，有关人员一遍遍看影片，反复研究，还是找不到“小调”和“下流”的音乐，一头雾水。最后，只得把两首带有民族风格的插曲《桥工想念毛主

席》和《中国工人有骨气》重新改写，作为交代。江青、姚文元的有关批示随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音乐工作室：《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相》，《人民音乐》，1978年第2期）

由于与上海有关，上海有关方面立即召开全市文艺界大会，逐字逐句传达江青讲话，强调江青讲话为文艺界敲响了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好在经查明，乐祖风的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清二白，这首乐曲又并非他专门为“大桥”创作，而是新影厂“自找”配乐的，所以对乐并未深究，但还是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说虽然他是年轻人，但作这样的曲子说明他深受“文艺黑线”的影响，是受修正主义文艺流毒影响的具体表现，应当对其进行“帮助”。会后，乐祖风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作检查，表示自己在作曲时虽然没有想到《列宁山》的旋律，但脑子里确实残存着苏联音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清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袁晞：《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3页）

前后这两段音乐都因与“苏联”有关而遭厄运，但反映的时代背景大不相同。“音乐之声”，的确是“时代之声”的反映。其中反映出来的对文艺创作自主性的制度性保障问题更引人深思，所以，冯定先生在给久鸣的道歉信中不仅再三道歉，还语重心长地强调要“总结在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工作引以为戒”。

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1977年一个春日的早晨，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都是转播中央人民电台的节目；当我听到广播中突然说，下面我们播放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像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起来。

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文艺方面最大的“解放信号”就是每隔几天就有一两首“文革”中被禁的歌曲重新播放，意味着“平反”。但这些被“平反”的都是“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绣金匾》、《十送红军》等等，重播外国“贵族资产阶级音乐”，这还是第一次。我知道，这些音乐在“文革”前就被禁了。我父母曾经非常喜欢听中央台的“外国轻音乐”节目，但在我的印象中，这档节目在“四清”开始前就停播了，因为他们当时喜欢与几位“臭味相投”的同事谈论听后感，“四清”时被揭发出来就曾经挨批，更不必说在“文革”中成为“罪状”之一。在“文革”中，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被公开。他在1963年12月严厉地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这“两个批示”在“文革”十年

经常读、经常背，我也“长大成人”，知道了“外国轻音乐”停播，甚至听一听就是“罪过”的背景。就在“文革”后期，还专门批判过“无标题音乐”，点名批判贝多芬呢！

所以，这时突然听到中央台重播贝多芬，不能不令人震惊。这不仅意味着“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被否定，还意味着“文革”前某些“左”的东西也被否定。当时，我不可能知道，重播贝多芬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后才决定的，只是佩服电台有勇有谋，敢于播出贝多芬，并在前面增加“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导语作为“合法性”依据。

二

列宁喜欢贝多芬，有他夫人及高尔基的回忆为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高层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读“马列七本书”，这样，在“毛选”四卷外，终于还可以读马恩列斯的书了。但“马列”毕竟是洋人，所以还出版了一些诸如“名词解释”和“文革”前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文章，配合学习。列宁夫人回忆说：“印涅萨是个很好的音乐家，她鼓动大家去听演奏贝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而她自己把贝多芬的许多作品演奏得很好。伊里奇喜欢音乐，特别喜欢‘Sonate pathetque’，经常请求她演奏。后来，在苏维埃时代，他还到过瞿鲁巴那里去听某著名音乐家怎样演奏这一奏鸣曲。”（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Sonate pathetque”，即贝多芬著名的《悲怆奏鸣曲》。据高尔基回忆，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有一个晚上，在莫斯科，在叶·彼·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前妻，译者注）的住宅里，列宁听到伊撒亚·多波洛所奏的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超越人力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于是眯起眼睛，露出微笑，他不大快乐地添加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

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您的手会被咬掉的。您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的。唔—唔——任务是多么可怕地艰巨啊！'”（高尔基：《列宁》，《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无论《悲怆》还是《热情》，列宁都喜欢，确凿无误地说明了列宁对贝多芬的热爱。

刚粉碎“四人帮”，确有必要用列宁来为贝多芬提供“合法性”。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列宁向高尔基赞美贝多芬时的这后半段：音乐其实会使他说出一些“漂亮的蠢话”，使他感叹“人们的脑袋”在“肮脏的地狱里”也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而现在的任务是“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所以他“不能常常听音乐”。但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Ilya Ehrenbury）在 60 年代写回忆录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追忆列宁的不长片段中，大段摘引了高尔基的这段回忆。他特别说明，之所以摘引这么长一段引文，是为了说明“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它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版）

他所说的“复杂性”，即列宁一方面担心美好的音乐会妨碍他打破旧世界的决心和勇气，一方面仍常常听音乐，尤其是还喜欢听贝多芬。确实，包括严酷的斯大林“大清洗”时期，苏联一直没有禁止贝多芬，没有禁止古典交响乐。也可能因此，“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才成为中国“文革”时概括“样板戏”意义的经典论断。

当然，“文革”话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争论时，对包括贝多芬在内的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就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分。从 1963 年年底起，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严厉，外国音乐渐被禁止播出、演奏。当时的主导观点是：“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对。”一时间，“取消交响乐”成为代表“革命”的意见，一些地方的管弦乐队被

解散，洋乐队要改为民乐队，一些洋乐乐手开始改行。李德伦回忆说："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是横着拉的，到30岁时，被迫立起来改行拉二胡了！"（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这时，连中央乐团能否存在都成为问题。为了生存，中央乐团在1964年3、4月间搞了一个"活命月"，对外则称交响乐"普及月"，就是到基层演出节目，介绍乐器知识。当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连"大跃进"时"洋为中用"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属"才子佳人"，也都在禁演之列。许多地方群众一再要求演《梁祝》，甚至发生过演出结束后群众不让走，在他们上车后向他们扔石子抗议的事件，使他们处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说明是"上面"不让演的尴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观众道歉。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只要"中国的多，外国的少"就比较合适，"咱们中国多的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这才使中央乐团得以暂时保留。中央乐团当然格外珍视这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创作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奏"。此时已开始"大学毛著"运动，不但创作者要边创作边学，演奏者在排练时也要先学"毛著"，而且学一段，奏一段，奏完总结，然后再学再奏，直到排练成功，这时便要说，这是学"毛著"的成果。（罗筠筠：《李德伦传》，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二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千万不要因为外交关系把靡靡之音在我们电台广播。文化组的同志们应提高警惕，慎重对待。"由于江青坚决反对，

此事只能作罢。不过，周恩来仍以婉转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10月2日，他与朱德、邓颖超、康克清接见抗战时期即与他们认识的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Haddens）时明确表示，为了使我们的样板戏能够拿到外国去，必须允许外国文艺团体如交响乐团及民间歌舞团来华演出。（《交响人生》）

不久，为欢迎西德外长希尔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要李德伦准备演奏贝多芬交响曲，李提出演奏贝多芬的《命运》，得到周恩来认可。但希尔来华时，“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以时间紧张保证不了演出质量为由，指示停止演出。基辛格来华时，李德伦与江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时，《命运》因被于会泳认为是宣扬“宿命论”而被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仑”之名否决。最终，获准通过的是于会泳提出的《田园》，说是歌颂大自然。李德伦暗自忖思，如果按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终于，在基辛格访华时，中央乐团为他演奏了《田园》，虽然是专为他开的内部音乐会，而且由于十年未演奏过外国作品，因此演出质量很低，但这毕竟是十年来第一次演奏外国作品。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这种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来再次专门要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李德伦谈到《英雄》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后，周恩来还要李德伦写了一个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传》）

1973年3月到9月，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这在闭关多年的“文革”中的确是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邀请他们来华演出，但中方规定来华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决定，实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这些乐团对中国情况略有所知，所以节目中都有诸如《黄河》、《红色娘子军》、《工农进行曲》等中国的“革命”曲目。费城交响乐团报来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命运》，中方未表反对，但飞机快着陆时，中方突然要求一定改奏《田园》，只因江青又表示《命运》歌颂

"宿命论"。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Nicholas Platt）知道这是江青的决定，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要让费城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已经七十多岁的奥曼迪（Eugene Ormandy）临时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演出可能将无限期推迟，对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文化交流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负面影响极大。卜励德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个向奥曼迪解释必须演奏《田园》的原因。飞机着陆后，他立即对奥曼迪说，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田园》中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须演奏此曲。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荣筱箐：《"田园"对话"黄河"——费城交响乐团跨越35年的访华之旅》，《南方周末》2008年6月4日）奥曼迪终于同意改奏《田园》，但费城乐团并没有带《田园》的乐谱，李德伦只得把中央乐团的乐谱借给他们使用。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都会在自己的乐谱上作不少记号，奥曼迪用李德伦的乐谱指挥，也是勉为其难。这些乐团的演出虽然作了公开报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演"，因为并不公开售票，而是内部分配给一些单位。在那个年代，得票者必须"政治上可靠"。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时，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的《罗马的松树》中表现罗马军团进军的声响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满地说："这哪儿是松树，松树有这样的吗？""松涛也没有这样响的呀？！"（罗筠筠：《李德伦传》）

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必将对国内文化"生态"产生某种影响。因此，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冲突越来越直接、激烈，这在音乐领域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了。1973年9月12日晚，周恩来、江青等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原拟奏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改为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当时被指是林彪集团成员，因此江青当场大怒，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检讨。第二天，中国舞剧团领导写信

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 日，江青就此写了一封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样的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

10 月，为中央乐团赴日演出事宜，双方又发生直接冲突。中央乐团应日本民间对华友好社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原定于 11 月赴日演出，以展示“文革”成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民间团体，故提出只能接待 80 人左右的乐队和独唱演员，周恩来表示尊重日方要求。但江青等人则提出，如果只去乐队，便只能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一些独唱节目，而无法上演有合唱的交响乐《沙家浜》和《毛主席诗词五首》，因此坚持要带上合唱队，人数起码要去 130 人以上。由于日方表示接待有困难，中央乐团访日只能延期。对此周恩来非常气愤，他在有关材料上这样批示江青、姚文元等：“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以后当引以为戒”，表示我有关方面已向日方道歉，强调乐团访日规模大小、时间长短都应适合日方的要求，两国团体友好往来和外交不同，要照顾一点。“他们认为去的乐队只能是小型的，我们非大型不可，这不是强加于人吗?”“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

还是在 10 月，“对外友协”准备邀请两位土耳其音乐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钢琴家——月底来华访问，作为土耳其国庆五十周年两国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对外友协在其委托李德伦审查演奏曲目的上报材料中说：“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曲目，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具体的情节和标题，仅仅表现作者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音乐一般来讲还比较健康明朗。”这份报告经外交部亚洲司和国务院文化组几位负责人会签后上报中央，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及在京其他政治局委员依次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姚文元同时在材料上还写了一个“注”：“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是表现某种情绪变换、对比而无社会内容？这个理论问题还可以研究

一下。”江青对姚文元此“注”又有一段批示：“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见，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像哭，有的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不能脱离阶级立场空谈‘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后来又加批：“有标题音乐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通，例如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罗马的松树》。李德伦同志应为中央提供正确的材料参考，不要使我们上当。”张春桥马上加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乐团不但应向中央作正确介绍，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向群众作正确介绍。”10月25日，李德伦在巨大压力下给江青写检讨信，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批评。这样，对外友协不能不再向中央打补充请求报告，经外交部正、副部长阅后，再由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会签重报中央。10月29日，周恩来批示，现在两位音乐家已赶不上土耳其国庆期间来华，“十一月是否愿意来，需与土方商谈再定”。

这两位土耳其音乐家绝想不到自己的访华演出竟会如此复杂，甚至引发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当对外友协与他们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访华时，他们仍欣表同意。于是对外友协只能第三次打报告，又经层层批准，报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批示：“有关演出节目的曲目简介，李德伦同志已分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请予审阅。本件拟同意，现送洪文、康生（暂不送）、剑英、德生、春桥、文元同志核阅。退外交部。”（《李德伦传》）但江青见该件后在11月18日批示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时处境非常困难的周恩来还是软中带硬地针对江青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周恩来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困难，是因为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

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 月 21 日—12 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

就在周恩来被政治局开会批评的情况下，12 月 7 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了首都文艺界群众大会，传达江青的批示，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会议主持人说：“这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不要认为是个别人心血来潮，偶然提到、无关紧要，而是要肃清流毒的问题”，“一定要提示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讲这种话的人代表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抽掉阶级的人性论”，并说邀请外国音乐家来华演出是“开门揖盗”。12 月 25 日至 30 日，又在天津召开全国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分音乐界人士参加的大会，这次连开五天的会议有 110 人参加，主题仍是贯彻江青指示和批判“无标题音乐”。主持人说，江青批示“对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对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及时、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无标题音乐”是“替文艺黑线翻案”，“有的人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公开跳出来，非常嚣张”，“某些人崇洋思想抬头，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渗透丧失警惕，相当严重”。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李德伦传》）在这种情况下，1973 年周恩来与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商定的翌年温哥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三

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 1973 年 12 月起，全国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

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1973 年 12 月 23 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殷言石”的《老谱袭用 旧调重弹》的大文章，文中批判道：“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古典音乐，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它只是表现了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化，因此，都可以拿来演奏、欣赏。言下之意，是说世上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音乐，还存在着一种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情绪’。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类音乐竟然不适用了吗?！难道辩证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竟然在这种所谓‘健康’、‘明朗’的‘情绪’的‘对比和变化’面前，化为乌有了吗?”、文章结论是：“他们竭力抽去文艺和音乐的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正是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窗口’，让资产阶级文艺来毒化空气，从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种旧调老谱的重新出笼，正是当前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新表现，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1974 年 1 月 6 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朝华”的《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一文说：“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的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女》中‘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种磅礴的感情，这样豪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

随后，其他一些地方报纸也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经过“地方报纸”的“火力侦察”后，“中央大报”开始“正面攻击”。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化部大批判写作小组“初澜”的《应当重视这场讨论》的文章，对“人性论”作出猛烈批判：“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反动观点以及它所代表的崇洋复古倾向的危害性”，“将会为资产阶级文化重新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之一”。2 月 8 日又发表了“初澜”的《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那些印象派、现代派的音乐作品不是经常写着什么‘松树’、‘喷泉’、‘月光’之类的标题吗？但是只要运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音响，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资产阶级乌七八糟的腐朽生活和颓废情调。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音乐作品，往往在‘革命’标题的掩护下，大肆污蔑、丑化人民革命斗争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音乐作品有没有标题，这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客观的社会作用。”“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煞音乐作品的阶级性，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音乐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不久，《红旗》杂志第 4 期发表了“初澜”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特别举“贝九”为例说：“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篇文章把“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音乐作品混为一谈”上升到“既掩盖了音乐领域阶级斗争，同时也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高度。还说“人性论”会导致崇洋复古，对资产阶级的投降，而这“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经预见到一年多以后批“党内最大投降派”的“评水浒”运

动了。

1月17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向欣”的《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一文，说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正好迎合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颠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发表署名“戈楠”的《历史的真象与现实的斗争：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说“无标题音乐”过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一种形式，所以现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腐蚀和渗透，以实现他们搞‘和平演变’的迷梦”；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同样利用它来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以达到他们对我国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反动目的”。总之，“在无标题音乐的问题上，实际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

“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是1962年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形成的一整套“阶级斗争话语”的必然结果。在这套话语的宰控下，为“贝多芬们”“平反”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帮”已被粉碎三个月，万象更新，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西方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谈话，认为中国应为贝多芬“平反”。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3月26日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演出，以示“平反”。但这位副部长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擅作主张，于是请示部长；部长也不能决定，于是请示中宣部；中宣部也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还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讨论。最后，直到3月23日晚9点，李德伦才得到经政治局讨论获准演出《命运》的通知。不过，3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乐团演出交响音乐会”的广告中标明演出的节目，只有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命运》仍属不能具名的“等”之列，显示了决策层的谨慎。无论如何，在那套严酷非常，极具压迫性、威胁性的“阶级斗争话语”没有来得及清理前，能批准公演贝多芬，在当时

情景下，委实不易，确实表现了最高领导层的开明、决心、勇气和担当，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此点。

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公演《命运》，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年10月20日，中央乐团再度公演了《命运》，英国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出席了这次音乐会。回国后，他在11月11日的《每日快报》发表了题为《贝多芬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声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绍贝多芬在中国“获胜”的伟大意义。

多年后，李德伦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感慨地说：“外人却不知道，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经过多大的努力，多少艰辛！今天，人们打开收音机经常可以听到高雅的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作品磁带、唱片也可以买到。但在十几年前，想搞一场演出却要经过政治局的批准。”（《交响人生》）但愿，后人不会再生此感叹。但是，只有前事不忘，后人才不会再生此感叹。

“抒情”的解放

诗言志，歌咏情。以歌抒情，古今中外皆然。不过，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却要面对歌曲能不能抒情、如何抒情的重大问题。问题之重之大，关系到能否永保江山。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祖国、领袖和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大量涌现。不过，这种感情的表达、抒发必须是以“集体”为主体，风格必须豪迈、昂扬，而以婉转、细腻风格表达“个人”对祖国、党、领袖情感的抒情歌曲，则遭到批判。1955 年对歌曲《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批判，对后来抒情歌曲的发展影响重大。《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是当时还不到 20 岁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团员蔡庆生在朝鲜前线写的一首诗，由赴朝慰问团带回国内，交《人民日报》发表，后由军队作曲家晨耕谱曲，传唱一时。但 1955 年 1 月的《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署名“泽民”的《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意见》一文，开始了为时半年的“讨论”，争论它是否抒发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名为“讨论”，其实是对这首歌以及从个人情感出发的抒情歌曲的批判。平心而论，与以后的“大批判”相比，这次“讨论”可以说非常温和，相当充分地发表了不同意见的观点，并且在有关“综述”中承认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首好歌，或是有严重缺点的好歌。不过，最后还是批判此歌的“领导”意见成为定论。晨耕回忆说：“当我亲身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写了《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这是一首通过抒发主人公个人感

情来表达志愿军爱国主义情绪的抒情歌曲，正因此也就遭到了无法理解的指责，说‘一个守卫在分界线上的哨兵，在时刻监视敌人的情况下不可能歌唱，不可能想祖国，更不可能想到吹来的什么风，这纯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调’。这些不正确的指责是出自领导之口，代表着上级意志，故对当时写抒情歌曲的影响也较大。”（晨耕：《“诗言志，歌抒怀”》，《人民音乐》，1979 年第 8 期）最终，这首歌还是被指责为“向志愿军战士灌输和平麻痹思想”与“思乡的落后思想”，终遭到查禁。不到 20 岁的蔡庆生因此坎坷大半生，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这次“讨论”，其实是音乐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音乐界对名望甚高、被称为“技术派”的贺绿汀的批判的一部分。在这其间，《人民音乐》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贺绿汀的文章。1955 年 3 月号的《人民音乐》发表了署名“华玲”的《反对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音乐领域中的思想斗争》的文章，文中明确说道：“我们知道，‘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讨论，并不仅止于对歌曲本身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开展抒情歌曲的创作”，“关于贺绿汀同志‘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关系着音乐艺术根本问题的统一认识，关系着整个音乐事业的繁荣进步。特别是对于目前存在着的表现于各个音乐工作方面的资产阶级‘技术决定一切’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自由讨论和取消思想斗争的论调都是直接有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艺术蓬勃发展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批判的同时，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的错误态度。”贺绿汀的可以用民歌甚至爱情民歌的调子来歌颂新社会、新英雄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他本人谱曲的《毛泽东之歌》和歌颂志愿军的《慰问信满天飞》也因“感情柔弱”、“缺乏思想性”而被批被禁。（夏白：《论贺绿汀同志对音乐艺术几个基本问题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人民音乐》，1955 年第 4 期）为此，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还专门组织了“抒情歌曲问题讨论”，召开多次会议。此后，以何种“调子”抒发对领袖、党、祖国、生活的歌颂之情开始成为“问题”，柔弱、柔软、微弱等等，都成为“敏感”曲调。作曲家王云阶 1957 年为电影《护士日记》创作的插曲《小燕子》传唱一时，但在 1958 年的打击“黄色音乐”中就被指为

嗲声嗲气的“黄色歌曲”。当时，中国音乐家协会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对包括《小燕子》在内的几首抒情歌曲进行甄别，虽然“结论”认为这首歌的词、曲、伴奏、演唱都不是黄色的，但“仍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延安“鲁艺”出身、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马可也写文章认为它不是黄色歌曲，但仍无法改变权位更高者的成见。“文革”中，王云阶因此受到残酷迫害。他自嘲说：“当时我自己也写过文章批判黄色歌曲，结果批判到自己头上。这也是咎由自取!”（王云阶：《小天使解放了“小燕子”》，《人民音乐》，1980年第2期）

在这种情势下，随后几年间那种真正抒发自我内心世界个性情感的歌曲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气候合适”，总有艺术家要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华，创作出广受听众喜爱、更多表现个人情感的抒情歌曲。在这寥若晨星的歌曲中，主要是创作于60年代初短暂“宽松”时期的《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儿啊，你慢些走》、《送别》等堪称代表。其中，又以《马儿啊，你慢些走》影响最大，一度作为将“抒情”与“革命”结合得最好的典型。因此，它的“命运”最能说明“抒情歌曲”的命运。

1961年，作家李鉴尧在云南西双版纳采风，深为南国边寨美景所陶醉，写下一组《西双版纳诗抄》。其中一首短诗，由解放军战友文工团著名作曲家生茂谱成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这首歌词优美、曲调悠扬的歌曲在1962年经马玉涛首唱后，立即一炮打响，全国传唱。权威的《歌曲》杂志在1964年1月号的“群众爱唱的歌曲”栏中，刊登了此歌。

但顷刻间，风向突变。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传达下来，从1964年年中开始，在歌曲领域展开了对“抒情”歌曲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抒情”，“世界上绝没有一支歌曲，能打动各阶级的人，能唤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感情”。“无产阶级认为有害的，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宝贝’，无产阶级认为优秀的，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计地消灭它。因此，凡是抒资产阶级之情的，凡是资产阶级所欣赏的艺术趣味，我们革命青年就应加以排斥，并与之斗争到底”。“歌曲的题材、表现和处理是可以多样化的，但对于有资产阶级思想感

情的歌曲，我们就不应该去唱它、欣赏它”，“不能借多样化来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些受到群众欢迎的抒情歌曲遭到点名批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类的歌，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爱情至上的恋爱观，充满了灰色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感情”，“只有那些把‘友谊和爱情’捧得至高无上、迷恋于私人生活和贪图安逸的人，才会迷恋‘友谊和爱情的花’，痴情不忍离去，才愿意用‘青春的血液去浇灌’这样的‘友谊和爱情的花’；而不是我们要革命的年青人”。“我们的青春要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绝不能用‘血液’去‘浇灌’什么‘友谊和爱情’的‘花’”。所以“这首歌是一种腐蚀剂”。“《送别》这首歌使人感受不到是送革命战友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的豪壮之情。歌词一再渲染个人的恩情别怨，曲调低沉忧伤无力，哪有一点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概呢?”“在披着革命战士之情的名义下，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感。”“《草原之夜》是一首精神空虚歪曲草原青年建设者的形象的哀叹之音。”“《茶花女》、《货郎与小姐》的一些选曲，都是在宣扬、歌颂资本主义社会淫逸腐化的生活，是革命青年应当抛弃的裹着糖衣的毒药。”受到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及其《续编》自然不能“幸免”，批判者说：“这些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恋爱观。另外还有八首之多的宣传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小夜曲’和宣传唯心主义宗教思想的‘圣母颂’等歌曲。两本歌集为资产阶级音乐的传播鸣锣开道，对青年的思想革命化起了抵制作用。”（《中国青年报展开“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讨论情况综述》，《歌曲》，1964 年第 12 期）

这时，教育界开始批判“母爱”教育，在音乐界也反映出来。歌曲《在老师身边》受到了“宣扬资产阶级母爱观点”的批判：“在这首歌词中，看不到党的作用，看不到对党的感情。它教育学生带着老师的深切期望而不是带着党的深切期望，去实现他们少年时代的理想；教育学生不是思念党而是单纯地想念老师，哺育他们成长的不是党而是老师”；“没有只字提到党的英明、伟大，不谈报答党的恩情。这岂不是资产阶级‘母爱’教育在作怪吗?”这种歌曲“不能教育学生树立雄心壮志，为党、为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勤奋学习，不能培养他们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因此，“这首歌词宣扬资产阶级‘母爱’思想，

是应该进行批判的”。（《〈在老师身边〉宣扬了什么》，《这支歌有资产阶级母爱观点》，《歌曲》1965 年第 2 期）

在这种背景下，歌曲能不能抒情、怎样抒情成为一个重大问题。1965 年 6 月 19 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马可的《怎样对待抒情歌曲?》一文，此文为 1965 年第 4 期《歌曲》全文转载。文章对哪些抒情歌曲可以唱，哪些不可以唱作了界定。《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红梅赞》等无疑都是优秀的革命抒情歌曲，“我们唱这些歌曲，心中涌起对于伟大领袖、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从而鼓起了更大的革命干劲”。“不革命”的抒情歌曲不必说，都不能唱；问题在于“有些名为革命的抒情歌曲，实际上，它所抒发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也不是革命之情，而是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抒情歌曲，就是坏的抒情歌曲”。文章点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送别》的名，作为“有严重错误的抒情歌曲”的典型。但作者又提出：“并不是所有抒革命之情的抒情歌曲，都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当中，也会有一些在内容上或表达方法上值得研究的地方。”《克拉玛依之歌》和《马儿呀，你慢些走》就是这种“内容是歌颂祖国的伟大变化，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健康的，只是歌词或曲调方面有某些缺点”的革命抒情歌曲，“它们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类的作品还是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这类歌曲，“它的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马儿啊，你慢些走》能一时幸免于难，不知与周恩来总理甚爱此歌有无关系，因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此歌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每次见到马玉涛都要她唱这首歌。或许是周赞扬了它的“调子”，所以对“它的缺点”的“改正”就完全集中于歌词。作曲家晨耕后来写道：“当时却有人指责它是‘骑着马儿游山逛景’，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趣’。”他没有说明这个“有人”究竟是谁，但一定来头不小，因为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和歌曲编辑者在其压力下改写了歌词。（晨耕：《“诗言志，歌抒怀”》）1965 年第 4 期《歌曲》刊登了集体改写的“政治正确”的“定本”。将新旧两个版本详加对照，便可体会出当时“政治标准”越来越教条，文艺管制越来越严酷，“文革”确已呼之欲出了。旧

版中的“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改为“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了油”改为“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改成“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改为“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改为“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改为“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改为“没见过田旱水涝保丰收”，“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改为“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改为“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改为“我要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别让马铃敲碎林中的寂静”改为“风吹那稻麦卷起了千重浪”，“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改为“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改为“碧绿的草地上牛羊成群走，新修的水库中鱼儿尽情游”，“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永远随我的马儿走”改为“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

二

不过，改词后尽量“突出政治”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在“文革”中依然未能“幸免于难”，依然被当做“毒草”批判。也难怪，当时连《珊瑚颂》、《红梅赞》、《十送红军》……都被批被禁，此歌被禁实属“自然”。“高、快、硬、响”，一时成为作曲的“标准”。但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左”，对歌曲创作提出了“激情和抒情相结合”的要求，所以在1972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一、第二集中，颇有几首令人耳目一新的抒情歌曲，如《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雄伟的天安门》、《老房东查铺》等。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右”，所以又开始批“回潮”，以后几集《战地新歌》中，“激情和抒情相结合”的歌曲几近绝迹。在对“回潮”的批判中，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老房东查铺》被严厉批判。或许是因为这首风格温馨细腻的歌曲由生

茂谱曲、马玉涛演唱，二人再次“组合”，立即使人想起被禁已久的《马儿啊，你慢些走》，许多听众因此激动万分，引起“怀旧”情绪。此歌挨批判的另一个理由竟是“歌颂剥削阶级‘房产主’”。（时乐濛：《“四人帮”破坏革命群众歌曲的罪行必须清算》，《人民音乐》，1978年第4期）

“文革”中曾有一位文化馆工作人员写过不少歌词，只因其中一句“日出东方一片白”而被揪出批判，罪名是与“东方红”唱反调，结果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并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平反”。辩护者只能以“毛主席的光辉诗词中早有了‘雄鸡一唱天下白’之句，是说光明赶走了黑暗，‘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日子结束了”为其作“政治正确”的辩护。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为求安全保险，甚至有人编了《歌词手册》，将歌词分为“工业学大庆类”、“农业学大寨类”等等，由这些反复斟酌因此政治上非常“保险”的歌词供创作者组合搭配，以求平安无事；“写战斗性歌曲保险，写抒情歌曲危险”更成为歌曲创作者的共识。（程云：《从“通用”歌词说起》，《人民音乐》，1979年第1期）

“文革”结束，一些被禁的“革命抒情歌曲”被解禁，马玉涛重唱被禁已久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出人意料的是，她演唱的竟是“旧版”！这的确使人感到“新时期”的新气息。不过，此时的“政策”虽较“文革”大为宽松，但仍以五六十年代的标准为标准。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在中国音协声乐创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强调，对抒情歌曲“还是戴一顶革命的帽子为好”，因为“现在并不是‘黄祸’已除，许多地方黄色音乐录音盒私相传授，伺机活动，我们如果不戴上革命的帽子，他们就会先你而起，泛滥各地。革命的抒情歌曲还没有源源问世，黄色歌曲就会在一夜之间进入阵地。抒情歌曲戴上革命的帽子，黄色歌曲就不能以假乱真，毒害青年了”。（吕骥：《谈当前声乐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79年第1期）

以“文革”前为标准，许多新创作的“革命抒情歌曲”未能达标。作曲家施光南的名作《祝酒歌》现在已成“胜利的十月”的重要“标志”，但当时也一度被禁。他后来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

门的思想也不够解放，例如《祝酒歌》这样的抒情歌曲开始也遭到责难，被封锁了一年之久才在电台广播。可见当时的音乐生活是多么枯燥，这样，人家的盒式磁带进来了，就容易被有些人接受。”（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 年第 3 期）1979 年电视风光片《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被严厉批判，“这首歌即使和电视片联系起来看，其风格也谈不上‘明朗’。它并不能给人以‘明天会更美好’的美感。”（赵复泉：《也谈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人民音乐》，1980 年第 8 期）《请到天涯海角来》也因旋律“不像中国音乐”而受到批判。最受欢迎、影响最大，且被批最严厉、时间最长的是王酩为电影《小花》谱写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小花》说的是妹妹寻找参加革命的哥哥，最后自己也参加革命的故事，这本是“革命抒情歌曲”，但词、曲都被批判。

1980 年 4 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文化部电影局曾召开电影音乐创作座谈会，对电影音乐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了严肃批评，强调：“我们电影音乐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它。大家严肃地指出，电影音乐与人民有极为广泛的联系，为新长征的人民贡献最好的精神食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人民音乐》，1980 年第 6 期）直到 1983 年，仍有文章批判道：“这首歌词，无论如何也无法叫人相信是写革命兄妹之情的，相反却令人感觉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抒恋人之情的诗。这是它的先天不足，而曲作者又为它添上了情意绵绵的翅膀。曲调自然是婉转动听并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但是其效果是更加增添了恋歌的味道。”（厚今：《浅谈王酩的歌曲创作》，《人民音乐》，1983 年第 5 期）“它的音乐形象是不准确的，思想感情是不健康的。因为这首插曲完全脱离了革命战争的历史现实，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人民军队行军的途中，竟然出现那种音调缠缠绵绵、哀怨悲凄的歌声，可谓之‘风马牛不相及’。”（齐平：《音乐界要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人民音乐》，1983 年第 10 期）《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在 1983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也批评说：“模仿港台歌星的歌唱表现方

法，把那种流行歌曲歌星的气质贯注到歌颂红军的歌曲中来，是绝对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红军的热诚亲切的感情的。”（伍雍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需要》，《人民音乐》，1983 年第 10 期）

无论如何，《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和《请到天涯海角来》不是歌颂“革命”就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它们尚且被严批，此时“刚露尖尖角”的纯爱情歌曲创作处境更加困难。《安徽音乐》1979 年第 3 期登了一首名为《风儿，你轻轻地吹》的爱情歌曲，歌词写道：“风儿，你轻轻地吹，轻轻地吹，风儿，快让鸟儿闭目入睡，闭目入睡。快让那垂柳慢慢地摆动，快让那花儿藏起芬菲，莫去惊动情人的拥抱，莫去打扰情人的约会。”第二段与第一段不同的一句是“莫去惊动情人的接吻”。但此歌立即遭到厉声斥责：“对人的描写只有‘拥抱’、‘接吻’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作者对爱情的概括。”“难道爱情就是为了拥抱、接吻吗？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他们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今天和这个拥抱，明天又和那个接吻。有的人玩弄女性，流氓成性，拥抱、接吻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有什么真正的爱情？我们所说的爱情，应当是男女双方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同心同德搞四化。爱情、家庭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文艺作品是教育人的，它应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也应当歌颂英雄爱模范的先进人物，应当鼓舞更多的人学英雄当模范”。（王玉西：《要写什么样的乐章?》，《人民音乐》，1980 年第 6 期）从“拥抱”、“接吻”四个字就能论证出诲淫诲盗、玩弄女性、流氓成性，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著名论断：“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而已集·小杂感》）此时“爱情”刚刚解禁，还必须与革命、四化、祖国、英雄、模范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深受大众喜爱的《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还曾受到“一直以来都是党给我力量，爱人怎么能给人以力量”的批评。尽管如此，能谈“爱情”毕竟是难得的进步。

然而，不论有关部门如何严厉批判、如何谆谆教导，大众还是喜欢这些抒情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不久的“新技术”——盒式录音机使禁止

这些歌曲的传播成为不可能；而且，一些媒体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使这些歌曲获得“合法性”。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道》等。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然引发了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是不符合时代的“靡靡之音”。由于有领导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平衡”办法，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但一位工作人员大声说：“你们这是强奸民意！”此议遂罢。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20位，音协领导于是提出将评选15首改为评选20首，或者将这两首歌替换《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但《歌曲》的主编时乐濛等人坚持应按原方案公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原样发布，特别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最后，“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此事事后挨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在大会上被某领导点名批评。（《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黄色歌女”》，《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日）

为了平衡影响，1980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希望“以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鼓舞广大群众”。这次评奖以各省市的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文艺团体推荐，专家评委会“以择优评选”为原则，选出31首。排在最前面的是合唱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创业者之歌》、《走上练兵场》、《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等。排在后面的独唱歌曲则包括《我爱你，中国》、《祝酒歌》、《再见吧，妈妈》、《太阳岛上》等较“软”的抒情歌曲。主办者在强调“这些歌曲应该和我们社会主义制

度的道德品质、情操相称”，提出“‘音乐是抽象的，体现不出感情的高尚与低劣’虽屡遭批判，但它的阴魂至今仍没消散”的同时，承认“一些推荐歌曲往下‘推’而下不去”，“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力推广，还是没能被广泛的群众所传唱”。（苏夏：《从获奖歌曲想到的》，《人民音乐》，1981年第2期）的确，现在一提起“新时期”，作为标志的不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这类歌曲吗？还有几人会唱，甚至想得起《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呢？一年之内的两个“评选”，一个成为时代标志，一个成为历史笑话，人们不应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吗？

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的“反精神污染”中，虽然音乐界批判、“清除”的重点是“港台时代曲”、“流行音乐”，但抒情歌曲也被“陪绑”。有人总结出音乐界“精神污染”的九个方面，其中“爱情至上论”和“历史的伤痕”就与抒情歌曲有关。“如《妈妈，看看我吧》、《妹妹找哥泪花流》、《我怎能把你遗忘》……其中有十年内乱时的伤痕，也有战争年代生离死别的哭诉。”音乐界现状是：“革命传统踪影难寻，社会主义很少声音；哪管四化如烈火，情意缠绵苦呻吟。”（夏白：《八百多万盒录音带的美学价值在哪里》，《人民音乐》，1983年第12期）作曲家王立平在1983年第10期《音乐生活》上发表《创造、发展及其他》一文，批评了《请到天涯海角来》。他说：“天涯海角是中国地方，但旋律不是中国味道，曲调不那么健康，我认为是一首格调不高的仿制品。”其实，由他作曲的《太阳岛上》也曾被批为“模仿港台”，“被认可”也还没几年呢。1983年第12期《人民音乐》发表了署名“艾乐”的《效法什么?》一文，批判《请到天涯海角来》是“港台舞厅、酒吧间里的‘流行歌曲’”，“其格调轻浮、油滑”，“低级庸俗”、“粗俗”，最后义正词严地说：“那种以宣扬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生活方式为内容的音乐，也必然有它相应的形式去表现；而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则需要以我们独特的形式去反映之。效法低级庸俗的东西，是不可能创造出美的艺术品的。”王酩再次成为“靶子”，不仅《妹妹找哥泪花流》又遭到“应是抒发同胞兄妹之情的”，“可是歌词本身有些含糊不清，实有‘寻找情人’内容之嫌”的指责，而且被“算总账”：他为影片《扬帆》所

作的《莫叹惜》被批为“使人陷入迷惘的情绪之中”，为电视剧《人生的答案》所作的《人生之歌》被批为“与年轻人朝气蓬勃、热爱生活的形象，显得多么格格不入啊！”他为故事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的插曲《角落之歌》则受到如此指责：“从这首歌的音乐形象来说，没能倾注作曲家应有的正确世界观和艺术观。具体地说，这个悲剧虽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剧本和音乐创作却在三中全会之后。艺术家完全应该以三中全会‘向前看’的精神来指导创作。对于这部悲剧音乐，既要立足于悲痛的基调，但又应给人以力量，不能使人听后对生活和前途丧失信心。而《角落之歌》却采用了类似哀鸣般的哭腔。”（梅般：《试论王酩歌曲创作中的音乐形象》，《人民音乐》，1984 年第 1 期）没有正确的世界观、艺术观，与“三中全会精神”不一致，对生活和前途丧失信心……罪莫大焉！充分显示了“运动”的特点。

影响到包括人们日常娱乐、文化生活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久被胡耀邦总书记制止，到 80 年代中期，这种“抒情歌曲”才完全获得“合法性”。大众的强烈需求、一些媒体和领导的勇气、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普及、最高领导人的开明，这些综合因素使抒情歌曲最终“解放”。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因素：如洪水般涌来的“港台时代曲”和“流行音乐”。有关方面认为这种音乐危害更大，以更大的精力批判、拦截，甚至“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不得不认可了这种软性的“革命抒情歌曲”。软性“革命抒情歌曲”从 1955 年对《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的“讨论”到“文革”的绝迹，再到 80 年代中期《妹妹找哥泪花流》等的完全“正当化”，三十年 V 字形的风雨历程尚如此曲折，“非革命”的种种歌曲的遭遇就更不必说了。文化史早已证明，艺术是高度个性化的精神产品，在严格管制条件下必然萎谢，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才能蓬勃繁茂。艺术的凋敝非常容易，而繁荣却相当艰难。

“流行”的流行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三十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

一

1949 年后，“流行音乐”渐被禁止，在 1956 年的“早春天气”中略有“回潮”，但随后在 1958 年的“批判黄色音乐”运动中即被完全禁止，彻底扫荡。在“文革”中，唱、听流行歌曲更是罪可入狱，流行音乐完全绝迹。

然而 1979 年随着国门初启，中国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了暌违已久的流行音乐。“流行”的再次流行，当然得益于“初春”的政治气候，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盒式录音机这种“新技术”的引进。大量“水货”录音机和港台流行音乐磁带如潮水般涌入，进入千家万户，翻录成为家常便饭，实难禁止。

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自由化”在音乐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一定要禁而后快。

他们认为，港台流行歌曲其实就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曲”的翻版：“什么《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毛毛雨》、《凤求凰》、《吻着陶醉吧》等，它们在中华民族濒于沉沦的关头所宣扬的，除了醉生梦死、消极颓废、爱情至上，还有什么呢？据了解，《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

又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更有甚者，一位歌唱演员竟然演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并灌制了公开销售的录音带。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犹如一条大河奔流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旋涡逆回一样，这并没有什么可怕，但是，我们要有所警惕。对于贩卖这类货色的人，有必要提醒他：你究竟要在人民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魏州：《服务员和向导员》，《人民音乐》，1980 年第 3 期）

“出现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所谓的‘时代曲’在当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艺术商品化的显著标志和内外反动派在文化上的一种得力工具，泛滥四方，在历史上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最后，由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建立，它也就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派退出了中国大陆。‘阔别’三十年之后，如今又乘隙溜了进来，你说，能不使人‘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吗?”“说起来，它们的‘前辈’还确实不少，从早时的《桃花江》、《特别快车》等等，到稍后的《花好月圆》、《何日君再来》等等，再到退出大陆前的《疯狂世界》、《我等着你回来》、《假正经》等等，有如汗牛充栋，从唱片、电影到无线电广播，成为那时必有的市声，人们耳闻目濡，接触得真是不可用数……”“说穿了，它们就是人们称为‘殖民地音乐’的后裔。而它们的曾祖，也就是以欧美为中心，出现于夜总会、酒吧间一类场合的爵士乐、扭摆乐，以及以后的呼拉圈乐、迷你裙乐等等时髦乐的东方化变种，演变至今，约莫已有五六十年历史，流行地域包括远东及南洋一带，影响所及还是颇为广泛深远的。”（长河：《应当正视〈时代曲〉的问题》，《人民音乐》，1980 年第 3 期）

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在许多篇文章中严厉批判说：“无论是三十年代‘流行歌曲’或者是现在的港台‘流行歌曲’，它对男女爱情庸俗、浅薄的描绘，它所表现的相思的苦恼，被遗弃的女性的哀怨，色情的挑逗，及时行乐的喧嚣等等，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对个人欲望的追求。它在音乐表现上的有时悄声媚语，有时扭捏作态，有时哀戚呼号，有时歇斯底里的爆发等等，都是为了表现这样的思想内容。这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为满足低级趣味的娱乐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音乐竟然得

到我们许多青年人爱好的原因。”“历史已经证明，三十年代‘流行歌曲’是消极的东西，它是旧中国腐朽的一面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是腐蚀人民群众心灵的东西。”“和三十年代‘流行歌曲’一脉相承的港台‘流行歌曲’，虽然在历史条件已不完全相同的今天，但从它的社会作用来看，也不可能变成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东西。”（伍雍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人民音乐》，1981年第3期；《一种精神腐蚀剂》，《人民音乐》，1982年第6期）

三四十年代甚为“流行”、此时因邓丽君演唱而重新流行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大批判的首选靶标：“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每个‘今宵’向不同的男人低唱‘何日君再来’，哪里有什么爱情呢?”“它是三十年代产生的黄色歌曲。”（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而批判者更加强调的是，它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种“软绵绵的在技巧上经过精心处理的‘探戈’节奏的曲调”也是“这首歌后来在沦陷区被敌伪赏识、利用、推广，当做毒化人民意识的一剂鸦片的原因”。（应国靖：《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在烽火连天的全民抗战中，确实是‘一边是严肃地工作，一边是荒淫无耻’，《何日君再来》是与前者格格不入，却迎合后者的需要，它是腐蚀人们斗志的，这正是它能在沦陷区畅行无阻的根本原因。”（张魁堂：《一段历史》，《人民音乐》，1980年第11期）

当时，各单位、学校还传达明确“禁听”邓丽君的有关文件，要求有邓丽君磁带者将磁带上交或自己消磁，有的大学还抽查学生磁带。但在公开出版物上，开始还是不点名批判，将其称为“D味”，从一篇为电影《小花》和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辩护的文章中即可看出：“电影《小花》的插曲，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电台播送的每周一歌《丁香花说我爱你》等反映很不一样。有人说是‘新颖的，社会主义的抒情歌曲’，或‘健康的抒情歌曲’；有的则认为是‘D味的仿制品’!”“怎么办？有位性情耿直、责任感很强的领导同志早已发表了口头意见（因未见成文，故无法引证准确的原话）：‘近年来由于

我们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外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有益的经验进来了；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也传入了我们的园地。’‘D味的歌曲就是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是我们三十年代就批评过的东西。’另一位同志说：‘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音乐生活的纯洁性。’以上两段话我认为都是对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生活’？如何‘保卫’其‘纯洁性’？在探讨当前音乐生活中出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如何使我们群众音乐生活的合理要求得到应有的满足？社会主义的抒情歌曲（从作品到演唱艺术）如何与黄色歌曲划清界限？这才是全部课题。”“对已经写出、唱出而又在群众中流传的新的抒情歌曲务请慎重鉴别，不要轻易戴上什么‘D味’的黄帽子。”（程云：《时代·社会·生活·音乐》，《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当时港台流行音乐最开始不能在舞台上公开演出，但流行音乐的演唱风格的影响已难以避免。50年代流行一时但随后被禁、此时刚被解禁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是舞台上“流行唱法”的首选，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自然也成为批判的焦点。“当一位男演员蓄着卷卷长发，如荡似游地演唱《拉兹之歌》《卖布歌》一类的曲目，伴奏者高扬乐器，转向四方，摇摇晃晃‘积极配合’。此时，一部分观众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吹口哨、叫好，甚至向舞台上扔东西。面对着这种‘欢迎盛况’，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和演员，是否头脑清醒呢？这样的节目投合了怎样的艺术趣味？给了哪些听众以怎样的感染？引起了怎样的共鸣？他们得到了哪方面的满足和教益？这样的‘效果’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是否相容？”（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例如有歌唱家用油腔滑调的表演歌唱印度歌曲《拉兹之歌》，结果给予听众的不是原歌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而是变成对‘流浪生活’的赞赏和宣扬了。”（孙慎：《不能忽视音乐的社会作用》，《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但也有的演员迎合某些人不健康的趣味，靠在舞台上要噱头来赢得掌声，甚至某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唱《拉兹之歌》时，衣服往肩上一搭，背着脸出台，边走边唱……这也就太过分了。”（楼乾贵：《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如果

为了追求某种效果，把本来是悲剧性的主题歌曲（比如《拉兹之歌》）也处理成诙谐歌曲，那就错了。”（魏州：《服务员和向导员》）“有一位男歌唱家，当他唱《拉兹之歌》中‘到处流浪’一句时，表情洋洋自得，抬腿举手向四周观众转了一圈（体育馆看台四周立即有人报以掌声）……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得以贯彻，但是，难道什么是‘治世之音’、什么是‘乱世之音’、什么是‘亡国之音’都没有区别了吗?”（刘兰：《歌唱家的职责》，《人民音乐》，1982 年第 2 期）

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与演员只能站在话筒前的传统唱法大不一样，也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被大加批判：“李谷一同志确实在进行一种尝试，在摸索另外一条路子。其实从《乡恋》的演唱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什么新路子，倒很像目前海外歌星们演唱流行歌曲的路子。我们为李谷一同志现在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子而感到惋惜。”因为“这条流行歌曲的路子是在香港、台湾那种具体环境下产生的，它不讲什么高深的发声技巧，只靠手里捧着的那个麦克风，所以这条路子是狭窄的。这种唱法既不适于表现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不适于作为抒发我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内心感情的手段”。（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人民音乐》，1980 年第 3 期）“依靠声频放大器来创造某种浅薄的效果来博取听众欢迎的歌唱者是有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夜总会、酒吧间的歌星的演唱。但这自从三十年代就已有之，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加赞扬的新鲜事物。”“‘哈气和轻声’成为一种歌唱表演的特征，也正是在依靠声频放大器的夜总会、酒吧间唱法产生以后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气声和轻声，而是看你运用气声和轻声唱法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感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夜总会、酒吧间歌星，凭借声频放大器而突出气声和轻声的效果，形成了这种歌唱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唱法，正是表现和这种低级庸俗的娱乐生活相适应的颓废消极的思想感情所需要的。”（程子建：《金毛狐狸和正人君子》，《人民音乐》，1981 年第 5 期）

演员在台上“信步漫游，忽而前进，忽而后退，手拿麦克风，忽而声大、忽而声小”也被批为是“污染乐坛，有碍人们身心健康的所作所

为”。（邵吉民：《评“祝你快乐”音乐会》，《人民音乐》，1983年第3期）还有文章将“一手拿麦克风，一手牵话筒线”斥之为“出口转内销”，厉声问道：“这种精神上的‘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作为‘出口’品，就已经有伤国格，再‘转内销’，对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徐歌：《“出口转内销乎”》，《人民音乐》，1983年第6期）

此外，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

“流行音乐”的影响从“演出”又迅速传染到“创作”，引起的争议、批判更加激烈。最先被严批的是《乡恋》。1979年，作曲家张丕基为《乡恋》谱曲，他的定位是要“洋”一点，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禁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陈志。《乡恋》播出，受到热烈欢迎，但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批判。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同年4月，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集体围攻《乡恋》，一位负责人又措辞严厉地点名批判《乡恋》。“张丕基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人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对《乡恋》的严厉批判持续到1983年初。这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现场设置了四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编导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这让黄非常为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当时，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

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黄看出“他在思想斗争”。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至此，李谷一才得以正名。（李扬：《〈乡恋〉解禁记》，《中国新闻周刊》，2008 年第 13 期）

继李谷一之后，受到严厉批判的则是苏小明。苏本是海政文工团的合唱演员，1980 年春节前后，她用自己学唱的港台校园歌曲参加了海军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演出，结果大受欢迎，引起了团领导的注意。1980 年 9 月底，“金秋新星音乐会”在京举行，海政文工团决定由苏小明代表本团参加演出。但海政领导又认为海军的“新星”在大型的演出中唱外国或港台歌曲不合适，于是要求词作家马金星和曲作家刘诗召根据苏小明的条件，写一首具有海军特色的新歌。就这样，马金星与刘诗召合作，突击创作了新歌《军港之夜》。为她伴奏的是海政的轻音乐团，并把架子鼓拿到舞台上。据说把架子鼓拿到舞台上，海军是第一家。这次演唱会真正有流行韵味的只有苏小明，歌曲也只有《军港之夜》。演出效果却意外的好。演出结束后，苏小明一曲成名，声名远播，一时间几乎成了青年人的偶像，《军港之夜》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但是，苏小明反因此受到批判。然而，群众的热情并没有使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停止，相反，在部分人中更加激烈。“海军有的首长强调，开放不是什么都‘放’，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言下之意，流行歌曲是右的。有的人则公开表示，苏小明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一位主持《解放军歌曲》编辑工作的军队音乐权威也称，军队的歌曲应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内容应是革命、健康和向上的。《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海军机关有人反应更激烈：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争论由机关波及部队。海军某基地俱乐部一名战士因无意中在有线广播中播放了苏小明唱的《军港之夜》而受到处分，被关了禁闭。”“1980 年底，这场争论达到高潮。有关领导部门几次不点名地批评海军。此后不久，上级部门在下发的文件中严肃指出：军队文艺团体演出，应该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助于提高我军声誉……参加地方组织的演出，

内容必须是革命的、健康的；作风要热情、庄重；服装要朴素、大方。参加地方活动必须经过本单位文化部门审定，等等。对苏小明，上级部门提出，请海政文工团领导找专人‘好好帮助她，在演唱上处理处理’。并明确要求，参加元旦、春节演出时，苏小明要改唱《十送红军》。”（吴殿卿：《叶飞上将与流行歌曲冲击波》，《百年潮》，2006 年第 6 期）

有篇文章写道：“这首歌的曲调，听了使人感到亲切，尤其是那些广东沿海的咸水歌的乐汇，使人联想到南海的一些生活情景，曲调有‘海味’，也比较美。但作为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歌曲的乐队伴奏起了很不好的作用，那些铜管组的打击乐组的切分节奏和喧闹声，使人如置身于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舞厅中，其气氛粗俗不堪。”文章结论是：“我们应有自己的轻歌曲，这些歌曲应该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品质、情操相称。”（苏夏：《从获奖歌曲想到的》，《人民音乐》，1981 年第 2 期）

所谓“咸水歌”是以前广东传统“水上”居民的民歌，开头结尾都是情郎妹子，在“旧社会”被传统文人学士视为淫词邪曲，在“新社会”又长期被视为“黄色歌曲”。而“使人联想到南海的一些生活情景”这句则更是暗指妓女，因近代“水上”妓女，尤其专接洋客的妓女被称为“咸水妹”。这种批判不仅影响到海政文工团的演出，甚至影响到干部的使用和对问题的处理。

此事惊动了担任海军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叶飞最终表态，肯定了苏小明的唱法和《军港之夜》。由于司令员明确支持，“总政、海政两级文化部门经过反复讨论、专家评审，同意苏小明继续演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活跃在演出舞台上，《军港之夜》成了她的保留节目，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的经典。”（《叶飞上将与流行歌曲冲击波》）

1981 年初，就在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海政又因程琳唱《小螺号》而惹出更大的风波。程琳本是海政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出事”时只有 13 岁。她喜欢唱歌，尤其喜欢模仿邓丽君，被人戏称为“邓丽君第二”。海政的曲作家付林在 1980 年为她写出了儿童歌曲《小螺号》，歌曲没有多深的内容，就是孩子盼望水手爸爸回来。程琳也是一曲成名，受到大众狂热追捧。1981 年的春节，北京电视台推出了程琳的一组演唱录像，在新春假期反复播放，节目收视率很高，

但因此引起了“关注”。1981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陈莲”、题为《珍惜孩子的天赋》的批评文章，指责那位“只有十三岁”、学二胡、已是部队文工团团员的小歌手：“那浓妆艳抹的装束早已失去了孩子的纯真和质朴，所唱的歌，不论是新创作的还是风味很浓的传统民歌，甚至是儿童歌曲，一律使用轻声、送气、低音区，近话筒并带着哭腔，挑逗性的声调去唱。吐字和行腔那种矫揉造作，在目前国内舞台上也是很少见到的。”《人民日报》的批评非同寻常，结果，按上面要求，程琳被封杀。销声匿迹两年后，15岁的程琳随着李谷一《乡恋》的解禁也在1983年复出。

当时的宣传部门的主事者之所以坚决禁止、严厉批判流行音乐，除了“历史原因”，更由于他们坚持的“时代论”、“社会论”：“第一，今天我们的时代虽然在前进，在发展，但是，时代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仍是这个时代的中心。第二，党的工作的着重点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时代的主要内容的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第三，时代的发展方向也没有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正指引着我们的国家向新的目标进军。它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梦想的那样，放弃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倒退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因此，要坚决反对“有害的”，而“无害的”音乐如果“占统治地位”，“也就转化成它的反面，变成有害的了”。所以“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不变质，就不能对当前出现的靠拢海外流行音乐的乐风听之任之”。（晓星：《我们应当提倡什么乐风》，《人民音乐》，1981年第4期）“‘无害’的太多也是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因为这是牵涉到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学而思：《“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争》，《人民音乐》，1981年第8期）“它在我国青年中的传播，只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创作和演唱上模仿港台‘流行歌曲’，实际上就是在音乐生活中增加不利于青年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高尚的审美趣味的消极因素。”（伍雍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美》，《人民音

乐》，1981 年第 3 期）“凡此种种，我认为是音乐生活中的一种污染，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它和我们的文艺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陶冶高尚的情操方面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百花齐放’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文化政策，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好办法。但是，常常会被人误解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目的是在各种风格的艺术作品的自由竞赛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优势，而决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使无产阶级的文艺向资产阶级的文艺靠拢。因此，在创作、演唱、表演上模仿庸俗、低级的‘流行音乐’的现象，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瞿维：《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人民音乐》，1981 年第 8 期）

1982 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首都音乐界召开了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音协主席到会并讲话，座谈会将《何日君再来》等港台流行曲视为“文化走私”，将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等都斥之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相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竺之兰：《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都音乐界讨论贯彻十五号文件座谈会》，《人民音乐》，1982 年第 5 期）

所以，“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和演员同志，岂不该对一歌一曲、一腔一势，都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审慎掂量，决定弃取吗?”（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

二

其实，1983 年“春晚”《乡恋》的解禁并未使流行音乐完全“正名”，对它的严厉批判一直不断。1983 年 8 月 11 日至 22 日，召开了为时十天、有六百人（!）参加的“全国轻音乐座谈会”，文化部、音乐协会的领导悉数出席，并发表讲话。“座谈会”仍然批判流行音乐是“极力模仿资本主义酒吧歌星的唱法和情调”，“在台上乱扭臀部，丑态百出”，“污染了社会风气”，等等。（于庆新：《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轻音乐》,《人民音乐》,1983 年第 9 期)

程琳 1983 年复出演唱后趁热打铁,出版了《小螺号》和《童年的小摇车》两盒专辑磁带,销量甚高。但批判也因此接踵而来,称“俗不可耐的《小螺号》又吹响了”,与上次不点名不同,这次许多文章点名批评程琳。“在别人的‘辅导’下,她完完全全模仿港台某歌星的腔调”,“构成了她演唱格调的十足酒吧、夜总会味道”。尤其是她演唱的江西民歌《盼红军》,“使人听起来是那样矫揉造作,轻俗浅薄,不但歌曲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境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还略带一种挑逗性和撩人心烦意乱的情调”。(丹新:《令人担忧的少年歌者》,《人民音乐》,1983 年第 9 期)

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在“全国轻音乐座谈会”上作的总结发言也批评说:“模仿港台歌星的歌唱表现方法,把那种流行歌曲歌星的气质贯注到歌颂红军的歌曲中来,是绝对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红军的热诚亲切的感情的。”(伍雍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需要》,《人民音乐》,1983 年第 10 期)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严厉批评说:“我们的某些演员一味抱着那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情趣低级的流行歌曲,整天学习,潜心模仿。更有甚者,有的表演团体负责人对此种情况肆意鼓励,加以一些所谓行家的盲目吹捧,使得个别尚未成年的孩子迷醉于自己模仿的成功,把音乐当作商品,奔忙于演出,有的唱片出版部门竟连接不断地为他们出版盒式胶带,一时风行于各地,污染城乡人民。”(吕骥:《从“一切向钱看”谈起》,《人民音乐》,1983 年第 8 期)“污染城乡人民”,罪状何其严重。果然,这一次“处理”更加严重,付林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程琳因年龄太小未受处分,但已无法在部队文工团立足,转入东方歌舞团。

1983 年秋天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流行音乐”再次被作为“自由化”、“污染”而被禁。有关方面明确提出:“音乐领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精神污染”,港台“时代曲”是主要表现之一。(仲稼:《清除精神污染,繁荣音乐创作》,《人民音乐》,1983 年第 12 期)中国音协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发出了《致音协全体会员、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公开信》,最后号召道:“我们必须在音乐领域内防止和清除一

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的侵蚀，在当前，尤其要注意克服资本主义世界商品化‘流行音乐’对我国音乐生活的影响。”（《致音协全体会员、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公开信》，《人民音乐》，1984 年第 3 期）

架子鼓、沙槌、手拿麦克风、迪斯科、“拉兹”等又成为某种“符号”。《请到天涯海角来》被批为“油滑”、“轻佻”、“挑逗”、“粗俗”、“轻浮”，配乐的铜管乐、架子鼓、沙槌的喧闹都被指为是“对港台不健康的‘流行歌曲’以及其他外来不健康的音乐”的模仿、照搬。（文乐：《效法什么?》，《人民音乐》，1983 年第 12 期）有人“看了一次安徽某市文工团的晚会。其中不少节目的内容与表演，都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党中央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传遍全国之后一个专业团体的演出”。“舞台上五光十色，一位肩披长发、上身着紧身衣、下身着牛仔裤的青年女演员，手拿麦克风、满台走动，边扭边唱，并在乐队队员面前做着挑逗性的动作。”“一位男演员走到舞台边角，身靠着扩音箱，跷着腿，用那有气无力的声音演唱着《拉兹之歌》。”（肖江：《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人民音乐》，1984 年第 1 期）或许有人会问，为何此文还要点出“肩披长发”、“紧身衣”和“牛仔裤”? 因为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不是运动的运动”中，“肩披长发”、“紧身衣”和“牛仔裤”都是作为“自由化”、“精神污染”而被禁止的。“更有甚者，在唱一首告别的歌曲时，竟手拿话筒走到观众席去和看台上的观众握手告别。”（李国勋：《谈音乐会的表演》，《人民音乐》，1984 年第 4 期）一位作者写道：“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报刊上看到的那些被批评过的舞台上的‘不正之风’，竟活现在我的眼前。主角一上场，即奔向话筒，把话筒一提，便摇摇晃晃地唱了起来。”（王义侠：《由看一次演出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 年第 2 期）甚至有人专文论述手拿话筒的问题：“拿着话筒唱歌，这是外国人的发明。近几年来，它被我国一些歌唱演员视为时髦货，在演唱中广为采用了。”（赏音：《对手执话筒唱歌的看法》，《人民音乐》，1984 年第 8 期）

“污染”种种，数不胜数。吕骥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1983 年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明确表示迪斯科就是“污染”：“跳秧歌有更多广大的群众基础，而跳迪斯科却缺乏广大社会基础，而且其中还有不健康因

素，难道对外开放迪斯科也必须引进么?”所以，他认为引进迪斯科、流行歌曲、通俗音乐等都“难免会造成对我们的精神污染”。（吕骥：《戏曲音乐应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人民音乐》，1984年第1期）中国音协三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对“污染”的规定甚至细化到“女演员穿着裙子在观众席上空荡秋千和穿短裙的天幕上做‘剪影’”的程度。（黄俊兰：《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人民音乐》，1984年第3期）

台湾儿童歌曲《童年》是最早引进的港台歌曲之一，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音乐演出中公开演唱较多的歌曲。但随着“清污”的深入，《童年》也被批判。1984年5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发表了署名“任真”的《〈童年〉不是一首好歌》，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让我们的青少年口口声声地唱着情调不高的什么‘迷迷糊糊的童年’，什么‘孤单的童年’之类，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还有作者问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思想、情感、美学趣味来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呢”还是“用台湾校园歌曲《童年》那样的情调和所谓的‘多样化’来‘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代?”“作为一首台湾歌曲，它所反映的是在台湾的社会制度下生活的某些学生的生活、思想、情趣，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台湾音乐生活的一种现象来加以了解、考察、研究、介绍。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我们党和国家希望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指导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广大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也毫无共同之处”。“《童年》所宣扬的思想、情感、美学趣味，是属于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属于自我表现的艺术范畴，它同我们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对下一代进行德智体美全面教育的方针，可说是南辕北辙，毫无相通之点。”（勤思：《读〈“左”相可掬〉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年第7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唱的绝不是蓬勃向上的金色的童年，或许是台湾校园的实况，但充其量是一首写实主义的消极之作，是心灵空虚者的心声，在学生特别是少年儿童中绝不会起什么积极作用。”（韩映红：《从〈童年〉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年第7期）“对这首歌，

宣传者的意图可能是想用反面形象，以讥讽的方法，告诫教育人们要珍视童年时光，发奋学习，但歌中‘迷糊’的观点、悲戚的情绪、伤感、孤单、迷糊的曲调，非但达不到这样的目的，而且还有可能使得年龄尚幼、阅历尚浅、辨识能力尚差的少年儿童有单纯模仿的危险，以至消磨他们的意志。”“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所以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在宣传时要考虑一下歌曲的思想性、艺术性及社会效果，且不可盲目‘引进’。否则，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望宣传者三思。”（李国勋：《歌曲宣传要注重社会效果》，《人民音乐》，1984 年第 8 期）在他们看来，不同的“时代”、“社会”间，实在没有“通约”之处，连儿童音乐都不例外。

“清污”的种种做法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注意。1983 年 12 月 13 日，他接见了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的与会者，谈了与“清污”有关的八个方面的问题，中心思想是反对“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中某些过头的做法和扩大化的偏向。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歌曲：“允许唱什么歌曲，允许听什么歌曲，现在搞得很严！我前天看了你们青年报星期天版登的《前进吧，青年》这首歌，萧华作的词。我看词做得不错，曲子是不是稍差一点？第一要适当提倡唱一点革命歌曲，包括好的进行曲和抒情曲；第二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第三，要禁止唱的歌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应该有一个单位来审查批准。让各个单位自己决定，那还行？第四要鼓励作曲家、歌唱家创作一些好的歌曲。时代在不断前进，歌曲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比如，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当时你不要他唱他也唱，那是时代的需要。现在唱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纺线线》，那就没有多少人唱了。青年都是爱唱歌的，应该让青年放声地唱。歌曲这个问题是一大政策。”（魏久明：《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炎黄春秋》，2008 年第 6 期）

“运动”发动起来往往会有强大的惯性，虽然胡耀邦对许多做法不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要使其停止，还需一个过程。直到 1984 年

秋，对流行音乐的批判才渐告停止。1985 年 5 月，中国音协换届，从 1949 年 7 月起就一直担任音协主席的吕骥成为“名誉主席”；1986 年，音协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改版，组织新的编委会，任命李西安为新的主编，对流行音乐的“围剿”完全停止。

1986 年 5 月 9 日，为“世界和平年”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中央电视台全程转播，一众流行歌手集体亮相；尤其特别的是崔健的演出，标志着一直处于“地下”的中国摇滚乐“浮出水面”。原来，“流行”不仅有“嗲声嗲气”，还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声嘶力竭”。

但是——1989 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对“流行音乐”的大批判又铺天盖地而来，并且对摇滚乐的批判最为激烈：“这样一种‘折烂污’的音乐，美国人却要向全世界推销。当年杜勒斯就曾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以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有人作过这样的分析：‘校园的流行歌曲，从《心头一把火》（参考意识）、《一无所有》（悲观失望）到《跟着感觉走》（非理性主义），生动地表现出青年学生由于失落感所引起的从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化’。”（苑柳：《导致动乱的思想根源——八个月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升级与泛滥》，1989 年 7 月 7 日《北京青年报》）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此时接替不久前被免职的李西安而出任《人民音乐》主编的著名音乐家赵沨在《我的一些意见》中也对崔健的摇滚乐作了猛烈批判：《一无所有》“意思是说中国人虽然精神上富有，而实际上是一无所有，这宣扬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情绪呢？这里还有一点起码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吗”？从《一块红布》中“难道还嗅不出一点政治气味吗？我认为是一首标准的中国‘嬉皮士’式的政治歌曲，这是宣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幻灭’型的‘垮掉的一代’的政治歌曲，这是叫啥子么”？他不厌其详地抄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歌词，然后批评说：“这大概和西方的‘披头士’的‘抗议歌曲或者政治歌曲’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强调：“这些问题应该提高到反渗透、反演变、反颠覆的高度来认识”。“这点东西是不是很有一点杜勒斯之流口中

的‘武器’的味道呢?”(赵沨:《我的一些意见》,《人民音乐》,1990年第6期)

中国的事情总是充满“意外”。1992年那个“春天的故事”,使包括“摇滚”在内的流行音乐“绝处逢生”,且渐渐重登“大雅之堂”。五光十色的激光、电吉他、架子鼓、华美的服装、演员“飞天”、“手拿话筒”、“边唱边舞”全都早成“平常”。现在,代表国家的各种晚会不也充满这些“元素”吗?纵观流行音乐这十几年的“禁”与“放”,依靠的都是领导人的讲话、批示、文件、政策或重要媒体的文章,未经“法律程序”,更无“制度保障”,所以才会有这种“过山车”般的“惊险”。这段“流行的历史”再次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对“新知”有着如饥似渴的追求，罗素、杜威等都曾应邀来华演讲，成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盛事。对爱因斯坦，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无比钦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访华，但终因中国国内局面混乱而未能实现，他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对此，有关研究、介绍已经很多，胡大年的《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则是其中集大成者。此书以翔实的史实对这段离奇荒诞的历史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叙述和深入分析，引人深思。

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其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但从50年代初起，出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开始受到“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指责、批判，他的形象陡然由“正”变“负”，他的学说在主流媒体上受到“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战时为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紧制造原子弹的要求也被批判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不过，他的科学思想此时并未受到严批，“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是这一阶段对他的“标准判断”。

然而，“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达到顶点，批判的重点是他

的科学思想，即相对论。1968 年 3 月，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对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批判相对论为其主要内容，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而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显然，孔与毛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见上书，第 181 页）他们首先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以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批判相对论，因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真正要从科学上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易事，所以这一篇篇“批判”、“打倒”的文章，只能是不断重复政治性指责，相对论被说成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而作为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的光速不变原理被批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明确说道：“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见上书，第 183—185 页）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自然明白此时批判爱因斯坦的“意义”，所以一直积极支持、指点对爱因斯坦的批判。

此时，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的“结盟”已开始破裂，得知陈伯达在北京支持、主导批判相对论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上海组织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批判其要害是相对主义，它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些文章同样也只能重复政治性批判，只是调门更高、更激烈一些，如：“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

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见上书，第 195—201 页）他们甚至对爱因斯坦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杨建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民主与科学》，2005 年第 3 期）

陈伯达自然不甘落后，于 1970 年 4 月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计划在北大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发起要让中小学生也参加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但此计划因其在 1970 年秋的庐山会议上垮台而未能实现。

在北京、上海两个“批判相对论”小组的背后，原来还有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而进行的相互倾轧！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陈伯达集团从中国政坛“出局”，但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并未停止。这时的批判，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全面专政”这个一般性背景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即以“批判相对论”而将矛头指向此时正在艰难批“左”的周恩来。相对论从陈、张争宠的“道具”又变为“批周”的“靶子”。

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乘势“批左”，多次提出要重视“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71 年 11 月，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公开赞扬了爱因斯坦，想以此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断，并受到“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批判。而“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直到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前，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一直不断。（见上书，第 196—202 页）

“四人帮”被粉碎的几个月后，科学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爱因斯坦仍未被“正式平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编辑依然心有余悸，对译者撰写的序言中将他称颂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提出质疑，认为爱因斯坦只能说是科学史上的巨星而不能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

说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机智地解决了争端：“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见上书，第206页）如此一改，便获通过。其实，“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可能比“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还要伟大、崇高呢！“中国语境”有时就是如此有趣、如此莫名其妙。

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也标志着相对论与中国政治终于“脱钩”。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却是格外的沉重。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1949年，面对政治、社会的苍黄巨变，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要作一种“何去何从”、非此即彼的选择。著名作家沈从文当然深知这种变化的时代意义，更明白这一巨变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毅然搁笔，在年近半百之际突然彻底改行，转而从事远离“意识形态”的文物研究。

沈先生对文物虽向有兴趣，但对真正的文物研究可说是一无所知。然而此后的几十年，他一直潜心悉心，从头学起，孜孜矻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甚至是恶劣，都多少年如一日地埋首于斑斑驳驳的文物之中，最终取得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成为文物研究的专家。从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学巨匠到冷静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转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对此似乎心甘情愿，似乎几十年“心如止水”，过去的一切似乎全都淡忘了。否则，何以能在冷清寂寞的文物研究中取得那样丰硕的成就？然而，他在1961年所写的一篇尚未完成、当时也未准备发表的草稿表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转变其实是“心有不甘”的，深叹这是“把生命浪费了”。这篇尚未完稿、文字也未经雕饰，甚至还有些粗糙的文章实际上是沈从文痛苦的内心独白，使我们得以一窥沈先生那看似平淡、实则充满悲情的内心世界。

说来更令人感叹，这篇名为《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版，第21—27页）的文稿，是在被查抄数年后退还的材料中发现的，有些字句下面还有专案人员用红笔画的道道，表示这些字句的问题更为严重。

面对新时代，沈从文先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时代对

艺术从内容、形式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结果必然是“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而且，“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对在旧时代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来说，要他在政治行为、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转变并非难事，但这种转变“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沈先生无疑不愿“胡写”，只能选择“不写”。当然，他并不否认这种文艺观念转变的意义：“尽管还有许多人不大理解，难于适应，但是它的发展还无疑得承认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过他的笔锋一转，认为“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对“如何创造作品”的简单化，“以为只是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必然落空。即补充说出思想改造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还是简化了这个问题。不改造吧，斗争，还是会落空。因为许多有用力量反而从这个斗争中全浪费了”。在这几十年间，“改造”、“斗争”一直不断，结果呢，茅盾、曹禺、老舍、巴金……这些当年的文坛巨匠，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确已基本转变，在文学上也力图写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然而虽经十分努力，他们究竟写出了几篇超过自己当年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改造”、“斗争”确实已经“落空”。人的力量，或者说生命的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受到重压，白白浪费。沈氏颇为痛心地写道：“正如同一个现代科学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样，明白它蕴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个力量，力量即出来为人类社会生活服务。不懂它，只希望元素自己解放或改造，或者责备他是‘顽石不灵’，都只能形成一种结果：消耗、浪费、脱节。有些‘斗争’是由此而来的。结果只是加强消耗和浪费。”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生命、生命的意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强调共性，否定个性。“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创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长’方法所能完成”。否定个性，就是否定生命，因为人不是机器（何况机器还有“不同性能”）。他虽然“自觉”远离文坛已有多年，但对文坛发

生的一切是清楚的；或更准确些说，正是由于他在十余年前就已料到这一切，所以才决心远离文坛。文学标准完全为政治标准所取代，文学已经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或简单的“传声筒”。对此，他当然不满，但更多的是担忧。文学的困境在于受到“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谨慎严肃……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几个字下被专案人员画了红线）虽然“乐意”，却无法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来，最终还是“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如果“不乐意”，干脆就无法写任何东西，更是“消失了”……走笔至此，沈先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下处境，不能不更有一番感慨：“这也就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种工作上，表现得还不太坏，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真可谓‘辜负明时盛世’。然而他无可奈何。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虽然他已“全心全意”从事文物研究，但心灵深处真正热爱的依然是文学，那才是“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对他来说，研究文物只是在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当他刚转行时，常到展厅而不是在办公室学习，结果受到“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的批评，而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又受到“白专”的批评。在“文革”中所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见上书，第 28—38 页）的检查稿中，他不无辩解地说：“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他的自我辩解（“从个人兴趣出发”当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罪状”之一），更是他的由衷之言。

在《抽象的抒情》中，他颇有些自嘲地写道：“他明白个人的渺小，

还比较对头。”“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就是“妄自尊大”，因为“时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对于这种时代的特征，他一针见血地写道：“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沈先生虽不是理论家，却以文学家的敏感触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本质特征和症结所在。正是这种把人简单、严格地分为“敌”“我”，一切都归结为“政治”的主导思想，导致了强求一律、万马齐喑的局面。他认为，对人“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生命、创造、创造力，是沈先生一贯推崇、珍视的。生命一旦被压抑，创造力就被摧毁；如果没有创造，生命便如枯萎的花朵，失去了本来意义。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这句话下被专案人员画了红线）他坚信，“社会发展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何时才能如此？他回答道：“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支配人的权力”。所以，他希望掌权者“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

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分子，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本身，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书生之论。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工具，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解决，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一定要“加强思想革命化”，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二者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沈从文先生明白在时代、社会面前个人的渺小与一己的无奈，自己所写的这些至多只能是私人“抽象的抒情”。然而由此我们终才明白，沈先生虽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不已的丰硕成果，但内心深处一直隐隐作痛。因为从他对生命本质的体认上来看，无论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

沉重的疑问

蒋星煜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专家，同时长于中国历史，著述颇丰。其近著《文坛艺林见知录》，不仅使人“广见闻”，也每每引人深思。书中谈到了作者自己的一桩冤案，并提出了自己困惑多年、至今仍未获解答的疑问。细细想想，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沉重的疑问。

那是在 1959 年，毛泽东提出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自然要积极响应，于是找到对海瑞素有研究、写过历史小说、且常给其副刊写稿的蒋先生，要他赶写一篇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欣然受命之后，蒋先生便紧赶慢赶。小说很快见报，除题目《南包公——海瑞》为报社改定外，余皆一字未改，全文照发，而且前面还有赞扬海瑞精神的“编者按”。后来，他才知道报社总编亲自过问了这篇稿子，题目和“编者按”都由总编拟定。

1962 年，毛泽东又提倡魏征精神。《解放日报》又找蒋约稿，要他写有关魏征的文章。由于此时政治风声更紧，为慎重起见，接受约稿后，他先反复研读《毛泽东选集》，发现《矛盾论》中曾举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要广开言路时所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两句话，以说明研究问题切忌带主观片面性。蒋先生相信自己“紧紧把握这个主题决不会犯错误”。但究竟写什么具体情节，他“更不敢草率从事，生怕自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于是再翻阅范文澜先生 1941 年在延安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此书对李世民经常接受魏征的劝谏而改正错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并指出“好田猎”是李世民的主要缺点之一。这样，他放心地以魏征劝谏李世民田猎为题材写了《李世民与魏征》，交由报社发表。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反而莫名其妙地被“另眼看待”，

影响到正常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仍一直不知道我原先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短文，此时已被人看作是反党的‘大毒草’。”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1966 年初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已于几个月前发表，“文革”序幕已经拉开，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解放日报》也发表了严厉批判海瑞的文章，批判重点正是蒋氏所写的《南包公——海瑞》，并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严批，使他成为“文革”中最早被点名批判、最早受迫害者之一，而后长期受到更残酷的迫害。这两篇历史小说使他“两罪俱发，从此被推入苦难的深渊。整个‘文革’期间，文化系统的所谓‘批斗会’的批判锋芒几乎每次都扫到我和我的那两篇文稿”。

因此，作者不能不问道：“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弄懂其中奥妙。既然是中央负责同志要宣传海瑞精神、魏征精神的，既然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布置我写的，我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出色，何以反而有罪，而且‘罪该万死’呢?”

这个沉重的问题，当然应由报社、报社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来回答。同时，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发问，我们每个人都应认真想想何以如此。

或许，这正是当时政治无序、无规则、“不讲理”的反映。“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必须想方设法给什么。一旦“上面”的政策或喜怒有变，反拿“下面”是问，因为这是政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确实“有理无处说”。试想，连仅居“一人之下”的堂堂国家主席，在这种形势下以宪法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终被迫害致死，遑论他人！而且，最高层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分歧和斗争，竟然长时间地、极大地影响到社会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确非正常。凡此种种，都说明一旦政治失序，不讲最起码的规则、道理，那么从“一人之下”开始的几乎所有人的“生存权”，都将受到严重威胁，不获保障。

另外，明明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我”积极响应号召并积极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想最后反因此获罪。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应保持独立的思想、精神和人格，以及不盲目“积极响应”的重要性。

文章千古事

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文汇读书周报》2001 年 2 月 10 日）一文中，详述了 1955 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的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了不少内情。唯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在 1990 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那八大本、共 200 余万字的《批判》。

当时有杂志约我写一篇大陆“新时期”以来胡适研究述评，我觉得要了解新时期胡适研究的意义，给新时期胡适研究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必须从当年的胡适批判运动说起，于是借来这八本《批判》。没想到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书中不仅完全否定了胡适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和成就，甚至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被完全抹杀。此外，书中还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辑，三联书店，1955 年版，第 46 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只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 320 页）“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 335 页）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

读了这些文章，深感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人对胡适的看法

也有所了解。在检读文献中，胡绳先生 1937 年 3 月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胡适论》给人印象尤深。他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胡适时写道："正如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我们也得注意：在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两相对照，不同时代、不同文风的反差格外强烈。因此，我在《破后之立》(《读书》，1990 年第 6 期）一文中写道："值得回味的是，一些共产党人在 30 年代严肃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仍持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态度。"然而，"这种严肃却又不失客观公允的态度，似乎被人们忘记了……"文章发表后，据说此点颇得胡绳先生重视，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他还提及此点。

说实话，细读这八大本《批判》，不仅使人惊讶，更使人心情格外沉重。

之所以沉重，是因为有几位作者的文章墨迹未干，自己反被打成"胡风分子"而长期身陷囹圄！在 1955 年 6 月出版的第四辑的扉页上，出版者写道："本书印就之后，临时抽去一篇，因此书中缺第二一——二八页。"不是万不得已，决不会自己"开天窗"。被抽去的是什么文章？作者是谁？为什么要抽去？倘曾彦修先生或其他知情人能回忆起来，当给这一运动增加一个细小而生动的注脚。在随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其中绝大部分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打击，甚至迫害。不知当他们受到不公正的粗暴对待时，是否想到，自己也曾不公正地粗暴对待过别人；是否想到，后来的一切其实都与这次"第一"有关；是否想到，当"大家"可以不公正地粗暴对待某一个人（即便这个人"完全错误"）时，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大家"不公正地粗暴对待。

之所以沉重，因为现在看来"这一场大批判，真是一场劳民伤财、彻底打破了自由研究任何人文学科的幻梦的灾难"。（曾彦修：《立此存

照》）但这百余位作者都是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其中许多人为笔者深深崇敬，而那时都不能不为时潮所裹挟。当然，有的是迫于外在压力，无力抗拒；有的是发自内心，坚信自己紧跟时代步伐。无论怎样，这些文字都将永远“立此存照”，无法抹去。

“文章千古事”，要写出几十年后自己不后悔的文字，要写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经得起检验的文字，的确不容易，既要有“胆”，也要有“识”，二者缺一不可。

莫让岁月空流逝

赞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评定，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先生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最重要、最大的特点，就是“迂直”。真没有想到，李新竟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蒙在作为本书的序言《怀念我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李新同志》中回忆说，那是 1946 年，他刚刚 11 岁，李新随叶剑英元帅到北平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因与王父是好友，所以曾登门拜访。李新的谈话，对年幼的王蒙竟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王蒙在其自传《半生多事》中相当详细地写了这一段。王蒙写到，就在听李谈话前，他恰恰听到国民党北平市某局长的广播讲话，满口空话、套话，陈词滥调，与李的言谈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体会到一个政党的前景，从它的文风上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我还说，一个政权的衰落是从语文的腐烂上开始的，可见我印象之深”。此言不虚，因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经官至文化部部长，对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读到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长者的回忆，王蒙感叹道：“此次有机会读到他的自传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书的开始所讲的关于写真话的想法，关于拍马式的史料的抨击，还有他的诗，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气，甚至是迂直的书生气。”

李新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虽然 80 年代中期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时，他已升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但由于他主持的两项主要研究任务仍由近代史所承担，因此多有具体指点；更由于他长期在此工作，因此影响或曰“遗风”仍“大大地”，时不时就会听说有关他的许多“言行”，在几次会议上也听过他的发言。他在回

忆录中提到的一些人是我的师辈，一些事早有所耳闻，所以读他的回忆录自然感到亲切，同时，更感格外深刻。深刻，因为他既是经历过革命火与血的洗礼、考验和以后历次“运动”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是中共党史、民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大专家。这种经历，使他的回忆录自然不同寻常。正如著名史学家，同时也是这部回忆录的整理者陈铁健先生所说，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一

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李新是由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战争年代，他做过地方工作（县委书记）、军队工作（县围城司令部政委）、组织工作（组织科长）、青年工作（青委负责人）……所以，他的回忆多方位地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基层情况。与其他“老革命”的回忆一样，对那一段烽火岁月，他也满怀激情地颂扬和怀念。然而，在激情中又有史学家的冷静与客观，比许多同类“回忆录”更多了些理性的反思。

虽然现在关于当年“审干”的回忆已有不少，但他回忆的种种细节还是令人意想不到。“整风”、“审干”开始时，他已离开延安，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任组织科长。“审干”开始后不久，一位敌工科长就在巨大的压力下自杀了，第二天开大会，“组织上”却宣布他是“以自杀来威胁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吹响，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到河边后他才发现，只有男同志没有女同志，正纳闷时又被命令脱衣下水。到水中后，只见负责“审干”的几个人逐一搜查每人衣裤，仔细查看里面的各种东西。回到宿舍后，发现每人的背包已被彻底搜查，大多数人的信件都被拿走，其他的文字东西更是全被收走，片纸不留。同时得知，所有女同志都在宿舍被搜查。但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当时他并不知道，直到二十多年后的60年代初，他遇到一位当时参与搜查、此时已任某省组织部部长的老战友时，才得知详

情，他写道："提起 1943 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而李新得以幸免，不仅因北方局机关"审干"的负责人是他在延安时的老上级，力保他"过关"，更有偶然因素。与他一同在四川搞"学运"、同时入党、一起奔赴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在延安"整风"时，被逼"坦白"说自己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同时"招供"说李新加入的也是复兴社。幸亏战争期间交通不便，这个材料没有寄到前线（中共北方局），而是装在他的"延安档案"中，否则在劫难逃。直到 1960 年因工作调动，中组部才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这份材料，此时真相早已大白，自然将这份材料抽出销毁。

他沉重地写道："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细致回首这一页，不是为了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严肃认真地反思，汲取历史的经验。

就在共产党要夺取全面胜利、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李新却出人意料地主动要求脱离权力颇大的"实际部门"，而到权力小得多的"教育口"工作，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早年就想当老师，因此考入川东师范，却因参加救国救亡运动而不得不终止学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或许，救亡、革命的理想实现后，当老师、回到教育界对他而言是一偿夙愿。后来，他又从人民大学调到近代史所工作，仍不脱离文化、学术界。

因他的资历，无论是在人民大学还是近代史所，仍居"领导"之列。而这一阶段，正值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理论、思想、学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接连不断，风急浪高，最后酿成暴风骤雨。作为领导，他对这些运动的了解自然较他人更深一层。

在反右运动中，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之一，但也险些被打成"右派"，多亏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保护，才幸免于难，不仅幸免，而且还成为新闻系的反右运动指导人之一。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召开的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上，系主任安岗在发言中"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言辞非常激烈，已知"要收"的最新"动向"的李新立即扯他的衣服，暗示他停止发言。但安岗正在兴头上，根本不理会李的暗示，李

新只得宣布暂时休会，私下狠批了安岗一番，将“正要变化”的内情告诉安，再开会时，安才不再发言。接着安岗发言的是著名记者彭子冈，言辞也非常激烈。后来，彭即因此被打成“右派”。李新悔痛地写道：“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 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彭的丈夫）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一些对国民党不利的消息，就是通过彭子冈登在《大公报》上，使国民党非常被动。“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这种反省与自责，并不多见。

1959 年，北大和人大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激情满怀地想调查“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优越性”。负责调查的领导人邹鲁风是参加“一二·九”的老革命，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大跃进”开始时他兴奋异常，几近狂热，曾提出把首钢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划归人民大学，并实行“供给制”。调查组在河北、河南各选一个点，哪知实地一看，才知情况与原来的设想正相反，非常严重。老师、学生大吃一惊：“什么‘高产’、‘放卫星’，每亩地产粮几千斤、几万斤以至几十万斤，都是胡说八道。实际是基层干部把农民当做奴隶，把他们像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营，男女分开，不许同居，把每家的锅都打碎，拿去炼钢铁，然后由公社办食堂，全村在一起吃大锅饭，农民干活不出力，吃饭却拼命。”不久，农民只能喝稀汤，他们在河南听到流行民谣：“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参加调查的一位哲学教师曾在一二九师给刘伯承当过参谋，他忧心忡忡，含泪偷偷地对李新说，不久可能会发生大饥荒，会饿死人。情况果然被这位老师不幸言中……回忆至此，李新这位老革命、老党员难掩悲愤，激动地写道：“从 1959 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实即饿死）人数不下三千万人！这是多大的罪过啊！但至今还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竟把这么大的罪过说成是想在中国探

寻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面对此情此景，曾经最为狂热的老革命邹鲁风冷静了下来，他以调查材料为基础，舍弃一些最严重、最恶劣的典型材料，写了一系列基本实事求是的报告。北京市委非常重视他的报告，准备纠“左”。不想庐山会议上最高层反要“反右倾”，于是北京市委也反过来把考察团的这批材料作为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罪证”，把邹鲁风和调查团的主要成员都打成“右倾反党分子”。

本来在了解到调查的真实情况后，北大、人大两校的主要领导思想一致，都认为“大跃进”太“左”，应该适当纠正，应向上级报告实情。现在全党“反右倾”，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为推脱责任，便联合起来，说邹要调查组专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写出许多“罪恶材料”，于是向邹发动无情斗争。邹气愤不过，最后服药自杀。

对“大跃进”的前因后果及邹鲁风的遭遇，李新都有深刻的分析，恕笔者不在此细述。我只想多说一句，后来公开发表的“两校”联合调查报告却是（当时也不能不是）坚决反击“右倾”、大赞“人民公社”的颂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正以这类公开的报告、报道为“文本依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研究”，进而对其大唱赞歌。“历史”如何“形成”，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二

在战争年代，李新曾先后担任过河南杞县县委书记和河北永年县县委书记。那个年代的县委书记，不仅要管“行政”，还要管“军事”。更重要的是，那正是中国广大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是事关千千万万农民生死存亡的土地制度大变动的年代。在与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又要在农村“土改”，而且全国各地差异巨大，如果政策有大的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对“土改”，以往的党史书中更多的是记载最高领导层在“土改”中的探索、分歧、争论，“基层”只是上面政策的执行者。的确，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前无古人，必然会有种种“试错”，而且随着形势的

发展，高层政策往往会有大幅度的调整，所有这些都使“基层”在执行政策时有相当大的“裁量权”。县委书记承担着承上启下、具体实施“土改”的重任，李新担任两县的县委书记期间，正是轰轰烈烈的“土改”时期。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基层干部在拥有较大“裁量权”的情况下，对上级政策的理解、贯彻和执行中的争论。平级间的争论往往十分激烈，有时还拍桌子摔板凳，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富于戏剧性。正是在争论中，符合实际的政策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而基层的情况又反馈到高层，对高层决策的形成和调整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往往是这种高层与基层互动的结果。所以，基层如何向高层反映、汇报情况，对政策最终制定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

“土改”确实事关重大，此书对这方面的回忆、分析尤细，占了相当篇幅，本文难以详述。只想强调，这部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即工作方法、思维方式问题。所谓工作方法、思维方式，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真正深入群众，尊重“常识”。这些，现在被视为老生常谈，但其实很难做到，对官员、对习惯于脱离实际的进行“理论思维”的学者来说，更难做到。因为有时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合理”的。

由于永年县离北京较近，他于1965年和1981年两次回到永年。

1965年，他回到当年由他建立支部的永年施庄。他写道：“经过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国一样，永年元气大伤。我到施庄一看，比40年代战争期间还要穷困。施庄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现在和大家相见，有如梦中，大家还是像当年那样亲切。”由于他是当年人们熟悉的“老八路”，农民才告诉他一些“秘密”，当然，还是要他再三保证决不“泄密”。永年产优质棉，当晚有人给他送来棉被，仍像从前的一样，他对支书夸说还和从前的被子一样好，哪知支书叹口气说：“怎么能和从前比，从前八路军一个团进村，每个人两条被也不成问题。现在嘛，凑合着过吧。”随后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开了，他才知道，每人每年只分一斤半棉花，当时农民无钱买布，这一斤半棉花连织布穿衣都不够。农民自然意见很大：“我们冬天还盖不盖被子呢?”村领导只能钻政策的空子：摘来的棉花必须上交国家，掉在地

上的棉花农民可以拾回家。于是村领导决定让妇女和小孩去先去“拾棉花”，但每人不能超过十斤。这样，村民总算凑合着冬天有被子盖了。当时农民每人每年分不到二斤油，油籽打出来的油几乎全要上交“国家”，于是村领导便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净，等交公之后再打干净，然后就按人口分给大家。“当然，这个数量也不能很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远了，但每人平均二斤油是不成问题的。”

如按当时的理论，农民的行为显然“不合理”；但如果不受这套理论遮蔽，“不合常理”的恰是那套理论，农民的行为恰恰“合情合理”。因此，李新信守了诺言，没有向他所熟悉的、正在当地“蹲点”的领导们告发农民变相的“瞒产私分”。

1981 年，李新再次来到永年，当时农村正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分田到户。但这时永年的农业生产已基本机械化了，如果分田到户必然要废机械而重新畜耕乃至人耕，这显然是一种倒退。因此，县委不同意上级分田到户的指示，希望李新能向地委和省委反映他们的意见。李新当然支持改革，但决不“教条”，所以也认为县委的看法有道理。或许是出于习惯，他还是决定再到村里去，跟老农谈谈。没想到，那些老农，其中一些还是老党员，却都主张分田。李新问他们：“把田分了，就用不上机器了，怎么办呢?”但老农回答说：“自己种，还能多得点；机器种，都归了队里，到头来分不了多少东西。”

原来，在“公社”体制下，尽管实行机器耕种，但农民得利不多，因为农民没有自主权。所以他们宁愿分田到户，哪怕用牲口乃至人力耕种也不在乎。农民的态度、意愿改变了李新的观点，因此未向“上面”反映县委的意见。最后，永年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分田之后的景象，看起来的确很滑稽，每户的田，西一条，东一块，有的用牲口耕，有的连牲口都用不上，索性用人拉犁耕。”“从机耕退到人耕，确实令人感到可笑，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高涨起来了。”由于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收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了能够畜耕，不久就自动地相互换地，一家或几家合买牲口。事实说明，最重要的是农民的“自主权”。生活的“逻辑”与书本的“逻辑”，有时确实相差甚远。

“老革命”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识到自己的

责任：“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的回忆，使岁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

"国学热"中说"国学"

"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由于种种原因，已被"官"、"学"双方冷落多年。不料近来却突然"走红"，在"官"、"学"双方中都引起了某些兴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而成"热"，殊为不易。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热炒"的结果，但媒体为何要热炒这与国计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绝学"？而媒体的热炒为何又能得到相当的呼应？可见，除了媒体的"热炒"外，定有某些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

其实原来本无"国学"一说，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国学"的产生，以与"西学"（新学）相区别乃至相颉颃。但"国学"原无精确定义，举凡有关中国传统的各种道德文章、经济学术等等都可称为"国学"。因此，从近代开始到20世纪初，"国学"倒不乏学术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它曾是"顽固派"抵制新学、反对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鼓吹"反满革命"的有力武器。不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学"成为彼此争斗不休的救国方策之后，"国学"被视为"落后"，遂蜕尽"杂色"而退居边陲，成为涉世无多、仅囿于书斋的"纯学术"。但也因此产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国学大师"，其学问与人品大都令人敬佩。

不过1949年后，学术领域也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取代一切旧的学术传统，"国学"首当其冲，而对《红楼梦考证》的批判，成为建国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先声。"国学"因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遭到严厉批判，再次被赋予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境

下，如果仍坚持“国学研究”，就意味着拒绝“改造”；如果放弃这种研究，就是事实上的失败与屈从。在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学”终于完全销声匿迹，确成绝学。

然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起，“国学”重新复出，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终于成为今日热度空前的“国学热”。但 90 年代“国学热”所反映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倾向与 80 年代“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态度，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因此，人们很容易、也确有理由认为，这是对前一次“文化热”的反对和否定。然而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国学热”恰恰是前一次“文化热”的逻辑必然发展。正是充满激情亦因此偏激的第一次“文化热”，将传统文化的许多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摆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冷静、理性、细致的研究和思考，“国学研究”自然而然地提上日程。事实上，梁漱溟及“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就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可以说，无论有没有 80 年代末的“风波”，“国学”都会重新受到学者重视的。当然，表现形式或会有所不同。在“风波”之后随之而来的“大批判”中，学术研究的空间一度骤减，一些学者开始提倡国学研究，一方面的确有意借此摆脱言不由衷的“大批判”，逃离政治，表明了对学术独立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对 80 年代的偏激与浮躁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为学术而学术”、“让学术回归学术”、“把学术与思想分开”等口号。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几十年“学术”与“政治”不分的情况下，在几十年“学术失范”的情况下，这对学术、文化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果追溯历史，“国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如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在 20 年代末的混乱黑暗的政治环境中，由“红烛诗人”而成“国学”专家，甚至因很少下楼而被戏称

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的确具有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似乎历来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处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备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是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 40 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处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而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

国家对“传统”、“国学”的明确倡导、支持是从 1989 年之后开始的。1991 年第 1 期的《高校理论战线》报道了“前不久”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师组成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课题组，联合组织召开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多是史学界的“官员”，如中国史学会会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央有关研究机构负责人等。“与会者就近几年

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许多同志认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应该认真加以清理和批判。”他们认为，“近几年泛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不少同志在联系近几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泛滥的实际情况指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尤其在经世未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对其危害绝不可低估。”他们还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是‘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是歪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产物”，“是国外某些言论的再版”，“是走极端的片面性思维方式的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一开始便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与目的性。

因此，1993 年 8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提倡“国学”，提出：“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称为‘国学’，并无不当。”仅仅两天之后，8 月 18 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短评，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1993 年 11 月 14 日，央视的《东方时空》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是北京大学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1994 年 2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

与《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传"国学热"，报导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21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国家级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政府开始祭孔，导向作用明晰的央视的《百家讲坛》，事实上变成了"国学"的"独家讲坛"……

本文无意也不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作出分析与评价，仅想指出"国学"而成热，便是这种调整的结果，"国学热"无疑为这种理论"调整"提供了学术的支持和理论的力量。因此，那些最具权威的"大报"和"央视"才会不惜版面、频道，热情地为"国学热""造势"。当然，在政治泛化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又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们本人所无法掌握的。对莘莘学子来说，对"纯学术"的健康发展来说，这究竟是否福祉，还要拭目以待。

第四辑　历史：何以至此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连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为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他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的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皆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是常到山中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

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却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他们本想在休养时读读书，所以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像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皑皑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 20 世纪初，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休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的，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在日内瓦的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间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

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但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在几个月里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的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

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忍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绝不放弃。1916 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像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

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稳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 年 3 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

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之后的总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然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 1789 年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 1%，却占有全国 30%以上的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人口的 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则最少。

当路易十六于 1774 年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几任国王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则严重触犯了其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的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

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强烈反对。他的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任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和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几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这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成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上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到：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却并无效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了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会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而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由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

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自己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求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仅是作为纳税人，而且也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教士、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进行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被点燃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了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来说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了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

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了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而且，革命往往也不是“革命党”主观上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森有礼的悲剧

一

1875年，日本明治维新不过七年时光，便已经觊觎当时尚为中国“藩属”的朝鲜。但此时日本毕竟力有不逮，还需与清政府打交道。这年年底，年仅二十八岁的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与五十有二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涉朝鲜问题。席间，两人就如何学习西方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激烈舌战。

李：“森大人到过西洋?”森：“自幼出外国周流，在英国学堂三年，环地球走过两周。”李：“中西学问如何?”森：“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五分尚没有。”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么说没有五分?”森有礼则强调，日本现在还处于学习、模仿阶段，还未像西方那样能自己创造。然后，二人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系列改革，李鸿章表示自己对日本的改革很是佩服，但“独有对贵国改革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对此，森有礼回答说：日本传统和服过于宽大，“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服装改革，使日本获益不少。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的追怀，“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回答：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中国服装的优长之处就改穿中国服装，“不论何事，善于学

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立刻十分尖锐地问道：“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于我国。”李鸿章则明确表示：“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反驳说：对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

或许是为了“回报”李鸿章刚才问他对日本改着西装是否感到“羞耻”这样不客气的质问，他紧接着也非常不客气地说：中国现在的装束发辫不也是几百年前满人入关后才改变的吗？李鸿章则以“此系内政”答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用欧俗。”森有礼仍不依不饶地说：但变革总是变革，当时满人强迫作这种变革时，还是引起了“贵国人民的忌嫌”。

这场论战，表明了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维新”的根本不同。森有礼年纪轻轻却如此咄咄逼人，象征着“年轻”的日本即将超过“老迈”的中国。其实，早在来华之前，年仅24岁的森有礼就于1871年出任了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在美期间，他与中国负责幼童留美事务的容闳相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公使而中国无外交使节驻美，所以森有礼向容闳建议，中国政府也应派遣外交使节驻美，这样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交往。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首任驻美正、副公使，或许与他的建议有关。

森有礼1847年出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代先接受汉学启蒙教育，而后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1865年，他奉藩主之命与十几名学生一起赴英留学。由于当时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出洋，为掩人耳目，他们只能以去日本的南海道为名出海，而且每个人还不得不改姓换名，森有礼就改名为“泽井铁马”。好在第二年幕府开放了海禁，日本出国留学人数直线上升。

在英国伦敦大学，森有礼研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课程。他

利用假期到俄国和欧洲各地游览，见识大长。1867年，他到美国游学。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礼立即回国，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公议所所长等职。1871年，他出任日本首任驻美国公使，由于工作卓有成效，不久调回国内晋升为外务大丞。当时日本已对朝鲜和中国台湾抱有野心，所以对华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1875年至1878年，森有礼担任驻华公使。由于对华“外交”有功，森有礼于1879年归国升任外务大辅，在同年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他亦功莫大焉。1880年，他又赴英任特命全权大使。1885年日本首次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其力邀下，森有礼出任新内阁的首任文部省大臣。

二

一位资深外交家突然脱离外交界而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却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文化、教育实为森氏真正的志趣所在，且在此方面建树甚丰，早已大名鼎鼎。

早在出使美、英时，他就一直关注欧美国家的文化教育情况，撰写、出版了有关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早年出使美国时编撰的英文书 *Education in Japan*，后来中文译名为《文学兴国策》。这本书是他在1872年初任驻美公使时，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实业界人士发出的有关教育征求意见函的回函汇编，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内容是他撰写的《绪言》，该书于1873年初在美国出版。他认为，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也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发此函的目的就是征求美国各方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体系的建议。征求意见函发出后，得到了13位人士的回复，主要为著名大学校长、教授，还有关心教育的科学家、部长、实业家，而美国主管教育的官员和耶鲁大学校长另寄专文作为此书附录。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介绍、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提出教育的无偿性、平等性和世俗性三原则，因此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主张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也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有些作

者还以自身的实践和体验为例，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各级教育体制，对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等都一一作了说明，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教育与实业的关系也有专门介绍。他希望以此书为起点，以“合理主义”、“科学尊重主义”、“经济主义”为核心，将近代教育制度迅速移植到维新起步不久的日本，加速引进西方文化，促进日本近代化。所以，此书尚在编辑过程中，森有礼就迫不及待地将书稿复制一份，送给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访美考察团。美国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College）校长满勒（D. Murray）教授是13位复信者之一，他在复信中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各种专门教育，学制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应确立与国民性、国民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所有儿童都应享受初步教育，女子教育与男子同样重要，对技术学校、师范学校乃至学校的博物馆、天文馆设置都提出了具体方案。他的意见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在1873年至1878年被明治政府聘为顾问，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中参加了最高层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直接参与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对日本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1873年7月，森有礼在美任职期满，回国后担任外务大丞，但他在思想启蒙运动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他以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劝说一些思想、立场相同的著名学者、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启蒙社团：美国的学者们组织了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并举办公开演讲，以益公众；而日本的学者互不往来，对社会贡献很少。现在，日本学者也应像美国学者一样结成社团，共同探讨学问，从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经过一番联络，他发起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因其于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时创办发行《明六杂志》，并定期集会，公开演讲。“明六社”成员皆为一时之选，如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树等，都是其核心人物，首任社长由森有礼本人担任。“明六社”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启蒙思想，即“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他们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发表了大量影响巨大的有关论文；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书籍。他们的努力启迪了一代人心，在日

本新思想的传播上，他们的"首功"确实功不可没。虽然后来"明六社"及《明六杂志》被日本政府查封，许多成员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他们毕竟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当然，在启蒙的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的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的危机视为自己的使命。

作为"明六社"发起人，十几岁就到欧美留学的"洋学生"森有礼的观点更加激进。当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对基督教都抱警戒、惧怕、敌视的态度，认为允许基督教在本国传播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剧烈冲突，而森有礼冒着极大风险，公开反驳这种观点，他自己还改信基督教，正式成为教徒。他强调，信仰自由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人进步、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自由是广开民智的前提。随身佩刀是日本武士的传统与特权，刀是武士的象征，被视为武士的灵魂，但森有礼认为武士佩刀贻害无穷，因此首倡"废刀论"论，并与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对传统婚姻制度如妻妾制，他也建议改革，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他甚至主张改造语言，激烈批评日语是"无法通用于日本列岛之外的贫乏言语"，应予废除，而将简化的英语作为日本国语。国外的经历使他对"实业救国"深有体会，所以他在1875年创办了"商法讲习所"，提倡近代工商业。现在著名的社会科学类综合大学，尤以培养工商金融界精英闻名、有"日本的哈佛"之称的一桥大学，即由此讲习所发展演变而来。

日本的启蒙运动引发了"农工商卑贱三民"要求获得自由民权的"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迅速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许多报刊成为它的舆论阵地，政治性社团纷纷建立，一系列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要求改革政治、"还政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面对发展迅猛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于1875年发布了"谗谤律"和《报纸条例》，1876年发布了"演说取缔令"，1879年发布了《集会条例》，对言论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对以知识分子为核心人物的启蒙运动和思想，明治政府已从过去的支持、鼓励变为限制、镇压。政府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危险"思想，《明六杂志》于1875年11月被迫停刊，"明六社"也于同月自行解散。面对巨大的压力，不少启蒙思想家转而支持政府，

成为御用文人。

同时，官方内部关于日本究竟应采取何种政体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首先是要不要立宪的斗争，以反对立宪的守旧派失败而告终。紧接而来的是围绕如何立宪的斗争，政府内部以大隈重信为首的一方主张迅速立宪，并以英国为楷模，国会拥有较大权力，被称为“激进派”；另一方以伊藤博文为首，主张稍缓立宪，并以普鲁士为楷模，强调天皇、国家及行政部门权力更大，被称为“渐进派”。明治政府意识到，英法思想容易为民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所以提出“西学”并非全都适合日本，而应有意识地“选择性”学习，最后决定学习普鲁士。1881 年 10 月，“激进派”与“渐进派”双方摊牌，以具有英美自由政治倾向的大隈被免官、“激进派”失败而宣告结束，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这样，日本的立宪便以“富国强兵”、加强天皇和国家权力为发展主轴，日本社会本就强大的“国家主义”思潮更加高涨。

在这种“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启蒙运动被限制、国家主义不断高潮的氛围中，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亦纷纷从“自由主义”滑向国家主义。他们的这种转向看似突然，其实早有内在的思想基础。因为他们虽然提倡启蒙、开化、自由、民主、个人、宪政、西化……甚至主张以英语取代日语，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富强，是为了“救亡”而“启蒙”。就其实质而言，仍是民族主义，是为了国家，而不像欧洲启蒙思想，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本身即根本目的。因此，森有礼欣然接受“国家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伊藤博文的邀请，出任文部大臣，最终从自由主义者堕落为手掌大权的国家主义者。

三

森有礼上台后，迅速颁行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 1886 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和 1889 年的《实业教育令》，这些通称为《学校令》，取代了过去的教育法令。在短短的时间内，森有礼建立起了一个以小学为基础，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体制的完整的教育系统，从而确立了日本现代教育体制。现

代教育的确立，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文化发达、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是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森有礼被誉为“明治教育的中兴之祖”。

作为国家主义者，他在日本学制“西化”的同时，却将教育的“灵魂”国家主义化、军国主义化。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个人的完善、个性的发挥，而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教育绝对要接受国家的领导；为了维护“国体”，必须实行国家主义教育，教育必须压制、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把学生培养成“尊王爱国”的忠顺臣民。《帝国大学令》规定大学要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校长要“秉承文部大臣之命统辖帝国大学”。他对大学校长们训诫说：“学术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比较，应把国家的目的列在最重要、最优先的地位。”他尤其重视在小学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中培养、灌输国家主义精神，他认为只有从小接受国家主义教育的人才可能自觉地将国家、天皇的利益和荣誉放在首位，长大后才不会反对政府。他还认为，学校必须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将军事训练纳入大学教育，除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外，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为了把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学生的意识中，师范学校的学生生活全部军事化，学生都穿军装，后又强制教师也都要穿上式样统一的制服。

森有礼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使日本教育在近代化的同时，还带有国家主义的性质和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教育”铺就了道路，也为日本迅速走向军国主义、急剧对外扩张埋下了伏笔。

国家主义必然要强调“国粹”，因此，19 世纪 80 年代“国粹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保卫国粹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当年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焦虑，如果从“器物”到“制度”全都学习西方，和西方一样，那还有什么日本特色？什么是日本的主体性？什么是日本的身份认同？因此掀起了一股抨击欧化的潮流，排外主义开始在全国泛滥，日本进入“国粹主义时代”。“国粹主义”认为儒教的礼仪纲常为日本立国之本，儒教对于维护天皇主权之国体具有特殊意义，提倡以儒教作为培养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的根

本，坚决反对佛学和基督教，主张放弃学习西方的“西化”国策。最终，明治政府确立神道的国教地位，恢复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儒家思想的纲目德常教化民众，将天皇与民众关系定位为“父子”关系；成功地将传统儒学、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神道教融为一体，成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础。

虽然森有礼早已是强烈的国家主义者，在教育方面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奠定了基础，但他毕竟是基督教徒，是早期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开化”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1889年2月11日准备出席明治宪法颁布庆典时，在其官邸被一名狂热的“国粹派”青年暗杀，重伤不治，于翌日去世。

从著名的启蒙先锋、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遽变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这是森有礼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许多日本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其中一些人在这条路上甚至比森有礼变得更快、滑得更远。每个人的转变原因或有不同，可能是纯思想的认识转变，可能是政治高压下的利害选择，但都说明了坚守启蒙、自由、平等观念的不易。由于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启蒙者们集体转向，使日本的崛起迅速、彻底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价值观所主导。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自由、平等、博爱、“世界公民”等启蒙价值观的缺席，近代日本的崛起最终对邻国、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

茨威格与罗曼·罗兰分别在1928年和1935年到苏联访问，回来后写了或简或详的访问记。今天一边读他们当年的闻见观感，一边回想这半个多世纪的潮起潮落、风雨苍黄，使人有不胜今昔之慨；他们的态度、意见和观点，更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一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一封邀请信，要他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生性谨慎的他这次却没有丝毫犹疑，立即决定接受邀请，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苏联。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为茨威格对政治一向厌恶，而到经过十月革命的苏联访问，本身就会被政治所“利用”。“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赞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2年中译本，第362页）因此，十月革命后许多欧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态访俄，想一窥虚实，但他们回来时有的满怀热情，有的失望沮丧，使人真伪难辨。茨威格当然也想前往考察，亲睹这个“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的国家。对其作出自己的结论。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译为俄文，有许多苏联读者，所以更想访苏。不过，之所

以一直犹疑不决，久未成行，是因为“在当时到俄国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他是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绝不想轻易作政治性表态，“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见上书，第 363 页）但这次是为纪念信仰非暴力哲学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可使他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

在苏联，他度过了一个活动紧接一个活动、非常紧张的十四天。每天都是参观、集会、演讲、访问、会见、交谈、饮宴……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是热火朝天、改天换地、使人不能不激动的场景。所接触的各种人物也是豪情满怀、朝气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为“新人”，对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正在进行的新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氛围，茨威格也深受感染。但看多之后，他又不免心生疑虑：“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见上书，第 368 页）他承认，许多来访的作家由于受到几乎是空前的欢迎，感到自己真正被这里的广大群众所爱戴，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个新政权大唱赞歌，“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唱赞歌，在一片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见上书，第 372 页）

但是，“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见上书，第 373 页）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参加大学生的庆祝会后，他被那些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大学生团团围住，通过翻译热烈交谈，其中一些人还一直兴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馆，继续谈话。当这些学生走后，房内只有茨威格一人独处。在脱衣时，他突然发现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与他拥抱或趁人拥挤的时候悄悄塞进了这封信。信中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

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人监督。”接着，信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和细节。最后，要求他一定将此信烧掉：“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见上书，第373页）读完此信，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开始深省，并以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感到事实真相的复杂性已超出想象，难以判断，所以回国后他只写了几篇简单的见闻，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访苏归来后，很快就出书对苏联作出或是热情赞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断。他感到，自己“这样的保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急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见的”。（见上书，第374页）

《昨日的世界》写于1939—1940年，这时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及这一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已广为外部世界所知。但我们看到，与不少人相比，茨威格的赞扬虽有相当保留，不过从来疾恶如仇、正义感极强、极富同情心、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他在谈到苏联时，仍非常谨慎，欲言又止，更未对各种罪恶进行激烈的谴责或作态度鲜明的评判。这种态度本身，足以引人深思。若与罗曼·罗兰自己要求封存了50年后才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对照而读，则更发人深省。

二

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对莫斯科作了为时一月的访问，他的《莫斯科日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作了热烈的赞扬，同时又对一些现象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

如他虽然称颂斯大林，但对那种过分的个人崇拜又反感至极。在参加了6月30日的盛大游行后，他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

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六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浮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中译本，第 33 页）然而，稍后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 6 月 30 日盛大庆祝游行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见上书，第 110 页）但斯大林对这种个人崇拜不仅不制止而且还非常高兴的态度，对罗曼·罗兰来说又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他猜测可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一格鲁吉亚人心想：‘让他们夸吧，只要他们做我希望做的事’”！（见上书，第 128 页）

当他得知有些青年仅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剥夺了上大学或进工厂的权利时，极为气愤，并向高尔基提出意见，盼其能做些工作改变这种政策。然而，这不仅使高尔基感到为难和窘迫，反而竭力为这种政策辩护，这使得罗曼·罗兰大为不满。对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他深深同情；对滥杀无辜和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他更感难以接受……后来，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又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见上书，第 114 页）“这是常备不懈的警惕性的原因所在，这种警惕性有时使日常生活败兴，有时粗暴地匆匆把嫌疑者当做已经定罪的罪犯。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表现，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因此，正在不人道地

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虽然连布哈林都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仍坚持这种说法，以便证明我们的苏联共产党人朋友们的无辜，也因为这是有些人咬定不承认的实情。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见上书，第115页）这些“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一类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出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这些满怀博爱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笔下。

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的继子谢尔盖是位苏联大学生。一次，谢尔盖向他抱怨说，在大学中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接受死板生硬的政治灌输，而且，这些僵化的政治教条“答案的掌握是通过依样画葫芦。不容许任何讨论”。这种抱怨他当然理解，因为他本人在法国就对官方在学校强迫进行政治教育反感至极。但他现在认为“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一切制度都会犯同一种错误”。同时，他更多地找谢尔盖不满的个人因素，而不认为这是体制的原因。他写到，谢尔盖从小就在身为公爵夫人的祖母家和亲戚圈子中受教育。这位祖母虽然开明，“但仍有反革命的情绪，他的亲戚则属于虽说贫困、但仍是贵族的阶级。尽管在理智上（虽说在遵循真理的同时仍感到遗憾），他应该承认共产主义的总的路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的天性所固有的某些本能和偏见仍使他与共产主义青年疏远……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他准备的是这样一种人的徒劳无益的角色，这种人退出了总的潮流，怀着将变成不满的遗憾观看潮流如何从身旁流过，或者大发牢骚，但又被这种潮流所吸引”。（见上书，第97—98页）

作为一位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享有超出人们想象的特权，事实上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对此，他深表忧虑，屡屡谈及，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他急切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

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见上书，第 119 页）

《莫斯科日记》中类似的思想矛盾与“想方设法”的自我解释还有许多许多，无须再举。

三

茨威格与罗曼·罗兰都可以说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不约而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呼吁人们应该认清“祖国/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与罪恶，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遭到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更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时，茨威格却是欲言又止，总认为任何表态都有失慎重；罗曼·罗兰更是不顾事实地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随即又千方百计地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亦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词（而且是非常可以理解、原谅的），罗曼·罗兰仍生怕引起 50 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在《日记》的最后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做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

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见上书，第137 页）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同时更感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们“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们噤若寒蝉。他们的确可以说是欧洲，不，是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上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们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虽然他们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的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才使更多的人被欺骗，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们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俘获。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发反居“道德劣势”。罗曼·罗兰的同乡、法国作家纪德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问题。纪德本是左倾作家，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 1936 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 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

他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事实说明，对那类虚假言辞的揭露，实际上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和更高的理性智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的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很多，但像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这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茨威格和罗曼·罗兰的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

何以至此

1948年12月17日，北平城内虽仍在国民党控制之中，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近郊已被解放军占领。清华的一切尚未走上常轨，兴高采烈的学生们整天在校园内敲锣打鼓扭秧歌，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在这锣鼓喧天中，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浦江清先生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家闷着无事，读美人约翰·史坦倍克所著《苏联行》。"（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3页）在这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中，他居然"在家闷着无事"，足见其是对政治、世事所涉无多的纯书斋中的学者。

但不知是因"闷着无事"，还是想对一个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界多作一些了解，浦先生在日记中对这本书作了成页成页的摘抄。遍观浦氏日记，所记"政治类"书籍本就极少，更未见其他书能"享此殊荣"，被成页抄录。这说明，他对这本书的确非常重视。在以对苏态度作为区分左、右标准之时代，这本书对苏联却采所谓"客观"立场。因此，左派骂它"反苏"，右派骂它"亲苏"。或许，这正是浦先生所重之处。但饶有意味的是，浦先生所抄录的这几页，都是有关苏联的某些"负面"情况，尤其是关于"个人崇拜"盛行，甚至达到起码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程度的具体情形。他还仔细抄录了史坦倍克与不少苏联人谈起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几种答案："一、俄国人民一向用惯了沙皇和沙皇家属的照片，沙皇被搬掉以后，他们需要一样东西来代替他。二、俄国人习惯地悬挂圣像，而这是圣像的一种。三、俄国人是这样的爱史达林以至他们要和他永远在一起。四、史达林本人并不喜欢那样。但据我们看来，史达林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那样东西便会除掉，但这样东西却只有在

增加。”显然，史坦倍克认为，斯大林对此是喜欢的、欣赏的。

对政治，浦先生向涉无多，倘有，亦少评论，多取“客观记述”。对此书，他亦未加评论，只以其惯常的谨慎作一客观叙述：“书中到处都表现一个自由民主的美国人对于苏联的崇拜领袖好像神明一样以及严厉统制的作风，感觉到奇怪和不习惯。”（见上书，第 234 页）但很明显，苏联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好奇甚至某种警惕。或许，有同感的并非他一人，但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斯大林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世界的太阳”这种狂奔难止的时代大潮面前，个人的某种不同感想，实在是微弱到“不足道”的地步。然而历史表明，“一孔之见”并不乏“真知灼见”，许多“历史的悲剧”正是由于当时对这些“不足道”的忽视而引起的。

从 1956 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面目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 1996 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斯大林秘闻》已由新华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一书，便是利用这批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个人档案、十月革命档案、苏共中央党务档案）写出的力作。利用最新解密档案，能使“重大事件”彻底曝光，使许多“细节”更加丰富，读起来当然也更引人入胜。

在“大清洗”中，被冤杀者无数，然而上至布哈林，下至许多平民百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喊着“斯大林万岁”或“永远忠于斯大林”一类的口号而被害的。布哈林被审查后给斯大林写了 43 封信，一个痛苦、扭曲——扭曲到毫无人格——的灵魂，在这 43 封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些信除了对自己的糟蹋、对其他被害者的谩骂诬陷外，就是对斯大林肉麻的吹捧：“我最近的全部愿望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紧跟领导班子，特别是紧跟你，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同时完全服从你的建议、指示、要求。我看到，伊里奇的精神体现在了你的身上……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见上书，第 424—425 页）在第 43 封，即最后一封信中，布哈林明知死期已到，反为这种“大清洗”寻找理论的

“合法性”：“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天啊，要是有个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支离破碎的心就好了！你要是能看到我多么依恋你就好了。”“我在想象中拥抱你，永别了，你那不幸的布哈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吧！”（见上书，第 428—430 页）

当然，类似情况远非只有布哈林一人。亚基尔是苏联国内著名的战争英雄，在“大清洗”中被诬陷为德国间谍，被判处死刑。他在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和亲近的斯大林同志！我将带着热爱您、党和国家的语言，怀着对共产主义胜利的火热信念赴死。”斯大林在亚基尔的信上批道：“卑鄙之徒和寡廉鲜耻者。”然后，他将此信及自己的批语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传阅，莫洛托夫赶忙写道：“十分准确的结论。”而亚基尔的好友卡冈诺维奇的批语最为激烈：“对恶棍和败类只有一种惩罚办法——死刑。”（见上书，第 453—454 页）

以布哈林的资历之老、理论水平之高，以亚基尔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无畏，何以至此？那许许多多身经百战，在沙皇的监狱中坦然面对生死、无比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此时竟不敢为自己蒙冤的战友作一词之辩，反而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亦何以至此？

近三十年后，在遥远的东方，老共产党员邓拓在 1966 年 5 月 17 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花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卷，第 427、432 页）

何以至此？

在“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激斗

列宁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

——列宁为何讨厌瑞士


上架建议：历史随笔

ISBN 978-7-203-06880-8

9 787203 068808 >

定价：28.00元